

DANGDAIJINGJIXUEXILIEC • NGSU

# 从马克思到市场： 社会主义对经济体制的求索

● [波] W. 布鲁斯 K. 拉斯基 著

● 银温泉 译 吴敬琏 校

● 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当代经济学译库

北京商学院

藏书 ★

图书馆



北京商学院 09912210

-12

## 目 录

从马克思到市场：  
社会主义对经济  
体制的求索

出版前言  
中文版前言  
前 言

MULU

### 第一篇 马克思主义 的社会主义 ——许诺

1. 对经济合理性的声言 3

### 第二篇 现实的社会 主义——失 望

2. 反向运动的历史  
规律 21  
3. 赶超目标 29  
4. 命令体制 51

### 第三篇 市场社会主 义——迄今 为止的问题

5. 对挑战的理论反应 69  
6. 匈牙利的实践 84  
7. 含有受管制的市场  
的集中计划——有  
缺陷的模式 100  
8. 南斯拉夫的教训 117

**第四篇 市场社会主义——面临的问题**

- |                |     |
|----------------|-----|
| 9. 资本市场和充分就业问题 | 139 |
| 10. 所有制问题      | 174 |
| 11. 结论性的评价     | 199 |

---

译校后记	202
------	-----

# 第 一 篇

---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  
——许诺





# 1

## 对经济合理性的声言

在这一章中，我们不打算详细回顾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理论的全部论据，这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第一阶段被定义为社会主义。不仅大量过去的著作，而且大多数近来的著作也都充分描述了这些论据。<sup>①</sup>我们所要做的，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在经济合理性方面优于它的前身——资本主义的声言，集中讨论上述论据中被认为可能和目前的经济困境联系最密切的方面。

经济合理性不一定是“社会主义陈述”的依据，至少不一定是它的依据的决定性部分。一些社会主义者认为，经济问题上早已得到解决，在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诞生之前，充分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的条件已经建立；一些人甚至强调“社会主义独特的生产手段是闲暇”。<sup>②</sup>此外，还有非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特别是英国的费边主义表现得更为强烈，它主要是依据道德理由反对资本主义的，然而从 30 年代以来，它们也不得不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详尽地阐述支持向社会主义前进的经济理由，以便回答从政治实践中提出的诘难。<sup>③</sup>另外一种强调社会主义的广义道德论据的观

点,看来产生于东欧实践,这使一些作者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的道德目标和经济合理性之间可能存在冲突,因此需要在两者之间进行某种权衡。<sup>④</sup>

所有这些以及与之类似的观点在别的框架中可能都值得详尽地研究。不过,根据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在道德上的优越性和经济上的优越性是比肩而立、相互补充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人类解放,也就是使人类免除压迫和不公正,已成为把生产力从资本主义过时的生产关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一个条件和不可或缺的因素。与此同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代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成为人类解放的一个条件和不可或缺的因素。两个方面的结合从概念上说是植根于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social ownership)概念。

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它超出了罗马法传统中财产权概念的框架,尽管后者所用的语言对于把社会所有制同一般意义上的所有制区分出来可能是有用的。所以,如果我们把财产权的基本要素看成是排除非所有者对所有物的控制,那么,社会所有制的特征就必须是消除对社会成员的这种排除。换句话说,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向社会的每一个成员提供了同等的权利,用以决定生产资料的使用方式和生产资料使用成果的分配方式。因此,社会所有制的概念就超出了公共所有制(public ownership)的概念。如果根据后者,它意味着一个公共主体被指派为合法所有者;要使这个公共主体成为社会性的,它就必须处于社会的有效控制之下。这就使一系列关于社会有效控制的形式和标准的最困难的问题立即产生;在国家作为所有者的情况下,问题就成为政治性的了。<sup>⑤</sup>

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应该为恢复现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制度(简称经济制度)之间的平衡(“适应”)提供基础。据称,现代生产力的增长已经超越了建立在互相分离地所有的、只通过市场过程的竞争自发性(spontaneity)而相互联系的单位所进行的支离破碎的经济活动之上的经济制度。根据马克思的理论,生产资料的社会化使劳动转化为“直接社会性的”,即以直接的方式满足社会需要,而不是像在资本主义下,劳动是“间接社会性的”,在劳动力的使用和社会需要的满足之间楔入私人盈利考虑。这种转化,不仅结束了人对人的压迫(为他人进行的工资劳动,剥削),而且为合理组织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开辟了道路。后者可以看成是广义上的人类的解放——从从属于统治经济过程的未被认识的自然力改变为有意识地调节这一过程,甚至这种调节体系本身,也是设计出来的,而不是作为自发发展的结果简单地继承下来的。在这里,我们清楚地回顾了马克思的人类学的乐观主义思想:坚信在适当的条件下,人类有能力合理组织经济(和一般社会生活)。社会主义应该在社会范围内为经济活动的实体的和工具的合理性(按照韦伯的划分)创造条件。

在马克思看来,在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的基础上,把互相分离的经济活动单位一体化为一个社会整体在这里起着首要的作用。奥斯卡·兰格一直特别注意社会主义的这种属性,认为它会提高从个体到社会规模——或者换句话说,从微观水平到宏观水平的合理行为的标准。<sup>66</sup>这种联合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外部性的内化”,即不仅仅在于有可能把微观单位活动之外的成本和收益计算在内,而且在于可以消除由于追逐只是从微观经济的角度看才合理的目标而引起的宏观范围的

无效率。因此，这里就有兰格关于典型社会主义经济层级制的目标结构的定理：低层目标成为达到高层目标的手段，子系统（地区、部门、企业）合理行为的标准从属于作为整体的系统的标准。中央计划——对经济活动的事先的宏观范围内的协调——就成为一个自然的推论，成为劳动的直接社会性的必要组成部分。这种劳动的直接社会性，是与经济领域中人类行为原则的基本变化复杂地联结在一起的：从竞争或对抗原则到朋友间的协作原则。根据前面论述过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经济方面和道德方面的统一，认为社会人（Homo socialis）将会替代经济人（Homo oeconomicus）是不对的，正确的看法明显是，两者将融为一体。

以上这些，为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合理性问题的论述提供了一个经过最大限度地压缩了的缩影。它省略了许多中介联系，因此理论上显得有些贫乏，不过，看来它也道出了理论的内在逻辑。尤其是，这种抛开了细节的抽象的逻辑也许能够比不这样做更清楚地说明市场和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合理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之间的不相容性。市场是在劳动分工的参与者互相在经济上分离的情况下不可或缺的协调机制。现在，即使不涉及劳动分工问题（劳动分工消失的乌托邦梦想可以推向不可预见的遥远未来再去解决），分离因素也不能纳入到——我们称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设计的体制中来，除非出于纯粹的组织原因（而且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要采取非常严格的层级制从属结构）。不仅私人企业与上述意义的合理的社会主义相冲突，集团所有的集体企业也与合理的社会主义有矛盾；所以恩格斯在抨击杜林的公社时，是完全逻辑一贯的。<sup>⑧</sup>而某些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的理论家在对马

克思的某些著作作有利于自己的解释时所作的努力,看来也是文不对题的。<sup>④</sup>这并不是说人们在马克思的论述中不可能找到与对待社会主义下的市场的较为温和的态度不相矛盾的言论,但就理论实质而言,上述结论看来是无可争辩的。

通过把合理行为的标准从微观经济水平提高到宏观经济的水平(宏观领域的范围并没有详加说明,指的是全国还是国际性的?),社会主义被假定应当显示出较之资本主义更高的效率。而且,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并不存在一方面的较低效率和另一方面的较高效率之间权衡的问题;收益的增加将是普遍的——在宏观范围内的可用资源的充分利用中,资源在各种可选择的目的是与手段间的更合适的配置中,在较高的 X 效率中,都是如此。

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充分利用的前景构成了社会主义宣称经济上优越于资本主义的主要支柱。没有任何别的批判比这种对资本主义没能创造出合理经济行为的条件的批判更加严厉和更为明确的了。从马克思对“过剩资本和过剩人口”这种不是由于需求饱和而是由于利润导向的制度周期地产生的有效总需求不足所引起的荒谬现象的分析中,人们可以看到生产力的潜在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冲突要旨:

资本的生产过剩,仅仅是指可以作为资本执行职能……的生产过剩……。资本的这种生产过剩伴随有相当可观的相对人口过剩,这并不矛盾。……

如果资本输往国外,那末,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并不是因为它在国内已经绝对不能使用。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它在国外能够按更高的利润率来使用……。

生活资料和现有的人口相比不是生产得太多了。正

好相反。要使大量人口能够体面地、像人一样地生活，生活资料还是生产得太少了。

对于人口中有劳动能力的那部分人的就业来说，生产资料生产得不是太多了。正好相反。……要使全部有劳动能力的人口在生产效率最大的情况下劳动，就是说，要使他们的绝对劳动时间能够由于劳动时间内所使用的不变资本的数量和效率而得到缩短，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还很不够。

但是，要使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作为按一定的利润率剥削工人的手段起作用，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就周期地生产得太多了。要使商品中包含的价值和剩余价值能够在资本主义生产所决定的分配条件和消费关系下实现并再转化为新的资本，就是说，要使这个过程能够进行下去，不致于不断地发生爆炸，商品就生产得太多了。

不是财富生产得太多了。而是在资本主义的、对抗性的形式上的财富，周期地生产得太多了。<sup>96</sup>

在 30 年代大萧条的影响下，社会主义将会消除这种弊端的许诺更是成为主旨性的东西了。这些从经济方面为社会主义辩护的理由显然不仅支配着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而且也支配着二次大战前和战后的其他社会主义者的思想——包括英国的新费边主义者的思想。人们强烈地感到，不管转换率和替代率（用教科书的语言表达的市场机制的配置效率）的微调具有多么大的优点，不管微观单位内的组织收益如何，甚至不管可用资源的数量增长（包括那些由于技术创新和教育带来的增长）如何，它们的宏观经济效果和社会效果都依赖于资源的利用程度。而在资本主义社会，总需求的不足和波动限制了

资源利用的程度。

人们认为,有几个因素使社会主义能够消除同时存在的不合理的过剩资本、失业和未满足需求。首先,社会主义将具有自然的、而不是像私人利润追求下毫无节制的倾向,来充分利用现有的经济发展潜力。广义的需求,包括质量方面,永远不会饱和;因此,受满足需求的欲望推动,就有一种强烈的投资倾向。其次,由于明显的原因,社会主义政府将承担劳动力充分就业义务,并因此在投资政策中(包括更换过时的设备),努力保持资本集约和劳动集约的适当的平衡。第三——这可能是最概括的论点,社会主义可以通过灵活地调整价格和工资,把国民产品和产出潜力很好地协调起来。如卡莱茨基所言:“不管增长率怎样,由于价格的灵活性……[社会主义下的]生产性资源都可以得到充分利用;价格……与工资联系在一起,逼近到一定点上,在这一点上,实际劳动收入、从而消费能够足以吸收充分就业时的国民产品。”<sup>10</sup>应该明白,这里所说的灵活性,不是指市场中特定商品和劳务的相对价格由于供给和需求位置变化而产生的灵活性,而是指利润(投资)和工资(消费)的宏观比例的灵活性。换句话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产出量(和因此而来的就业)依据既定的分配(利润和工资之间的关系)而调整,而社会主义则据称有能力调整分配(改变利润和工资之间的关系)以适应充分就业时的产出量。这意味着,社会主义下的充分就业并不是完全地和持续地依赖于高投资活动的扩张政策;不管由于何种原因投资减少,工资都会随价格而提高,消费需求就把投资需求的一个适当部分接过来,充分就业水平上的储蓄也就会再次事先与投资相匹配,尽管水平较低。不用说,以上所述的任何因素在实质上



不可能立即消除物质资本短缺引起的“古典”失业,不过,可以期望前后一贯的宏观积累政策及时克服这一瓶颈。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没有明确地提出配置效率概念,不过,它却显然暗示了社会主义在可选择的目的和手段间的配置资源方面的优越性。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声言,首先建立在这样的待证明的定理的基础之上,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源能够这样来配置,它将不会因通过自发的市场调节进行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的事后协调而造成浪费。正是由于把工厂内的计划——对目标作明确规定,对手段作小心部署——扩展到宏观经济范围具有很多的优点,这一扩展对马克思及其追随者才有如此强烈的吸引力:中央计划将使社会劳动分工的每一环节直接进入自己的恰当位置,从而保证经济沿着一条在产出一端和投入一端都事先指明的均衡道路稳定发展。他们关于集中计划有能力事先规划经济发展过程,协调这一过程中特定部门的活动的声言,深深地影响了许多非马克思主义者。例如,熊彼特之所以宣扬“社会主义蓝图”的优越性,主要就是因为这一点。他指出:

有那么些事例,在其间,资本主义产业处于在理论上无法决定价格和产量的环境之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每一件事——除了没有实践上的重要性的极端事例以外——都是单一地决定的。不过,即使存在着理论上的确定状态,资本主义要达到这种状态,也比社会主义经济更困难,耗费更大。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无穷无尽的运动和反运动是必然的,决策只能在不确定的氛围中作出,从而使行动变得迟钝起来。而这样的战略和这样的不确定性却不会存在于社会主义经济之中。……它的意义比乍

看起来要来得深刻。凡是从给定的数据出发得出的合理的或最适度的生产问题的确定的解,以及凡是足以缩短、通畅或保证导向这种解决的道路的任何措施,势必都会节省人的精力和物质资源,并降低取得一定成果的成本。除非这样节省下来的资源完全被浪费掉,否则,在我们的意义上的效率就必然会提高。<sup>⑩</sup>

不过,社会主义对配置效率的声言超越了通过宏观经济计划的“单一的决定”的优点。这种宏观经济计划总的说来可以看成一种程序,其内容无异于事先协调。由此,社会主义者的声言赖以建立的第二个支柱出现了:充分界定生产过程目标的可能性。生产不再由相互竞争的企业家支配,这些企业家利用有力的劝说手段诱使公众购买其产品,不管有用与否;生产也不由“拥有主权”的消费者支配,这些消费者的总消费结构是由既与社会正义无关,也与所有者的经济贡献无关的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决定的。在社会主义下,生产的增长将由满足需求的要求推动,在这里,需求由代表社会利益的计划者直接确定,而不会再受阶级冲突和购买力不平等分配的干扰。出于同样的原因,计划者将能够确定与特定的产出数量和产出结构相联系的直接劳动和间接劳动(生产资料)耗费的真实情况。与此同时,根据与公正的分配结构相联系并由社会耗费来确定的需求进行的对社会劳动分工的有计划调节会产生这样一种配置型式,这种型式应该满足帕累托最优标准。考虑到上述设定的目标,社会主义就应当在实质内容上而不是在形式上符合这些标准,从而使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具有明显的配置上的优越性。

在经济理论中,X效率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它是由莱宾

斯坦在 1966 年引入的,目的在于校正这样一种标准假设,即市场竞争压力自动导致每一经济单位内部的资源得到最有效率的应用(成本最小化):

我所说的“X 效率理论”,研究的是这样的无效率类型,它是生产组织内部由于错过利用现有资源的机会而产生的。……它研究一切类型的由非配置因素产生的无效率。……它主要涉及各种由于完全或部分缺乏尽可能有效地利用经济机会的动力而产生的无效率。<sup>12</sup>

如果 X 无效率的存在在资本主义下是正常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看来和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批判一样,都同样被忘却了),那么,社会主义就有另外一个优点,因为社会主义的生产组织被假定为具有 X 效率。不过,其原因则和最小化标准假设的原因正好相反:这里不是市场的压力,而是个人利益和集团利益与整个社会利益的统一,这种统一应当产生适当的动力。从社会压迫制度中解放出来将会消除个人对社会的“异化”现象,并因而使个人显示出对待工作和对待其他责任的积极的和富有创造性的态度。像前面所看到的,这种状况并不是说经济人的态度简简单单地被利他主义替代了:自利作为一种动机并没有消失,但是,它和社会利益结合在一起了。并且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一道,将共同导致委托人状况和代理人状况之间区别的逐渐消失;取代我们称之为“准委托人”的独特行为的是,对共同利益充分关心和对风险共同承担责任,这将成为通则。

在生产组织内充分利用现有资源的动力,明显地扩展到包括产品创新和技术创新在内的一些创新领域。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再次不是市场压力,而是自身利益和共同利益的统

一，使经济活动当事人渴望创新。由于创新的宏观经济障碍已经消除，创新的激励因素扩大了：

1. 任何形式的“卢德主义”<sup>\*</sup>，也就是那种工人在将要成为多余物的威胁下对技术进步的抵抗运动，都没有存在的理由。相反，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工人从创新预期得到的只是收益，不论作为消费者，还是作为生产者（劳动时间缩短），都是如此。

2. 经理人员没有任何理由进行抵抗。他们不应该害怕现有资本贬值，这种贬值会由国家的废弃和重置政策来决定。

3. 中央计划者，由于在促进发展时面临来自供给方面的制约，显然会热衷于提高要素生产率，并因此激励发明，提倡应有的教育以及保证 R&D（研究与开发）得到充足的资金。

4. 商业秘密的废除将有利于技术和组织信息的传播以及经验的交流等等，这些都是对创新的产生、实际吸收和传播具有重大意义的因素。

在这里，有必要提及在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条件下，激励因素所受到的众所周知的限制。这就是说，新的、能够获得 X 效率的态度并没有被设想成在建立新秩序后立即取得优势。社会主义者所声言的是，它将在社会主义现实的教育影响下逐渐显现。与充分就业的实现和周期波动的消除一道，分配的公正性也被看成是这个过程中的极为重要的事情。首先，由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

---

\* Ned Ludd 是 18 世纪末期一个半傻的兰开夏工人。所谓卢德主义者，是指 19 世纪初期，因为害怕使用机器导致失业而捣毁机器的英国工人。——译者注

化,资本收入(“不劳而获的收入”)消失了;第二,收入分配更公正了;第三,用公共资料提供的社会服务和收益——这还有助于机会均等化——将与整个社会的产出增长得一样快,或者更快。

不能把“异化消失”及其对动力的影响看成从社会主义一开始就是理所当然的事,认识到这一点就要承认,在起始阶段需要对个人和团体进行直接的物质刺激。在这种意义上,经济激励应该执行双重任务:作为开始时尚不充分的“社会意识”的代替物(这就是资产阶级法权原则,也就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中的“按劳”分配原则);同时,成为另一种教育工具,在实践中向人们表明,增加了社会财富,同时也就增加了人们自己的财富。但是,诉诸经济刺激(虽然是一个受人欢迎的现实主义的迹象)却给拟议中的制度引进了一个预示着同模型的基本假设有矛盾的异己因素。这马上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即如何按绝对量和相对量来评估和通约贡献和报酬。在俄国革命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们完全忽视了这类问题,至多稍加涉及。他们认为,由于发展过程本身的性质,直接的经济计算工作简化了(选择变大,而备选数量变少),另一方面,计算的工具也不断改进了,因此,问题将越来越容易得到解决。与此相类似,对于分配的激励原则引起的利益冲突危险性以及利益冲突的影响可能扩散到信息领域(报告扭曲、讨价还价)都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加之由于存在“无产阶级觉悟”,发展过程就会创造条件,把这种危险降低到可控制的范围内。

在这个阶段,检验马克思主义原教旨主义者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合理性声言的有效性,尤其是试图把那些明显地属于

乌托邦的东西和那些更加实际的东西区分开来,都是毫无意义的;这类结论应该在后面讨论完“现实的社会主义”以后才能做出。不过,有必要强调指出,上述声言显然是根据成熟的资本主义之后的社会主义而做出的,按照马克思的以下主张,这种成熟的资本主义已经变得不能再作为进步的引擎发生作用了:“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sup>13</sup>熊彼特显然也接受了资本主义的腐朽和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之间的联系,尽管他与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将会生机勃勃的乐观展望以及未来经济制度中不存在市场的观点肯定无关。在熊彼特“长驱直入社会主义”(march into socialism)的理论中,有很多极重要的“可观察的趋势”,最最重要的当推企业家功能作用的衰落了,企业家功能构成了熊彼特本人的经济发展理论的基础。资本主义的其他的“崩塌中的墙垣”之间,都是紧密地相互联系着的,如以下引文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第二篇[资本主义能存在下去吗?]论点的大部分都可以用马克思的下列命题加以总括:经济过程倾向于使它自己社会主义化——同时也使人的灵魂社会主义化。我们用这个命题来指这样的意思,社会主义所必需的技术、组织、商业、管理和心理上的诸先决条件倾向于愈来愈得到满足。让我们……摹想一下把这种趋势具体化就会浮现于未来时期的事物状态。各种行业,除农业以外,都被一小批科层化的公司所控制。进步放慢了,变机械了,成了规划好的了。利率收敛到趋于零,这不是暂时的,

也不是政府压力造成的,而是长期的,因为投资机会缩减了。产业的财产和它的经营管理变得非人格化了——所有权退化为股票和债券持有,执行人员养成了类似于公职人员的心理习惯,资本主义的动机和准则全都枯萎了。在这种瓜熟蒂落的时候,结论显然是向社会主义政体过渡。<sup>①</sup>

这一段话清楚地表明了熊彼特和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的关系:在熊彼特看来,社会主义的降临并不是值得庆祝的事情,尽管他也承认社会主义经济中有些特征可能是积极的,例如它可望能够克服波动。不过,尽管两人在价值判断上有差异,熊彼特和马克思却都坚信历史站在社会主义一边,因而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合法承继者,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才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合理性创造了前提。

鉴于这两位在其他方面都背道而驰的思想家都断言“长驱直入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值得细加研究。这可能既有助于评价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本身的基础,也有助于估计“现实的社会主义”的试验可以在多大程度上用来作为检验社会主义经济优越性的声言是否确实的试验场。

## 注 释

- ① 近期著作中,最重要的可能当数 Alec Noves 的 *The Economics of Feasible Socialism* (Allen & Unwin, London, 1983) 了。至于较早时期的著作,作者认为 Gabriel Tekin 的著作对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做了极好的综合评述。Gabriel Tekin, *Karola Marksa obraz gospodarke Komunistycznej* (Karl Marx's Image of

- the Communist Economy), Published in Polish (Warsaw, 1962).
- ② Michael Harrington, 'Leisure as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in *The Socialist Idea: A Reappraisal*, eds Leszek Kolakowski and Stuart Hampshire (Basic Books, New York, 1974), 161.
- ③ See Elisabeth Durbin, *New Jerusalems: The Labour Party and the Economics of Democratic Socialism*, foreword Roy Hattersley (Routledge & Kegan Paul, London, 1985).
- ④ Janos Kornai, 'Efficiency and the Principles of Socialist Ethics', in *Contradictions and Dilemmas: Studies on the Socialist Economy and Society*, in English (Corvina, Budapest, 1983).
- ⑤ Włodzimierz Brus, *Socialist Ownership and Political Systems* (Routledge & Kegan Paul, London, 1975).
- ⑥ Oskar Lange, *Political Economy*, vol. I, ch. 5, English edn (Pergamon, Oxford, 1963).
- ⑦ Friedrich Engels, *Anti-Duhring: Herr Eugen Duhring's Revolution in Science*, English trans. from the 3rd German edn, 1894. (Lawrence & Wishart, London, 1969). 参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反杜林论(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 ⑧ Brus, *Socialist Ownership*, ch. 2, Section 3.
- ⑨ Karl Marx,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ed. F. Engels, vol. III, ch. XV, section III, English edition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Moscow, 1962), 250—3. 参见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十五章,第三节,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85—287页。
- ⑩ Michal Kalecki, 'Theories of Growth in Different Social Systems', *Scientia CV* (May—June 1970), 21.
- ⑪ Joseph A. Sc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 
- 5th edn with a new introduction by Tom Bottomore (Allen & Unwin, London, 1976), 194. 参见约瑟夫·A·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商务印书馆1979年中文版,第243页。
- ② Harvey Leibenstein, 'Microeconomics and X-Efficiency Theory', in *The Crisis in Economic Theory* eds D. Bell and I. Kristol (Basic Books, New York, 1981), 98.
- ③ Karl Marx, 'Preface' to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K. Marx and F. Engels *selected Works in Two Volumes*, vol. I (Lawrence & Wishart, London, 1950), 329. 参见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 ④ Sc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219. 参见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商务印书馆1979年中文版,第275页。

## 第二篇

---

现实的社会主义——失望

“现实的社会主义”(real socialism)或“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really existing socialism)一词是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发明的,用以傲慢地对抗改革者们的“纯正的”(genuine)社会主义观念,尤其是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具有人性的社会主义”。这个名称意欲给出的信息是:除了这种在执政的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的社会主义,其他的社会主义都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不论用意何在,用这个名称来称呼存在于共产党国家中的政治和社会经济秩序还是有用的,尽管这些国家具有不同的发展水平、国内政策、组织以及国际方针。它适合于苏联以及属于“华沙条约”和“经济互助委员会”(“经互会”)的东欧盟国,非欧洲的经互会成员国(蒙古、古巴、越南)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中国、老挝、柬埔寨),一旦适当的政治时机来临,在1986年苏共纲领中划为“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国家”(一些非洲国家,可能还有尼加拉瓜),也很容易包括进去。

我们将用“现实的社会主义”一词来称呼共产党执政的地区,不包括任何价值判断。我们的分析将集中于制度演变的一般特征,而不是民族特征,因此,这一称呼就特别合适。不过,这里还要加一个限制条件:我们对“现实的社会主义”进行归纳的依据,限于苏联、东欧共产党国家,某种程度上还有中国这些国家的实践。



## 反向运动的历史规律

“现实的社会主义”被它的领导人自豪地宣布为，也为许多人广泛地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产物。不过，它与马克思的历史过程的“运动规律”看来是矛盾的。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应该从成熟的资本主义的母腹中分娩出来。20 世纪的实践与马克思的预言是相悖的。

对于那些具有强烈决定论成分的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统追随者来说，1917 年的俄国革命是一个挑战。大多数忠实于马克思信条的非布尔什维克马克思主义者，包括卡尔·考茨基这样的杰出人物，都否认在一个只有若干工业化发展的孤岛，在对经济进行计划管理的文化和组织条件贫乏、农民占优势的国家中所进行的革命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从那以后，相当多的马克思主义者一直拒绝承认苏联和追随苏联足迹的其他国家具有社会主义资格。他们也否认用共产主义的经验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合理性和人类解放的声音进行检验的有效性。在他们看来，20 世纪前半期一些国家的实践，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丝毫损害。

另一方面，人们也做了大量的努力，试图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部分同这种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辩证关系的预定路线的偏离协调起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也许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整个时期中，这种流派的论据看来并不是毫无道理的。不十分坚决的人们只是简单地说，与革命在德国的失败和革命形势在其他主要工业化国家的缺乏相对比，俄国革命胜利的不协调性可以看成是一种历史偶然性，一种不合于一般法则的暂时反常。而由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一翼所采取的，并在所有“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一部分的占统治地位的观点，则极为肯定地努力从正面证明实际发展的正当性。这种观点以列宁的（在某种程度上实际也是托洛茨基的）“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公式为基础，把成熟的前提条件重新解释成是就整个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制度而言的。由于世界资本主义已经足够发达，达到了向社会主义过渡所要求的水平，革命在资本主义链条的政治上最薄弱的环节爆发，就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使资本主义经济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衰退，使世界上亿万人民处于灾难性的悲惨处境，给政治关系带来了极端的不稳定。这就给后者的论据增加了份量：资本主义的生存靠的是资产阶级动用熟练的政治技巧和残暴的物质力量，而同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相对立；这使资本主义的存活成本越来越高昂，而且存活终归是暂时的。毫无疑问，正是由于当时资本主义经济的混乱，由于人们日益认识到需要求助于国家的管制和再分配之类的经济政策，才使许多非马克思主义者更容易接受“长驱直入社会主义”的思想；人们在熊彼特的著作中也可以找到这种联系。一个相关因素是资本主义世界和苏联之间经济形

象的鲜明对比。在苏联，经济快速增长，失业瘟疫被消灭——社会主义月亮的黑暗面还没有暴露出来。

目前，我们不打算深入研究这些论据是否正确，尤其不打算深究当时苏联的真实情况。我们要说明的只是，尽管社会主义革命在工业化国家遇到了挫折，两次大战之间的现实仍然为作出和马克思关于向社会主义前进的历史运动规律的思想不相矛盾的解释留出了余地。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仍然可以为这种解释作出论证，但是，理由越来越少了。从好的方面说，首先，苏联在战争中的胜利乃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可行性和力量的毫不含糊的证明；其次，社会主义向新的国家和新的大陆进一步扩展了；最后则是广泛流传的观点，即战后工业世界的重建和重组需要社会主义的经济管理方法，以防止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经济崩溃再次出现。然而在另一方面，马克思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运动规律”的观点却遇到严重挫折：社会主义向东欧的扩展显然是外力强加的，如果说有什么地方的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能够被多少合理地证明为出于内在因素的话，充其量只能举出像南斯拉夫这样的国家作为例证，这些国家的发展水平相当于革命前的俄国。在所有其他的场合（中国和稍后的古巴及越南），共产党都是在经济极其落后的条件下取得政权的。结合主要工业化国家中资本主义制度仍然存活的事实来看，就很难把这解释成是一种反常事件或对“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证明。对存在某种反向规律（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越低，社会主义革命的机会越好）的怀疑不可避免地增大了。在这些国家中，推动革命的力量并不是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冲突，而是反

对殖民剥削和民族压迫的斗争；使社会主义具有吸引力的，也不是更充分地利用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经济潜力，而是对于摆脱不发展、贫困和愚昧状态的许诺。乔安·罗宾逊 (Joan Robinson) 认识到了这一点，她 (同情社会主义，但不坚持马克思的历史规律) 试图用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公式概括经验事实，这就是，社会主义不是“超越资本主义而是代替资本主义的一个阶段——一种没有进行过产业革命的国家可以用来仿效产业革命的技术成就的手段，一种在一套不同的博弈规则中进行快速积累的手段”。<sup>①</sup>

这种不是把欠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看作资本主义的继承者，而看成是替代者的观点，显然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不能接受的，他们做了大量的尝试来驳斥这种观点。除此之外，本书作者之一也曾以为，虽然除很特殊的情况外，欠发达国家在 20 世纪后半叶的确已不能再仿效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但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在这些国家确立，不是由于它们的不成熟性，而是由于社会主义道路有利于克服这种不成熟性。<sup>②</sup> 这种论证很难令人信服，部分原因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消除落后状态的战略各有优劣，不过，主要原因在于它没有抓住历史规律性问题的要点——不管社会主义制度在世界欠发达地区内取得怎样的成就，历史规律必须在主要国家进行检验。正是在这个试验场上，20 世纪后半叶的发展才有力地否定了马克思和熊彼特所说的“长驱直入社会主义”的思想。

和两次大战之间的情况不同，资本主义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避免了陷入萧条。尽管波动仍然存在 (按本世纪 30 年代的标准看是相当温和的)，然而，在战后恢复时期结束以后的至少 1/4 世纪的时期里，西方经济还是显示出确实不

寻常的活力；生产和大众消费的高增长率；低失业率（在许多场合实际上为零）；对生产方法和最终产品的强烈的创新倾向；以及社会保障相当可观的扩大（“福利国家”）。即使不考虑特别有活力的国家（如日本），这个时期的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看来也决不是生产力的桎梏。各个国家的绩效虽有明显的差别，但这种绩效上的差别很难按制度或按相对发展水平来加以归类。意大利、希腊和西班牙同法国、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一起奔腾向前；几个亚洲的市场经济（韩国、新加坡和台湾、香港地区）也从不发展状态戏剧性跃进到“新兴工业化经济”这种匆忙建立的新类别中去。而且，迅速的技术变化，新兴现代工业中心的出现，由国际商品流动、资本流动和劳动力流动的有力扩张所引起的个别经济之间的更紧密的相互依赖——所有这一切都引起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世界人口结构的巨大变化，这就弱化了人们熟悉的马克思建立“长驱直入社会主义”预期所依据的社会因素。一般体力劳动者的相对量和绝对量的减少，特别是受雇于无产阶级传统根据地的“烟囱”产业的工人数量的减少，再加上经济繁荣和消费者的财富（房屋、耐用品）的明显增长，就不仅降低了对政治上的好斗精神的支持程度，而且强有力地推动了可以叫做“中间阶层态度”（middle-class attitudes）——一种在现存的社会经济制度之内而不是在它以外寻求改进的倾向——的高涨。

在一段时间里，资本主义的新的活力曾经被马克思主义的文献置之不顾，在共产主义国家更是如此，不过在别的地方也有这种现象。当上述问题再也不能回避，而主要为“开明的马克思主义（open Maxism）”的拥护者所正视时，他们采取了这样的办法来维护把向社会主义过渡视为一种历史趋势的观



点：用西方实际的政策具有社会主义性质来解释它们取得成功的原因。

这些政策包括：国家干预的增强，如宏观经济的指导性计划(indicative planning)；公共部门生产的大量增加；总支出中公共开支的更大幅度的增长；以及“看得见的手”采取的一系列其他形式的管制措施和再分配措施。换句话说，资本主义是由于逐渐引进社会主义才得到拯救的，这种方式可以认为是历史趋势重新自我肯定的表征。而且他们断言，要解决仍然占支配地位的私人资本继续产生的种种冲突，还要求在经济体系中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成分。运用这种办法，他们为“长驱直入社会主义”的论断保持论证上的合理性。

如果对决定或影响战后西方国家绩效的各种因素进行分析，那就超出了本书的范围。总的说来，在经济进步的主要时期同国家作用的增强之间无疑可以找到联系。但是，决不能把这种联系解释成有利于“长驱直入社会主义”观点的证据。即便是在国家干预的顶峰时期，西方经济也仍然基本上由市场调节。国家是在干预市场的运作，但任何时期都没有出现过马克思主义的蓝图所描绘的那种取代市场而直接配置资源的情形。特别是，企业家精神得以发挥的机会依然保存着，而且与熊彼特的预见相反，企业家的功能在弘扬光大，从而引起了新技术和新产品在全球商业性应用中的爆炸性传播。

70年代中期，西方长时间的繁荣走到了尽头；人们熟悉的生产能力过剩和失业问题又回到了经济日程表上来了。不过，这些问题引起的政治方面、经济制度的实际演化方面以及知识界方面的反应，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可能预期的反应却是不同的。

在政治方面,也许至少部分由于前面提到的社会变化,非社会主义政党总的说来靠左翼的削弱得分。在经济方面,发生了朝向解除规制和私有化的转变,而扩大公共部门和增强国家干预的尝试(法国、希腊)则相当快地发生逆转。

从知识界方面来说,不仅在那些政治上倾向于右翼或中间派的人们中间自由放任的思想日益增强,而且即使在左翼人士中,与温和立场相比较,激进的社会主义解决办法也失去了支持。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是英国工党的“市场社会主义”思想不是做为暂时的实用主义的妥协,而是作为基本的制度特征而强劲有力地复活了。<sup>⑥</sup>

不用说,“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不断恶化的经济状况和它们频繁地把走市场化道路作为一种救治措施,一定也有助于对西方发达国家中重新出现的资本主义矛盾作出这种反应。

尽管我们提出了 80 年代的问题,但我们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打算卷入到关于“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在处理西方世界复杂的国内和国际经济问题中的相对作用的争论中去。我们提及它们,只是由于它们同马克思提出的存在走向社会主义的客观趋势的命题有关。在我们看来,在本世纪末期临近之际,从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看不到这种趋势。对于这一点来说,我们的意思不是认为不存在向社会主义的方向起作用的力量,而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力量变得更弱了,而不是变得更强了。

---

**注 释**

- ① Joan Robinson, 'Marx, Marshall and Keynes', in *Collected Economic Papers*, vol. 2 (Basil Blackwell, Oxford, 1960), 15.
- ② 这一观点是由布鲁斯提出的。见 Brus, *Socialist Ownership*, 13。
- ③ 对这种特征的讨论, 见 *Market Socialism; Whose Choice? A Debate*, Fabian Society Pamphlet 516 (London, 1986)。

# 3

## 赶超目标

无论是由于历史的多变性,还是因为历史的逆向规律,“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共同特征是,它们都是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和熊彼特)认为不成熟的条件下,开始社会主义转变的。因此,革命胜利后压倒一切的目标就是消除经济、社会和文化上的落后状态。当然,在一个不具有一定先决条件,包括规模、自然资源禀赋和一定的初始工业基础的国家里,即使最伟大的乐观主义者也不可能从一开始就明确地提出这一目标。俄国满足了这些条件,并因此而成为一种迄今为止一直没有尝试过和未曾预料到的道路的开路先锋。在其最后的几篇文章之一中,列宁再次批判了关于俄国尚未达到社会主义建设所必需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传统论调,明确指出:

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来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记

得拿破仑这样写过：“On s'engage et puis... on voit”，意译出来就是：“首先要投入真正的战斗，然后便见分晓。”<sup>[1]</sup>

这些话准确地反映了布尔什维克关于在不成熟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的实质：运用国家力量来摆脱经济落后状态，达到“社会主义所要求的”水平。在另一篇声明里，列宁则把电气化看成是现代化的一般特征，并为这一思想找到它的最简明最著名的公式：“共产主义 = 苏维埃政权 + 全国电气化”。运用国家力量完成经济现代化和“赶上其他国家”的任务，不仅应当理解成接管全国大部分物质资本（生产资料），还应当理解成国家控制资源配置和利用的全过程，其中，特别强调保证必要的积累水平和投资结构。这显然也具有广泛的政治含义。

共产党国家的经济现代化政策是通过国家计划体制实施的。在实践中，虽然几乎各国都不时地制定长期计划（15年或20年），但它们并不像中期计划，主要是五年计划（苏联的 *pyatiletkas*）那样重要。这些五年计划在两次大战之间赢得了声誉。尽管各个国家和各个时期的中期计划在具体任务和数量指标上有明显的区别，但从它们的执行结果和从社会主义建设的角度看，却又都具有基本的相似之处，都可以广义地理解为基础的发展战略。由于这种发展战略与不成熟条件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相联系，由于它曾被所有“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所实行，所以，这种战略可以称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现代化战略。不过应当记住，由于这种战略最初是20年代在苏联出现的，所以它就不仅反映了通向社会主义路途中的现代化的一般做法，也反映了苏联当时的特殊情况。这些情况包括：辽阔但大部分地区人烟稀少的国

土,丰富却不易开采的自然资源;整体而言的不利的气候条件和中等水平以下的农业土壤条件;把政治—军事目标推向首要优先目标的敌对的外在环境(不管敌对的真正起源是什么);缺乏设计宏观战略的经验,这一点又同僵硬的意识形态和对寻求替代战略的人们进行的政治压制掺和在一起。共产党官方意识形态一直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些特殊性,而把苏联的发展战略提高到通用模式的高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无论是强加的(东欧)还是主动采取的(中国),其他“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所采取的都是这种战略,只不过稍加改动而已,尽管可以说在某些方面中国的修改更大一些。南斯拉夫起初也是模仿苏联战略,只是在1948年苏南关系破裂后改变了,但这种改变更多地发生在发展过程的制度框架方面,而不是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

关于苏联或苏联式的经济现代化战略,已经有了大量的分析文献<sup>②</sup>,因此,对这种战略详加描述的任何尝试在这里都是多余的。所以,我们将局限于对这种战略做以下三点总结。

第一点,通过大量投资建设新工业生产能力实现很快的工业增长(“高速工业化运动”)。这要求以消费份额降低为代价,使国民收入中的积累份额(积累率)迅速突然地上升。从理论上说,消费的下降不一定是绝对的;它可以相对于没有加速增长时所可能达到的水平而言。不过在实际上,开始阶段的绝对下降却是一个规律,特别是在考虑到每个雇员的实际报酬不同于人均消费时,情况就更是如此。尽管无论是在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还是在东欧国家相应的计划中,消费的降低都不是计划中的,但是,它们却作为战略的必然后果而被看作是计划的组成部分的。同时,应当把投资和消费并行增长的乐观

设想看成是一种主要来自于一厢情愿的想法。对于牺牲消费的认可暗含着两个重要假设：一是牺牲只是暂时的，因为最终的消费水平肯定要高于没有加速所能达到的消费水平。用增长理论的语言来说<sup>③</sup>，只有在投入产出率（尤其是边际资本/产出率或 ICORs）不提高和稳定增长的情况下，这种肯定性质才能得到合理的说明。这已经被证明是不现实的。另一个假设是，每个雇员真实收入的任何下降都会因为家庭收入的提高而得到补偿，因为就业人数增加了。这种就业人数的增加是工业化初始冲动的主要的和首要的源泉。这种补偿同样被经常证明不会发生，而且即使发生，与收入的联系也是随意的，与完成的工作量没有关系。就社会各阶层之间积累负担的分配而言，最初的想法是把负担主要转嫁给农民。不论是由于必须避免集体化灾难带来的农业的完全崩溃，而对农村追加投资（如在苏联），还是或多（中国）或少（东欧）地公开放弃了这一思想，这种想法反正是失败了。这并不是说农民并没有遭受巨大的苦难（尽管可能没有一个地方达到像苏联那样的程度），而只是说苦难扩展到了全体人民身上，包括产业工人在内。

苏联战略的第二条原则是有选择的、不平衡的增长，把资源集中于所谓“增长的引擎”部门和活动中去。用这种方法走出一条捷径，不必经过通常的消费顺序即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而等待来自需求方面的刺激。事实上，这个顺序被斯大林完全颠倒过来了<sup>④</sup>：投资优先于消费，工业优先于农业，重工业（尤其是机械工业）优先于轻工业，生产优先于基础设施，教育（特别是技术教育和职业教育）优先于住房。选择还适用于各种生产技术。优先部门并不单纯限于应用现代技术，即使在优

先活动中,现代技术也到处与非常原始的方法并存(例如工厂内的运输)。此外,强制劳动以及在较小程度上的动员方法也被看成是节约资本的办法(不用说,这并不是强制劳动在工业化运动中仅有的经济意义)。无论如何,中国流行的著名的赶超口号“两条腿走路”所表达的基本方针在苏联和东欧也付诸实践了,尽管不像在落后的中国后院钢铁生产中那样强烈。

第三个战略因素是最大限度地使用现有资本和劳动资源,而无视常规的成本计算,特别是在微观层次上。这有多种形式。最重要的大概是把产出和就业扩展到盈利标准认为合理的那一点以上;除了其他的办法,这一点是通过增加倒班次数和雇用技术不太熟练的劳动力做到的。产出的迅速增长是至关重要的,特别是在新的生产能力正在形成、但还没有开始运转的巨额投资计划的第一阶段。但在同时,使现期产出和就业最大化的倾向与使可以再投资的剩余的最大化要求是相冲突的。<sup>⑤</sup>这是一个明显的目标冲突。它通常再一次通过对工资的额外压缩得到解决,而这种压缩也不是在货币工资的意义上而是通过公开的、隐蔽的或抑制性的通货膨胀进行的;对住房建造、维护和修理方面的忽略,也属于同一类型。对实物上可用但经济上过时的设备的保存是偏好产出而不顾耗费的另一种表现。所谓社会主义消灭了资本设备的“精神磨损”的声言,为这种方法提供了理论上的辩护。人们也可能把苏联式发展战略的这一特征归因于外贸政策中进口替代(而不是比较优势)居于主导地位。对比较优势原则的屏弃,还可以从一个国家,不论其规模和自然禀赋如何,都试图建立起一个尽可能自给自足的、门类齐全的产业结构,尤其是冶金业的尝试中看到。遍布整个东欧的巨大钢铁联合体成了这种政策的象征,这



在某种程度上肯定是由与当时的流行教条相一致的军事考虑决定的。

这一最为简明的总结最适合于苏联东欧直到 50 年代中期或中国 50 年代后期实际执行的政策。随后发生的变化很多,方向各异,但这些变化并没有导致一个前后一致的新战略。其中一些变化将在以后联系到体制改革时加以讨论,不过,从这里研究的问题出发,我们可以限于以上所说的内容进行讨论。

苏联式战略在排除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不成熟的障碍方面取得了多大的成功呢? 尽管从“长驱直入社会主义”理论的内容看,这好像是一个合理的问题,但是根据“现实的社会主义”的经验,它的合理性就变得有疑问了。为使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成为自然的事情,必须按照未来发展的要求,在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方面达到成熟状态——马克思和熊彼特都是这样认为的。换句话说,首先有现代化,然后才会发生社会秩序的转变过程。而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实际发生的却与此相反:社会秩序的转变——生产资料的国有化、中央计划替代市场成为主要调节手段等等——在现代化运动以前,至多在其早期阶段就已经发生了,并最终被认为是现代化运动的不可缺少的伴侣。当然,建立新的社会秩序的目标从没有被化解为它的实现现代化的功能。如同共产党所界定的,社会的社会主义转变就是目的本身。对这一目的的教条主义的解释经常与单纯发展上的好处相冲突。反对那些即使不完全是虚构、也经常是人为恶魔化的阶级敌人的斗争使“现实的社会主义”遭受了严重的损失;令人不寒而慄的苏联经历,特别是伴随“把富农作为一个阶级加以消灭”而来的农业集体

化,对于其他国家避免类似损失也没有起多大的作用。然而,现代化的任务总是存在的,有一些领导人甚至以教条主义的过火行为是为不受束缚的经济发展创造有利的制度条件所必需的为理由,证明这种过火行为是正当的。

所以,同前已阐述的列宁的看法更为接近,“现实的社会主义”的实践不仅意味着有关事件预期进程的时序的颠倒(现代化在后,革命反而在前),也意味着对依存关系的认知路线的基本偏移:社会主义将不是“赶超其他国家”的结果,而是赶超的重要工具。因此,对苏联式发展战略的效应的正确提问,应是在考虑到这一发展战略和经济、政治以及整个社会关系结构的特殊的社会主义过渡形式具有极为复杂的联系的同时,探究它在多大程度上适合于赶超目标。

不言而喻,回答这个问题的任何尝试都会涉及许多复杂问题,从关于苏联、东欧、中国的大量的、特别是从全面比较角度分析的经济文献中,就能看到这一点。<sup>⑥</sup>而且,问题并不仅仅在于,也许主要不在于长期指数的复杂性,特别是由行政决定的价格和汇率造成的在国家之间和时期之间进行静态和动态综合效率的比较中运用通常的比较尺度的困难。在我们看来,最难的问题之一是评价标准问题,也就是对一个追求确定目标的政治力量所自觉启动和实施的发展过程的成本和收益的界定问题。成功的标准应是公开宣布的(stated)目标(共产党领导的“用文辞直接显示的偏好”),如赫鲁晓夫关于80年代初进入共产主义较高级阶段的规划,还是被人们批评(imputed)的目标,如强化共产党权力制度或取得超级大国地位?这不是抽象的学术问题,因为可能已经用于资源配置的这类标准导致了对其他可能目标的损害。我们之所以提及这些问

题,并不是因为我们能够在全面评价中赋予它们任何特殊的重要性(我们肯定不能),而仅仅因为不能忽略它们。从我们称为被人们批评的目标看,这种战略可能已经证实了自己的可行性:无论如何,在近一个世纪的长期存在过程中,“现实的社会主义”的疆域已经引人注目地扩展了;到现在为止,已建立的共产主义政权(随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来的存在时间很短的形式\*除外)一个也没有垮掉;苏联也已经取得了全球超级大国的地位,如果考虑到征服宇宙的情景,或许可能不止于地球。但是,不管这些成就及其意义有多大,社会主义的承诺是否已经实现却不应由这些标准来衡量。一个摆脱了资本主义桎梏的合理经济从常规的经济和福利指标看,应该特别恰当地运行。如前面提及的那样,应用这样的指标会引起大量的技术难题,对于这些难题的有争议的说明,我们勿需多加考虑。不过,看来仍有可能勾勒出一幅大概的图画,用以描绘“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努力的效果;对于我们的目的来说,这大体上也足够了。

首先,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都公布了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总增长率。自1928年苏联式的发展战略实施以来的半个世纪里,苏联官方统计宣称其年复合增长率(国民收入=净物质产品NMP)几近9%,包括发生战争的几年在内;美国对苏联国民生产总值的估计差不多是这个速度的一半,但这也仍然高于除日本以外的任何一个西方主要国家的增长速度。<sup>②</sup>从总体看这种格局也重现于东欧国家,1950年到

---

\* 指一战后匈牙利、德国巴伐利亚等地建立的苏维埃共和国,存在时间最长的也只有几个月。——译者注

1980年的30年间,东欧国家的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根据官方数字)如下:罗马尼亚9%以上,保加利亚8%,波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南斯拉夫约为6%,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5%左右。<sup>⑧</sup>中国的官方数字是,1952年到1981年为6%。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52—1957),中国紧紧模仿苏联模式,年增长速度达9%。无论比较绩效的详细研究的结果如何,毫无疑问,苏联在我们研究的这一时期内,缩小了与西方工业化国家之间的差距,无论是人均产量,还是经济结构(工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城市化等等),都是如此。<sup>⑨</sup>从同一个角度看,东欧国家与欧洲其他处在类似发展水平上开始战后时期的国家相比(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与希腊相比;波兰、匈牙利与西班牙相比;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相比;捷克斯洛伐克与奥地利相比),其纪录给人的印象就较为逊色。人们普遍承认,总体来看捷克斯洛伐克的相对纪录特别令人失望,当然,70年代末因危机而陷入漩涡的波兰除外。至于中国,与亚洲其余国家相比,她在初始时期要好些,但以后就明显落到了新兴工业化经济的后面。

大体上可以说,苏联式发展战略的初始总目标(迅速创建或显著扩展经济的工业基础,特别是采掘工业、钢铁工业和重型机械制造业)已经大体上达到了。在这个意义上,在推动经济向政治领导人希望的方向发展的意义上,集中计划证明是可行的工具;然而,很难找到真正完成了的具体计划,不仅整个的指标体系从来没有完成过,甚至预期的产量增长指标也是如此。

第二个一般结论是,在增长的耗费方面,不论从单个计划看,还是连续地观察,这些计划都失败了。甚至在狭义的经济

意义上(即不把在肉体恐惧成为苏联式发展战略实施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一时期内的庞大死亡人数和人类灾难计算在内),作为一般规律,实际耗费都大大超出计划估算的数字,从任何标准看都非常高。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与产出有关的投入(劳动、原料、资本)密集度过去曾经并且现在仍然比主要工业化国家和处于类似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国家都高得多。原材料密度(与国民收入相对比的能源、钢铁、水泥等等的耗用)和增长过程中的动态资本密集度尤其如此。苏联的资本生产率变化率在整整半个世纪中都是负数,在最近的 25 年中下降得极为明显。经互会国家的边际资本/产出率(ICORs)(投资和国民收入增长间的关系)在战后明显上升,而且总体上比西欧增长得快。由于结构变化和格申克龙所谓模仿技术进步的“后发性优势”(advantage of backwardness),苏东国家劳动生产率的长期增长看上去更有利。但就是在这个方面,“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大大落后于西方,工业中冗员过多还招致了对厂内存在隐蔽失业的责难。

苏联式发展战略的目标的性质,以及与之相伴随的高耗费特征对环境问题也产生了广泛的消极后果。而过去曾经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具有“内化外部性”的预期能力(见第 1 章),才关心环境问题。实际上,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强制实现严格选定的目标上的和只要认为长期影响干扰了选定目标就对这种影响置之不理的专断,经常导致对环境的损害,其损害的程度极其严重。与理论假设相反,事实证明,单一的生产资料国家所有制对于防止污染、毁林和其他形式的破坏自然平衡的行为,与其说是帮助,不如说是障碍。具有两个相反身份的国家(一方面被假定为

环境的保护者,另一方面作为资源的配置者和触犯环境保护法规的企业的所有者)发现自己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甚至不可能有效地运用与损害环境的行为作斗争的传统手段(罚金等等)。管理经济的命令体制加剧了问题的严重程度。

一般结论的第三个方面是,经常接近于“为生产而生产”状态的增长的高昂成本,必然对消费的动态变化产生不利影响。尽管对于积累率急剧上升的初始时期内强加到人们身上的牺牲,曾经许诺给予充分的补偿,但这种许诺实际上从未实现过。甚至在50年代中期和70年代早期之间的许多年间,尽管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生活水平的提高一般说来相当稳定,但生活水平的改善和总体产出增长仍然不成比例。西欧和东欧国家之间的所有比较也都表明,就消费者得自增长的好处而言,东欧国家在这一相对顺利的时期也处于明显的不利地位。在70年代和80年代,当消费者满足问题在政治上变得十分敏感时,政府才设法保护消费,首先靠向国外借款(或为此动用意外获得的利润,如苏联),然后靠降低积累份额。但其效果却微乎其微,同时,由于难以通过更有效地利用资源而补偿减少了的资源流入,所以,长期的发展也受到威胁。人们不应当忽视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中还存在一些可以抵消消费水平及其动态变化的不利之处的因素。这包括:经常处于过度就业状况下的工作保障、较为平等的收入分配、不存在巨大的财富差距,以上这些,被某些社会分析家看作是对抗可见于西方城市内败坏地区、更不用说在第三世界的贫民窟的一无所所有状态的保证。问题的另一面则是,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人们面临着日常短缺的困苦及对国家分配机器的从属。我们做出

这些评论,并不是打算提供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消费领域中的绩效平衡表,而只是指出高昂的增长成本和增加福利的潜力下降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人们也不应该忘记军事负担对消费的消极影响。

第四,苏联和东欧国家迄今所追求的增长方式和实现的那种现代化,并没有预示未来的发展会有一个好兆头。最近1/4世纪增长的减速在规模上和持续性上都是非同寻常的,整个地区的经济滑坡只在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66—1970)中断过;苏联之外的东欧国家还在1971—1975年期间有过另一次暂停下降,那是因为当时这些国家从国外筹借了大量贷款。一般说来,计划者在制定计划时力求通过把计划增长率定得低于上一期实际达到的水平,把下降的因素估计在内,然而这些要求较低的计划也照样没有完成。各国的情况又有差别;东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GDR)的统计数字表明,它的减速幅度最小,有能力把增长率稳定在新的水平上。但一般国家(至少直到80年代中期)都存在着持续下降的趋势,而这是很难用欧洲社会主义国家达到的成熟程度较高这样的理由来解释的。其原因(80年代后期西方专家和共产党领导人,首先是戈尔巴乔夫,令人惊讶地一致接受这种说法)在于没能用提高资源的使用率来弥补可用资源供应的减少,或者是(如广泛采用的口号所讲的那样)没有满足从“粗放的”(extensive)向“集约的”(intensive)增长方式转轨的要求。这不是十分精确的说法,因为这些理由可能意味着把苏联和东欧过去的增长仅仅归于生产要素供给的增加,没有任何“剩余”(即单位要素投入的产出增长)。事实上,受到更好教育和训练的劳动力的大量增加,藉以实现技术进步和组织进步的资本的同样大量的增

加(由于模仿、借款和其他原因),肯定导致了综合要素生产率(TFP)某种程度的相应提高。<sup>9</sup>不过,这一口号也反映了对这样一种迫切需要的认识:不仅要阻止与过去相比、尤其是与非共产党国家相比的效率水平的下降,还要有所提高。上述缺陷同这些国家所遵循的发展战略之间的联系还没有被人们所接受,至少没有在谈到存在的缺点时明确地和一致地把二者视为同一。不过,本书作者属于那些充分认识到这一联系的人,并认为“保守的现代化”(conservative modernization)<sup>10</sup>这一用语可以恰当地描述苏联式发展战略的结果。这个与现代化的概念本身和公开宣布的共产主义的革命性质相对照,都有些自相矛盾的响亮用语,一方面很好地反映了在克服落后状态上的无可否认的进步,另一方面也很好反映了它缺乏持续变革的倾向。在以下三个相互联系的领域,可以特别清楚地看到这种种变革倾向,即由现代化经济产生进一步现代化动量的倾向的缺失状况。

**技术** 对技术水平低于“技术前沿”的国家来说,它们的技术进步主要是模仿性的。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在一定阶段上,这应当产生刺激国内技术成长和产品创新的溢出效应。社会主义国家缺少的正是这一点,尽管它们对科学研究做出了大量投资,具有发达的教育制度,并且废除了商业秘密(原来设想废除商业秘密能够积极保证企业之间、部门之间和国家之间的信息流动不受阻碍)。

**结构** “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传统产业方面一直是比较成功的。过去,这些产业可以恰当地被认为是增长的引擎,但后来它们(如钢铁业和某些重型机械部门)失去了这种作用;尽管如此,它们仍占据着主导地位。不过,跃进到前沿技



术的产业如电子、塑料、人造纤维、新药品，一个也没有；通常的情形是有一个时滞尾随在后面。上面要求的那种结构变化在任何条件下都是困难重重的，但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过程之缓慢却极为突出，而且原认为长期计划能够预测和把握未来趋势。

**对外贸易** 尽管工业化取得了进步，但社会主义国家和西方之间的贸易还是打上了不发达的所有烙印：出口的主要是初级产品，进口的却是制成品（尤其是含有高技术成分的）。在这方面，除了初级产品的出口能力下降、制成品出口潜力没有补偿性的上升以外，时间没有使任何情况发生；这是国际收支长期出现困难的核心所在。

“保守的现代化”不能令人满意吗？答案同样基于使用的标准。从第三世界和大量可称为处于中等发展水平的国家的角度看，判断不应是绝对否定的。目前，欧洲社会主义国家毕竟没有一个（阿尔巴尼亚除外）属于不发达的范畴。进步一直是明显的，而且这种进步伴随着其他处于同等或更高发展水平上的国家所几乎不可能达到的社会保障程度。即使相对地说，令人不太振奋的未来前景看起来也并不是太糟糕，特别是当现实地认识到，“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作为一个团体所面对的威胁不是经济的崩溃，而是低的或非常低的增长时，则更是如此。

但是，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主导情绪却是深深的不满。这在苏联尤其引人注目。在那里，勃列日涅夫统治末期的对现状的肯定已经让位给戈尔巴乔夫宣布的改革（perestroika）政策——这被描绘成一次将再次刺激经济快速扩张的革命性的变化，并认为这一次的经济扩张将会持续下去，且以充分利用

效率潜力为基础。

对过去经济绩效记录的明确的而且日益公开道出的不满意,在何种程度上是由对社会主义形象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担心推动的,在何种程度上又是由实用主义的考虑推动的?要确定两者的相对重要性简直是不可能的,甚至是没有必要的;两者目前结合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密切。由于社会主义跑得未能像预期的那样快,也由于资本主义拒绝原地踏步,所以,赶超目标一直没有达到。令人痛苦的意识形态结果的第一次表露,是用“发达的社会主义”公式取代了赫鲁晓夫鲁莽的具体许诺“完全的共产主义”,这也跟着逐渐地打折扣到“发达社会主义的初期阶段”和类似的保留面子的称呼。<sup>64</sup>在中国,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实际上后退得如此之远,以至于把国家定位在长期的社会主义过渡的初级阶段。总之,对于赶超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而是一种不停的竞争,还存在着差距不仅会保持下来甚至还会扩大的明显可能性的认识,已经导致官方理论家降低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完成程度。同时,现实的压力变得越来越大。尽管苏联在世界范围内的地位成功地提高了,尽管在国内仍然保持着共产党的政权,但不得不承认,经济绩效的恶化对以下两个方面都构成了威胁:技术进步的停滞从长期看对军事力量的平衡是危险的,不能满足增长着的消费者愿望对国内政治制度是危险的。从后者的角度来看,东欧的报警讯号,尤其是80年代的波兰危机,已经严重到足以使警钟响彻“现实的社会主义”的整个疆域。

因此,“保守的现代化”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目标是使经济充满活力——但不是靠积累负担的快速增长,而是靠创新、较高质量、投入产出比率的降低、利于现代产业和技术的产业重

组和向西方出口从初级产品到制成品的转变等等所有这些因素引起的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与过去的高度选择性相对照,需要强调的是平衡增长,并在生产领域和消费中使供给与需求相匹配。

人们不应低估确认缺陷之所在并制订弥补方案的意义,特别是在一个像苏联这样的国家,在那里,统治集团在如此长的时期内如此顽固地向外部世界提供一个玫瑰色的形象,以至于他们自己也成为自我欺骗的牺牲品。但关键问题在于实施,苏联和东欧国家数十年来一直努力从经济运转的“粗放格局”中解脱出来,但是都白费气力。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不久发动的“新路线”可以被看成是这种努力的第一次尝试。它宣布的政策是:降低计划的严格性,提高那些在资源配置中一直受忽视的部门的地位(农业、消费品、服务以及以科学为基础的产业)。不仅为了消费,也为了改善供应状况,通过削减导致建设周期延长的大量建设项目的数量来提高效率,投资率被降低了。对消费者利益的更多关注为强化激励提供了基础,从而也有益于效率的提高。尽管这种资源再配置的大部分随后都发生了逆转,但是,斯大林时期以后经济政策的总的路线还是基本上不同于过去了:投资负担再没有上升到先前的高度;农业(某种程度上还有轻工业)在资源配置中的份额增加了;实际收入增加了,尽管缓慢些。不过,经济的紧张状态仍然存在,预期的经济集约化也没有实现。70年代增强经济活力的另一次尝试也失败了,当时几个国家推行“进口牵引增长”的政策。大量注入来自贷款或能源出口意外利润(如苏联)的附加资源,包括西方技术,结果不仅没能抵消社会主义经济的内在弱点,实际上反而使这些弱点暴露得更严重。

用各种政策变化来改善经济运行的连续失败的经历,证实了许多经济学家早已提出、匈牙利学者亚诺什·科尔内特别清楚、全面地发展了的这样一种观点:未能取得成功的原因是制度性的。<sup>①</sup>正是经济运行体制,也就是说正是经济机制,才会在计划的任何一种松紧水平上都复制紧张,才浪费资源并因此挡住了通向生活水平提高的道路。到80年代中期,大约在经济改革方案第一次制定出来的30年之后,大多数共产党领导人,包括两大巨人苏联和中国的领导人,都认为“现实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需要彻底的改变。这使我们有必要回过头去,对“现实的社会主义”在迄今为止的存在期间一直占支配地位的经济体制的本质进行一番考察。

## 注 释

- ① Vladimir I. Lenin, 'O nashey revolutsii' ('On Our Revolution'), in *Sochineniya (Works)*, 5th ed, vol. 45 (Moscow, 1964), 378. 参见弗拉基米尔·伊·列宁:《论我国革命》,《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71—372页。
- ② 对苏联发展战略的简明描述可见 Alec Nove, *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SSR* (Allen Lane & Penguin, London, 1969). Alexander Erlich 在其著作 *The Soviet Industrialization Debate 1924—1928*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 1960)中也对这一战略执行过程中的理论和政策争论作了最好的说明。本书作者也同意 Gregory Grossman 从历史的角度对苏联发展战略所做的全面评价。见 Gregory Grossman 'Economics of Virtuous Haste: A View of Soviet Industrialization and Institutions', in *Marxism, Central Planning, and the Soviet Economy: Economic Essays in*

- Honor of Alexander Erlich*, ed. Padma Desai (MIT Press, Cambridge, Mass., 1983).
- ③ Michal Kalecki,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Growth in a socialist Economy*, English edn (Basil Blackwell, Oxford, 1969).
- ④ Yosif V. Stalin, 'Ryeč na predvibornom sobranii izbirateley Stalinskogo okruga goroda Moskvy 9 Fevralya 1946 g.' ('Speech at the Pre-electoral Meeting in the Stalin Electoral Precinct of Moscow 9 February 1946,'), in *Works*, vol. 3 (XVI) (Hoover Institution, Stanford, Calif., 1967), 14—15. 参见约瑟夫·维·斯大林:《在莫斯科市斯大林选区选举前的选民大会上的演说》(1946年2月9日),《斯大林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8—500页。
- ⑤ Maurice Dobb, *An Essay on Growth and Planning* (Routledge & Kegan Paul, London, 1960); Amartya K. Sen, *Choice of Techniques* (Basil Blackwell, Oxford, 1960).
- ⑥ 关于苏联的情况,参见 Abram Bergson, *The Real National Income of Soviet Russia since 1928*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 1961); Abram Bergson and Simon Kuznets (eds), *Economic Trends in the Soviet Un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 1963); Rush Greenslade, 'The Real Gross National Product of the USSR, 1950—1975', in *Soviet Economy in a New Perspective*,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76); and Laurie Kurtzweg, 'Trends in Soviet Gross National Product', in *Gorbachev's Economic Plans*,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87)。对东欧国家经济增长的分析,见 Thad P. Alton, 'East European GNPs: Origin of Product, Final Uses, Rates of Growth, and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in *Slow*

*Growth in the 1980s*,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85); Thad P. Alton, 'Comparison of Overall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East European Countries', NATO Economic Colloquium, Brussels, 1988; Peter Havlik and Friedrich Levcik, 'GDP of Czechoslovakia, 1970—1980', study prepared for the Second Workshop on CPE National Income Statistics, World Bank Staff Working Paper 772, The World Bank, Washington, 1985, and Stanislaw Gornulka, 'Industrialisation and the Rate of Growth: Eastern Europe 1955—75', in *Growth, Innovation and Reform in Eastern Europe* (Wheat-sheaf, Brighton, 1986)。

- ⑦ 据西方估计,苏联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平均年率)在1929—1940年期间为5.1%,1941—1950年期间为2.1%,1951—1975年为5.2%,1976—1985年为2.1%。因此,1929—1985年整个时期平均为4.1%,如果把1940年至1950年这些不具代表性的年度排除在外的话,则平均为4.5%。这两个平均数都高于除日本之外的所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百年来的平均增长率。不过,如果分析限于1951—1985年间,苏联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虽然仍为4.2%,却与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的平均增长率没有多大差别了。当然,与30年代的经济停滞相反,后一组国家在战后时期的增长大大加速了。参见 Paul R. Gregory, 'Economic Growth and Structural Change in Czarist Russia and the Soviet Union: A Long-Term Comparison', in *Economic Welfare and the Economics of Soviet Socialism: Essays in Honor of Abram Bergson*, ed. Steven Rosefield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81); Paul R. Gregory and Robert C. Stuart, *Soviet Economic Structure and Performance*, 3rd edn (Harper and Row, New York, 1986); and Kurtzweg, 'Trends in Soviet Gross National Product'。值得指出

的是,苏联官方公布的总产出增长率现在正受到来自苏联国内的批评。在修正苏联的官方数字方面这种批评不仅支持了西方的估计,而且有时走得更远。因此,1929—1985年期间的增长率水平已经被计算为3.2%—3.5%,差不多比上述4.1%的增长率低出1个百分点。参见 Boris Bolotin, 'Sovetsky Sojuz w mirowoi ekonomike, 1917—1987' ('The Soviet Union and World Economy, 1917—1987'), *Mirovaya Ekonomika i mezhdunarodnye Otnosheniya (MEMO)* no. 11 (November 1987), cited in Anders Aslund, 'How Small is the Soviet National Incom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Hoover-Rand Conference at Stanford University, 23—4 March 1988, Kennan Institute, Washington; and especially the famous article of Vasily Selyunin and Grigory Khanin, 'Lukavaya tsifra' (The Cunning Figure'), *Novyi mir* 63 (2) (1987)。

- ⑧ Laski 和 Askanas 发现,波兰官方公布的1965—1978年期间的个人消费增长率(平均年率5.4%)应该减去大约两个百分点,因为其价格膨胀没有公开。Benedykt Askanas and Kazimierz Laski, 'Consumer Prices and Private Consumption in Poland and Austri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no. 9 (1985)。Havlik 和 Levčík 也得出结论说,捷克斯洛伐克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在1971—1980年为1.7%,而官方公布的数字为4.7%(尽管是纯物质产品数字)。Havlik and Levčík, 'GDP of Czechoslovakia', 33 and 37。据 Alton 分析,1966—1980年间的增长率:保加利亚为5.3%(而官方公布为7.5%),捷克斯洛伐克为4.5%(5.4%),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为4.5%(4.9%),匈牙利为4.2%(5.4%),波兰为5.6%(5.7%),罗马尼亚为7.9%(8.7%)。在他看来,现在官方对增长率的夸大虽然大大减小了,但仍然存在。见 Alton, 'East European GNPs', 第109—110页。并参见 Comecon Data 1985。

ed. Vienna Institute for Comparative Economic Studies (Macmillan Press, 1986), 50.

- ⑨ 据美国中央情报局估计,如果转换成美国的购买力平价,1985年苏联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大约是美国的一半水平。CIA, *Handbook of Economic Statistics 1986* (Washington, 1986)。Aslund 得出的结论是,这一估计应当减半,1928年以来,与美国相比,苏联的经济地位一直没有提高。Aslund, 'How Small is the Soviet National Income?'. 应该强调的是,根据国际比较项目(ICP)所说,1985年匈牙利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美国水平的31.2%。如果CIA和ICP这两个估计都正确,那么,在人均总产出上苏联就会比匈牙利高60%左右。而普遍承认的则是这两个国家的人均总产出十分近似。参见 *Purchasing Power Parities and Real Expenditures* (OECD, 1985);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of Gross Domestic Product in Europe 1985*, (United Nations, in print), 也可参见 Peter Havlik, *Comparison of Real Products between East and West, 1970-1983*, Forschungsbericht 115, Vienna Institute for Comparative Economic Studies, April 1986; Irving B. Kravis, Alan Heston, and Robert Summers, *World Product and Income: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of Real Gross Product*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for the World Bank, Baltimore and London, 1982); Paul Marer, *Dollar GNPs of the USSR and Eastern Europ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Baltimore, 1985); and Robert Summers and Alan Heston, 'A New Set of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of Real Product and Price Levels Estimates for 130 Countries, 1950-1985',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no. 2, June 1984。
- ⑩ 这可以用苏联1961-1985年间的国民生产总值与要素投入的增长资料(平均增长年率)加以说明。(Kurtzweg, 'Trend in Soviet Gross National Product', 131-5);



期 间	GNP	要素投入品*			要素生产率**
		劳动	资本	综合投入	
1961—1965	4.8	1.5	8.8	4.5	0.3
1966—1970	5.1	2.0	7.4	4.2	0.8
1971—1975	3.0	1.7	8.0	4.3	-1.3
1976—1980	2.3	1.2	6.9	3.6	-1.2
1981—1985	1.9	0.7	6.2	3.0	-1.0

\* 不包括土地。

\*\* 国民生产总值(GNP)增长率减去综合投入品增长率。从 1971 年起,综合要素生产率就下降了。如果把 1928—1985 年整个时期(1941—1950 年除外)纳入考虑,苏联的综合要素生产率则一直是提高的。在产出、劳动和资本的年平均增长率大约分别为 5.2%、2%和 8%的同时,综合要素投入品增长大约为 3.8%,要素生产率大约为 1.4%。根据这一计算,投入品增长说明了大约 3/4 的产出增长,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则只说明了 1/4。在同一时期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中,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则说明了大约 2/3 的产出增长。Gregory, 'Economic Growth and Structural Change', 45—6.

- ① Włodzimierz Brus and Tadeusz Kowalik 在 'Socialism and Development'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no. 7 (1983)) 一文中运用了这一术语。
- ② 苏联这一提法的原文是“我国已经进入发达社会主义阶段”。这一提法在苏共 27 大通过的所谓“新版本”党纲中得到采用。
- ③ Janos Kornai, *Economics of Shortage*, English edn (North-Holland, Amsterdam, New York, Oxford, 1980)。参见雅诺什·科尔内:《短缺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 1987 年中文版。

# 4

## 命令体制

我们研究的主要是“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但在转向这个问题以前，简短讨论几个更一般的问题还是适宜的。

第1章对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合理性声言的考察清楚地说明，在那种想象境界中，已经假定社会成员的经济行为基本上改变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被认为是纯粹共同的、因而消除了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差别的基础上，预料经济人与社会人将结合在一起，竞争将被分享和合作的精神所取代。尽管人们承认在这个崭新时代的初期不能完全克服劳动异化，因而为了把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充分结合起来，还不可避免地要在一定时期内实行按劳分配，但一种新的激励体系的内在基础还是处于适当的位置上。这种构想显然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物质和文化两种意义的成熟条件联系在一起，其中，文化意义的成熟条件用葛兰西的语言来说，就是反映了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

几个层次的显著差别使这种想象和“现实的社会主义”的现实分离开来。第一，理想化的“新人”概念在任何条件下都显然是乌托邦的空想。第二，“现实的社会主义”是在不成熟的条

件下产生的。根据马克思的理论本身(不管怎样看待社会主义革命的合理性),这种不成熟性使新的态度在未来的长时期内都不可能产生。第三,甚至在属于土生土长的革命的情况下,也至少有一个人数众多的少数派反对新政权(在俄国,从立宪议会选举的结果判断,可能是多数),而在东欧,人们怀着很深的敌意接受新政权,因为这不仅不是他们自己想要的,而且是外界强加的。第四,随着政治多元性被彻底消除,国家权力就由共产党所独占,这不能不与国家所有制是一种共用品的思想相抵触。第五,尽管这个单一政党,或者说是其执政精英(一般)按原先规划的方案向前进发,但同时却更进一步使人民异化了,并且更多地求助于强制。我们将不详尽叙述这已简洁清楚地陈述了的几点,但把它们罗列出来却会有助于我们辨识设想的和现实的激励结构之间的鸿沟。这并不是说原先期望的社会主义态度完全阙如;但它肯定没有占支配地位,并且越来越减少,而不是日益增长。

在“现实的社会主义”的历史上,对期望与现实之间这方面的差异的认识在1921年“战时共产主义”向著名的“新经济政策”(NEP)的转变中第一次用实际政治的语言表达出来。列宁强调指出,在根据共产主义原则组织生产和分配时,单纯依靠热情是一个错误,个人物质利益和经济核算(khozraschet)必须起到同等重要的作用。<sup>①</sup>直接间接地与市场运作相关的物质刺激,以及较大的私人经济活动范围,都是“新经济政策”的特性标志,这在所有“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革命后的最初时期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再次实施。不过,这些国家再次出现相同现象(如果不是相同的,至少也是非常类似的);几年之后,含有大量市场调节的混合经济被以

命令体制(本书作者之一使用的概念是“集权体制”)”<sup>2</sup>而闻名于世的经济运行制度所取代。这种经济机制变化和苏联式发展战略的推行在时间上的一致性,提出了二者的相互关联问题——一个“现实的社会主义”历史的研究者之间争论不休的问题。

高速工业化政策和经济运行制度之间相互作用的复杂性,由于加入了对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是一种直接计划的、不存在市场的经济这种设想的意识形态上的忠诚因素而增大了。“当然,无论是1918—1920年的“战时共产主义”,还是苏联由农业集体化、私营部门的消除和经济管理集权化所导致的新经济政策的终结,以及其他国家同样的政策,都不能单纯用意识形态考虑来解释,但这种幻想的作用还是很大的。它在党的忠诚分子中间产生了一种很强烈的偏好,把实现包罗万象的国家控制的每一行动都看成是迈向正确方向的一步;越是国有化和集权化,越是社会主义。它使实际措施超越了从所采取政策的实际效果看是合理的限度,并使之长期存在;它也逐渐灌输了这样的观念,即,向相反方向采取的任何步骤(更多的市场协调、刺激和非国家控制的经济活动,等等),都是令人遗憾的暂时妥协和被迫退却,都是一有机会就要停止的。因此,对于一直没有做出任何努力,维护那种即使在政府全面的宏观经济计划框架内开展大规模投资运动期间都不一定非要取消不可的一定范围的个人利益和个人活动,意识形态因素必然至少要承担一部分责任。

不过,在记住意识形态影响的同时,也不能忽视苏联式发展战略和经济运行制度之间的密切联系。这种战略不能不依赖国家强制,使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根据设定的目标和选定

的达到目标的道路进行配置。不仅不能指望全体居民把国家政策作为自己事务的一部分,物质刺激的一般条件和范围也变得与过去熟悉的根本不同了。所谓一般条件的变化,我们意指扩张性的增长政策和各种制度因素使得对有效总需求的约束消失了。经济不是由需求决定,而成为由供给决定的了。这虽然消除了过剩资本、过剩劳动与未满足的需求共存的荒谬现象(见第1章),但与此同时,来自为产品和生产要素寻求市场而奋斗的刺激也弱化到消失的程度。随着短缺的增长,这很快就导致了供给者对消费者和生产要素使用者的完全支配。至于所谓物质刺激范围的变化,我们主要是指由消费品供应短缺产生的限制,这经常导致正式或非正式的配给制以及对居民自愿储蓄刺激的弱化。

无论是从“热情”这一端看,还是从“刺激”这一端看,社会主义经济都完全没有给个人或集团的自主活动留下余地。因此,对国家来说,像过去那样从外部控制和管理经济单位的行为就不够了。国家不得不在宏观和微观两方面成为经济活动的当事人本身,从而保证储蓄的产生和收集,进行投资、生产和分配。此外,国家对有关发展战略的经济决策的垄断并不简单地意味着产生了一个巨型企业(如西方文献中有时称谓的“苏联公司”)。经济力量同政治力量和警察力量搅在一起。尽管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形成伊始共产党的一党统治已经确立了,因此不可能只来自于急迫的工业化政策,但在这一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其政治控制最严厉,个人偏好对国家至高无上的偏好的从属也达到了极点。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强制模式**(coercive model)<sup>①</sup>是对苏联式发展战略实施机制的恰当描述,尽管当时没有达到苏联集体化运动和30年代后期大清洗

时的极端恐怖状态,或者处于斯大林统治下遍及东欧的那种状态。命令体制于是就成为强制模式的含义较狭窄的经济组成部分。

经济文献对命令体制描述得是如此频繁和如此详尽,以致我们感到没有必要再作提供一幅完整图画的尝试。下面我们只从两个角度进行讨论:一是它和现代化战略具有怎样的关系,二是它怎样促成了保守主义结果。

在第3章,我们对发展战略的总结性说明集中在三个主要方面:积累率急剧上升带来的快速增长,选择性增长,产出和就业的最大化。命令体制对完成这些任务具有怎样的作用呢?

理想积累率的强制实施是通过对国家作为一体化的生产者、雇用者和卖者为一方,家庭作为另一方这两方之间的“交易条件”的严格控制进行。(在所有“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中,都存在私人经济的残余,如波兰农业,其中私人成分甚至有很大的经济作用;但这里我们把它略去了)。国家和家庭之间的经济联系(原则上)通过市场进行;家庭从在国有部门工作得到货币收入,用来购买国有部门出售的商品和劳务(集体农庄被看成是国有部门的一部分,经济中的自给自足部分未予考虑)。强制储蓄机制由对这些市场或准市场关系的行政规制组成,它是通过决定价格和工资,并结合对特殊敏感领域进行的实物控制进行的,后者如长期存在的按照象征性价格义务交售来榨取农产品的制度。不仅通过经济压力(低收入水平要求家庭中挣钱者不止一人),而且通过对工作责任的行政规制和广泛利用多种强制形式,劳动总供给也在某种程度上强制增加了。在大部分消费品分配领域,价格机制仍然运转着:自由

程度不等的农贸市场、国营零售贸易。对于后者,原设想价格能够平衡供给和需求,从而提供选择的自由(但不是消费者主权,因为市场信号没有自动传递给生产者)。但是,因为即使在一元统治的政治条件下,单单通过对货币收入的有效控制,也难以使剩余率符合理想,所以,在实际生活中普遍存在公开或隐蔽的定量配给和排队现象。因此,就像前面观察到的,通过隐蔽的和抑制性的通货膨胀征收捐税就成为很经常的事情了。

通过对选定的使用者进行资源的实物分配,就能够实现有选择的发展。这需要给供给单位制定详细的产出计划,包括产品组合、时间序列以及单位功效的费用金额(单个产品的投入/产出系数)。供给和需求双方调整投入和产出安排达到平衡。实物分配即定量配给,应按照规定的时间表通过经济管理的组织层级制进行;这就要求资源从上级到下一层次的行政单位之间作纵向流动,而最终供应者和使用者之间的横向联系就成为纯粹技术性的了。至于劳动配置,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则保持着自由选择职业的原则,因此,在这里工资机制还保留着一定的意义。但也普遍存在着偏离这一原则的现象:准自愿的动员,行政分配,特别是对大学和职业学校毕业生的分配,对人口流动的限制(苏联集体农庄农民所受的限制尤为严重,持续时间尤其长),应征士兵、犯人和劳改人员的直接强制劳动等都是如此。在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所有痕迹实际上都被扫除殆尽了。

通过强制性的计划指标制度追求产出最大化;计划数量和实际数量的关系对从最低生产单位到部委的所有管理组织层次来说都是主要的成就指标。物质生产要素和资金两方面

的供应机制都是为完成计划服务的。成本计算和盈亏帐目显然是存在的,但都只是实物产出和配置决策的结果,因而最多具有事后控制的作用。这样,货币在国有部门中就仅仅充当一个消极被动的角色,这意味着,被称为企业的这种单位处于“软预算约束”<sup>⑤</sup>状态,也就是说不利的财务结果并不妨碍企业按计划产量生产和维持就业。此外,国内经济还由于国家对对外贸易的垄断而同外部影响相隔离。这是因为,对外贸易执行严格,而全面的进出口计划通过区别征税和补贴抵消了国外利润或损失对国内企业的影响(“价格均等化机制”)(price equalization mechanism)。

以上对命令体制原则的粗略描述不仅排除了细节和各个国家的特殊因素,而且也没有考虑不同时期的演变。不过,这一轮廓看来是足以说明运行体制和快速工业化战略之间的联系——这不是说绝对不可能有其他可能的选择(特别是在东欧),而是说这是在同时考虑到了高速工业化发展战略的影响、现存的意识形态框架、政治体制和对计划的一般理解状况的情况下最可能的选择。

现在让我们转向问题的第二个方面:命令体制以何种方式有助于形成“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现代化的保守性?<sup>⑥</sup>

正如前面所指出的,命令体制下的基本计划方法是实物平衡法,这相当于分别校勘投入/产出表的各行和各列,并使之互相适应。但是,因为要考虑的项目数量成千上万,所以就几乎不可能编制一个以各项实物平衡为基础的既无所不包、又相互衔接的计划。结果,制定出来的计划虽然非常详细,却前后自相矛盾,从而注定了是不可能全面完成的。制定不能全面完成的计划也许可以被称为集中计划经济中的“计划的自



相矛盾”。<sup>②</sup>从理论上说,可以在投入/产出技术中通过列昂惕夫矩阵转换找到这一问题的解,这一转换将导致一个相互衔接的中间产品集。但是,统计上可得到的投入/产出表所包含的数据过度聚合;有关详细的技术系数与可供利用的初级生产要素的信息或者根本传递不到计划中心,或者传递到的时间太迟并发生了扭曲。即使不现实地假设可以得到充分详细的信息,还有一个额外的技术问题,即如此高度分解的矩阵的反演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专家认为,原始“平衡法”要比复杂的投入/产出技术更具有优越性,因为它至少能使部分计划彼此衔接。<sup>③</sup>

根据定义,相互不衔接的计划总体看来是不可能完成的,然而在命令体制下,计划却具有强制性。不过,自相矛盾并不到此为止。很少明确表达但实际上却是前提的是经济过程的完全可控性,这构成了计划强制性特征的基础。事实上,经济过程本质上是随机的,也就是说,预见影响经济过程的所有因素是不可能的,而且,也不能把问题归结为计划错误或类似的理由;而必须把经济当事人对意外事件的不可预见的反应也考虑进来。相互依赖的随机过程的协调发展,要求经济当事人的行为具有灵活性,这是与计划的强制性特征相冲突的。<sup>④</sup>

紧接着相互衔接问题的是计划制定过程中的效率问题。这里的关键是既定生产要素利用效果的最大化问题,而这又取决于所有各种产品生产中技术系数的恰当选择。在新的生产能力的形成过程中,技术选择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还有与外贸相联系的另一个效率问题。在这里,相互衔接因素要求进口与出口达到平衡,而从效率角度看,由于存在本国产品替代进口产品的可能性和存在改变出口构成的机会,光是要求进

出口平衡就显然不够了。最后是总产出和诸如消费品与投资之类的次级总量的最佳结构问题。显而易见,为了作出有效的选择,关于每一变量的成本和效应的准确而灵活的信息,也是不可或缺的。

如同我们在第1章中所看到的,马克思主义理想的社会主义仅仅关心资源合理配置的社会障碍的消除,而忽视了一个可能在当时看来是一个纯粹技术性的问题,即可选择做法的成本和效应的相应评价问题,在评价中所用的衡量标准要反映它们的成本和效应的社会关联,并且仍然可以保持对于决策者的选择的独立的参数性质。在市场经济中,这类信息载体的角色不论是好是歹,都是由价格充当的,广义地说,价格包括工资、利率和租金。假定废止了市场,那么无论是从狭义的货物交换关系看,还是从更广义的各种可选择的替代方案的指示器看,马克思的理论都不能为社会主义提供一个可行的价格形成方法。命令体制几乎无法弥补这种残疾。在国有经济中,作为加总工具或控制手段,人们不得不利用价格,但是,由于实物计划占据优势,由于货币的作用是消极被动的,以及由于因此而来的国有企业经理们对价格缺乏反应,价格在效率计算中的作用微乎其微。相当矛盾的是,如果考虑到命令体制下价格的质量(价格对许多的社会成本因素如资本、自然资源和供求状况没有反映,以及行政性的定价方法等等),那么,在决策过程中广泛利用它们可能更加不合理。从既定的或者设想的实物结构计算出来的所谓“影子价格”(作为“二重”价格),至少可以为计划者提供一个与其先前的选择相衔接的估价。不过,除了与运用投入/产出方法有类似的技术问题外,影子价格对决定有效率的实物结构本身也没有多大帮

助。这样,计划者在对替代方案进行比较时,唯一可靠的参照点就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上的价格了。但在国内的定价实践中,却并没有充分利用这些参照点。考虑到经互会内部贸易中利用了(至少是原则上利用了)世界市场价格这一事实,可以说,国内定价实践中没有利用世界市场价格的原因大概不是意识形态方面的,也许是因为计划人员要不断地费尽力气解决难以把握的各种指标的相互衔接问题,所以他们对计划的效率问题完全不敏感了。政治体制的影响也增大了与价格扭曲有关的信息缺陷问题:当不得不做出超市场能力的、极其复杂并且带有大量外部效应的宏观决策时,一元统治造成了另一种阻止在可得到的选择方案之间进行真正选择的信息障碍。

命令体制的信息缺陷与刺激缺陷相互影响。我们已经提到了竞争刺激的缺乏和与消费者选择相联系的竞争刺激的薄弱。为了弥补这一点,人们在命令体制运行的整个时期尝试过种种特别设计的激励方案,它们既有针对工人的(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计件工资方案曾经扩展到别的国家闻所未闻的程度),也有针对经理人员的。不过,命令体制的自身逻辑要求激励应当与计划的完成情况挂钩;这和信息障碍纠缠在一起,成为体制畸型的主要根源。完成计划指标给经理带来两方面的利益增进,即当前的财务报酬和职业生涯的远大前程。一般雇员的利益与计划完成之间的联系虽然不太直接(基本工资和薪金结构独立于计划完成情况),但还是有一定联系的,因为工资总额以某种方式与计划的完成情况联系在一起,用现金或实物支付的各种单项奖金及集体福利,也都视计划的完成情况而定。只要把计划目标的多样性(数量、质量、产品结

构和成本等等)和在这些目标之间明显存在的相互冲突的可能性考虑在内,这种激励办法表面上的简单性质就不复存在了。在命令体制的长期历史中,还未曾有过通过事先规定各个特定目标的权重来形成某种综合指标的实际可行的方法(尽管有若干流产了的尝试),这种综合指标是与反映企业经理人员预先知道的宏观评价的权衡同时存在的。这些困难由于通常所说的计划压力而倍增。据认为,为了充分动员现有潜力,资源利用的指标和定额应当绷紧。于是,计划压力就成为竞争压力缺乏的替代品。“水平法”这种声名狼藉的计划方法即所谓“棘轮原理”(ratchet principle),意味着指标的完成几乎自动地导致下一个计划期指标的提高。

在这种情况下,形成了一个远离人们在马克思社会主义理想境界中预期的日常管理行为模式。这一模式的主要特征可以简便地归为三类:优先调整、独特的“最小最大”战略、厌恶变化。<sup>14</sup>所谓优先调整,就是在相互冲突的计划指标中,选择那些为企业带来最高绩效的指标,而不管对整个社会带来的后果如何。通常说来,产出指标是压倒一切的考虑,这再次反映了命令体制的逻辑。由于产出总量很少能从实物方面加以计量,所以,计划指标通常用产品价值来表示,如总值、净值和销售额;这就使操纵产品结构、通过少生产“困难”品种和多生产“容易”品种来完成总体目标成为可能。“容易”品种是指那些与要求付出的努力相比定价有利的产品,而不一定是需求量最大的产品。出于同样的考虑,难以准确把握的质量问题放到可接受程度的最低一档。某些优先顺序项目是明确地从上面强加给生产者的,其中除其他方面的优先顺序外,还包括向各类产品接受者(企业、产业和地区)供货的顺序。这种优先

顺序的存在本身,就证明了各种计划之间相互不衔接,也就等于承认部分计划是不可能完成的。计划人员自己的这种对特定指标重要性区别对待的态度,不能不鼓励下级管理人员按照他们自己的标准调整优先项目。

命令体制特有的“最小最大”战略的实质在于找到使计划指标最小化,同时使资源的计划分配最大化的方法。每一级经济管理机关(从工厂经理到产业部的部长)都利用中央计划者所得信息的不完全性,努力隐瞒生产能力,夸大投入品的需要量以及减轻计划压力。这种做法也以一定的形式存在于工资计划的制定过程中:企业和行业并不关心绝对意义上的财务结果,它们至多关心计划规定的限额(“软预算约束”),在计划制定过程中,它们都力求对照生产指标,定出尽可能高的工资总额和尽可能有利的工资率。作为对投入品不按时交货和交货不齐造成的后果的保险措施,广泛存在的囤积原材料,囤积中间产品和零部件的行为就成为通例,而一处库存的增加是以别处短缺的增加为代价的。因此,这就破坏了计划、协调在宏观层次上的成本效益观念。囤积也适用于劳动力(由于种种原因),这实质上导致人员配备过多,于是,这也成为就业状况的一个日益重要的因素;甚至在紧缩投资和公开宣布要努力减少就业人员的时候,计划当局也面临对劳动力的稳定的或不断增加的需求。

厌恶变化,如厌恶生产方法与产品本身两方面的创新,也源于同样的动机。准备和采用一项创新的过程往往需要大量的努力,而这种努力可能不会在直接给有关单位带来利益的评价标准中充分反映出来。计划中的创新的彻底失败和它对现期产出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等风险,是创新单位最主要的

顾虑。由于棘轮原理的存在,新工艺或新产品通常包括在下一个计划中,使得由以计算和奖赏进一步改进的基点提高,所以,创新即使成功,也可能不会给他们带来报偿。在这种特定条件下,“求量不求质”(more of the same)就成为合理的行为准则。此外,名副其实的 innovation 反而往往会损害一个企业的直接利益,来自上级的针对厌恶变化的激励实际上鼓励了欺骗性创新倾向。对于有权卖得较高的官定价格的新产品来说,这尤其如此;那种把略有变化的商品说成是新商品的做法,被广泛地用作夸大计划的数量指标完成情况的手段。生产虚假的新产品的现象(除消费品外,大部分可能发生在机械工业),显然是“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中过高估计国民收入增长率和工业生产增长率的一个主要因素。我们认为“现实的社会主义”之所以未能实现环境方面的外部性内化预期(见第3章),命令体制的所有这些特征显然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我们想避免产生这样一种印象,即以上描述的刺激和行为都是无所不在的;确有一些人是受意识形态激励的,也有更多的人只是渴望把他们的工作做好。可是,他们的行动不是根据真正由命令体制产生的激励方式进行的,而是与之相冲突。从长远看,因为这些人的数量日益减少和他们遭到的无情挫折不断增加,所以,他们是注定要失败的。值得记住的还有,迄今为止,我们一直讨论的几乎仅限于狭义经济体制的含义,只是偶尔提及政治因素和政策因素的经济后果。不用说,后者不仅将群众参与或影响决策的任何起码的希望都扼杀在萌芽之中,从而使消除异化的诺言落空,而且由于人们害怕被宣布为破坏者、怠工者和人民公敌并受到处罚,因而人们的积极性、大胆和创新精神变得麻木不仁。强化这些态度的一个重要因

素是挑选责任岗位的任命(nomenklatura)制度,它使党的路线的恭顺的追随者比独立、大胆和富有想象力的人优先得到提拔。

总而言之,认为命令体制具有两个共生的作用(既是苏联式现代化战略的工具,又是这种现代化战略的天生的保守主义的工具)的论点是可以成立的。从我们的讨论看,同样明显的是,我们不同意那种对命令体制按时期不同作出对比评价的观点,即认为命令体制在“粗放增长”时期完全适宜,只是在后来缺点才暴露出来。在我们看来,无论是从逻辑上看(为什么这种浪费资本的体制在资本最短缺时期是恰当的?),还是从抛弃命令体制的早期尝试、处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说来非常低的国家由于旧经济机制的灾难性后果而实际上被迫改变体制(中国,后来更明显的是越南)的历史事实看,这种观点都是不能得到证实的。对“当时一切都正确”的观点(共产党永远正确的政治症候群的近亲)的反驳,不等于否认命令体制随着经济的日益复杂化也日益变得不适合需要了,这种不适宜性一直是导致“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统治集团认识到改革紧迫性的学习过程的一个因素。

因此,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经验给出的教训(体制需要改革)并不令人奇怪。改革的方向也并不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用最概括的语言说,试图进行的变革的核心问题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利用市场机制。因此,本书下一步要做的是,考察“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市场取向改革的过程。不过,在进行这种考察以前,对“市场社会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进行一番讨论看来是可取的。

## 注 释

- ① Vladimir I. Lenin, 'K Getiryohletney godovschchine Oktyabrskoy Revolutsii' ('On the Fourth Anniversary of the October Revolution'), *Works*, vol. 41, 151. 参见弗拉基米尔·伊·列宁:《十月革命四周年》,《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9-177页。
- ② “集权”一词原打算强调两种体制之间的区别:一方面是官僚式的过度集中的命令经济,另一方面是那种作者当时认为可与受管制的市场机制相容的集中计划体制。不幸的是,在著作的英文版本中,丢弃了“集权”,代之以“集中”一词,这就模糊了原来设想的差别。英文版见 *The Market in a Socialist Economy* (London, Boston, 1972)。
- ③ Richard Löwenthal 在其著名论文 'Development versus Utopia in Communist Policy' (载 *Change in Communist Systems*, Chalmers Johnson 编, Stanford, 1970) 中,论述了意识形态因素的作用,文章很有说服力。
- ④ “强制模式”这一称谓是由 Michael Ellman 采用的(见 *Socialist Planning*, Cambridge, 1979),用以描述苏联为迅速实现工业化而从农业中获取资源的办法。在这里,我们则从更广的意义上使用这一名称。
- ⑤ 这一术语来自科尔内的《短缺经济学》。
- ⑥ 拉斯基在若干文章中讨论了命令体制的这些含义,特别见 'Wirtschaftsreformen in Osteuropa als Gegenstand der Wirtschaftstheorie' ('Economic Reforms in Eastern Europe as a Subject of Economic Theory'), in *Vierteljahrshefte zur Wirtschaftsforschung*, Heft 2 (Deutsches Institut für Wirtschaftsforschung, Berlin, 1985); and 'Marx-Sozialismus, Markt Sozialis-



muns und Wirtschaftsreformen des "real existierenden Sozialismus" ("Marxist Socialism, Market Socialism, and Economic Reforms in "Really Existing Socialism"), in *Forschungsberichte*, Vienna Institute for Comparative Economic Studies, no. 129, June 1987.

- ⑦ “计划的自相矛盾”这一术语是由 Rüdiger Knaack 在 ‘Comparative Economics: Lessons from Socialist Planning’ 一文中使用的，文载 *Comparative Economic Systems Present Views*, ed. A. Zimbalist (Kluwer · Nijhoff, Boston, 1984)。
- ⑧ 这一观点是由 David Granick 提出的，见 David Granick, ‘Central Physical Planning, Incentives and Job Rights’, in *Comparative Economic Systems—Present Views*。
- ⑨ Geza József, ‘Traditional Central Planning and Evolutionary Trends’, in *Contributions to East-European Economic Research*, Netherlands Economic Institute, no. 3, 1983.
- ⑩ 我们在这里遵循的是 Gregory 和 Stuart 所做的划分。见 Gregory and Stuart, *Soviet Economic structure and Performance*, 219—21。

# 第 三 篇

---

市场社会主义——迄今为止的问题



# 5

## 对挑战的理论反应

到 19 世纪的末期,特别是随着与爱德华·伯恩施坦的名字相联系的马克思主义中修正主义派别的出现,未来社会主义经济将消除市场弊端的梦想已经失去了光彩。第一次世界大战和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以社会主义的一翼(与共产党一翼相对立)而闻名于世的社会民主党人,如卡尔·考茨基和奥托·鲍威尔,也开始认识到市场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意义。对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来说,社会主义无市场这一概念的基本原理仍然体现在纲领性文件中;这些纲领性文件把对市场机制的任何利用都看成只是暂时的让步,证明这种让步的正当性的主要理由是,社会经济条件的不成熟要求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有更长的过渡时期,在个体农民的农业和其他类型的“小商品生产”占绝对优势的不发达国家尤其如此。<sup>②</sup>

苏联本世纪 20 年代关于社会主义和市场(或计划与市场)关系的学术争论,就是在这种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限制范围内进行的,尽管一些间接的证据表明,一些死后在 1987 年得到平反昭雪的经济学家(巴扎罗

夫、格罗曼、康德拉季耶夫)试图跨越这个强加的界线。<sup>②</sup>20年代末,所有争论都停止了,只是在斯大林逝世以后在共产主义世界才以不同的公开程度和连续程度再次出现。相反在西方这种争论却发展成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政治上都产生了广泛影响的社会主义经济计算问题。争论是由路德维希·冯·米塞斯20年代的一篇文章推动的。由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消除和因此而来的真正的生产资料市场的缺乏,米塞斯否认社会主义有进行任何形式的合理经济计算的可能性。对这一观点的反驳主要是(但不完全是)由一些执著于社会主义思想的经济学家进行的,其中最著名的可能是奥斯卡·兰格。在重新挑起争论的弗里德里希·奥·冯·哈耶克1935年重新出版米塞斯的原文后不久,兰格写下了著名论文“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同一时期,阿巴·勒纳在一系列文章中也提出了与兰格类似的思想,于是就有了“兰格—勒纳解决法”这一说法;不过,在一部几年后出版的重要著作《统制经济学》(*Economics of Control*)中,勒纳实际上离开了“市场社会主义”阵营,因为他不再把自己的“规则”的应用同生产资料公有制占统治地位联系在一起了。<sup>③</sup>一般来说,我们将大体上在兰格与米塞斯或哈耶克争论的范围内讨论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问题。他们的争论在经济思想史上取得了持久的地位,并为“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理论提供了有用的向导。

奥斯卡·兰格是一个激进的社会主义者和信心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把马克思的经济学领会成一个关于经济生活的广义的历史进化理论,而几乎不是配置资源的向导。刚一加入与米塞斯和哈耶克的争论,他就特别强调地明确了这一

点。在193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马克思经济学和现代经济理论”中，他详细阐述了这样的观点：“很清楚，马克思经济学和现代‘资产阶级’[他自己的引号，这本身就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符号]经济理论各自的相对优点属于不同的‘范围’”。然后他在脚注中直接提到了我们现在所说的“现实的社会主义”的问题：“就苏维埃俄国经济制度的目前管理而言，马歇尔的经济学说显然比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能提供更多的东西，但是，对预测资本主义未来而言，后者肯定是一个更有效的基础。”<sup>①</sup>认识兰格的这一立场对我们的讨论很重要，因为这有助于理解在经济计算论战中反对“奥地利学派”的时候，他代表的与其说是马克思主义(如果有一点的话)，还不如说是新古典经济学。

对论战的大部分估价，包括艾布拉姆·伯格森的杰出论文<sup>②</sup>在内，都认为米塞斯的理论主张甚至在论战开始以前就已经实际上被证明是错误的了。早在1908年，意大利经济学家恩里科·巴罗尼就已证明，在其他条件不变时，资源有效配置问题的理论解决并不依赖于生产要素的所有制，需要的是找出一组恰当的价格。但是，虽然在理论上可以这样设想，但在实践上这种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因为不可能从千百万齐次方程中解出不可或缺的价格来。普遍认为，哈耶克认识到了这一点，他把米塞斯的主张归结为社会主义不是在理论上而是在实践上不能进行合理的经济计算。于是，哈耶克(和林纳尔·罗宾斯)的观点就被称为是从米塞斯更极端的态度的退却。对于这种说法的正确性问题，我们将不进行详细研究。把握兰格模式的核心思想的恰当方法，是像哈耶克那样直截了当地提问：社会主义能够有效地提高或至少不恶化资本主义

的生产效率吗？兰格用坚定的“能”回答了这个问题，提出了他认为能够解决寻找合适价格问题的实际办法：由中央计划当局进行试错实验过程。这就是实际上从以“市场社会主义”（兰格自己极少用这个词）或“竞争解决法”著称的思想中归纳出来的结论。对这一回答的认可构成了论战中这样一种广泛存在的看法的基础，这种看法表明，市场社会主义能够具有和资本主义一样的配置效率，因而单靠经济理论很难解决关于两种社会经济制度相对优点的大争论。

让我们更详细地考察一下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我们将不仅检验这样一种观点的有效性，即兰格模式成功地驳斥了奥地利学派对社会主义的挑战，而且要确定兰格模式是否能够或在何种程度上能够被看作是“现实的社会主义”改革的指南，至少是启示。

标准的西方经济理论中的配置效率通常被理解为同时满足以下条件：最优的分配，最大的产出，最优的产出构成（组合）。最优分配要求对所有消费者而言任何两种消费品的边际替代率都相等。生产的最大化等于说对所有生产者而言任何两种生产要素的边际技术替代率都相等。对于最优产出构成而言，任何两种消费品的边际替代率都必须等于这两种货物的边际转换率。在达到资源有效配置的条件下，任何一个人的福利状态都不可能在不损害另一个人的福利状态时得到改善（所谓“帕累托最优”）。

有效配置问题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主要焦点。根据这个学派的观点，在完全竞争（和不存在规模收益递增）的条件下，资本主义经济可以保证达到这种最优状态。在完全竞争中，所有消费品的价格对所有消费者都是相同的，消费者将通过调整

每两种商品和劳务的边际替代率,使之等于给定的价格的比率(倒数),而使效用最大化。与此相类似,在完全竞争中,所有生产要素的价格对所有生产者都是相同的,生产者将通过调整边际技术替代率,使之等于给定的生产要素价格的比率(倒数),而使每一既定产出量的费用最小;结果就是产出的最大化。最后,在完全竞争中,生产者作为数量调节者做出反应:为了使利润最大化,他们把产量扩大到(递增的)边际成本等于单位产出品价格这一点上;结果就是产出构成最优。这样,就可以设想完全竞争能够导致经济的一般均衡状态产生。

声称可以导致这种状态产生的道路之一是由瓦尔拉描述的。“一个拍卖行的喊价人在试错或 *tâtonnement* 过程中找出所有商品和生产要素的均衡价格;他报出价格,经济活动的当事人被动地接受之并据此形成自己的供给和需求的额度。这些预期的供给和需求数量随后传递给拍卖喊价人,由喊价人加以加总,并对供求一致性加以检验。在供求不衔接的情况下,就报出新价格。重复这个过程,直到达到一般均衡。随后(只能是随后),实际的交易才得以做成。

兰格的解决办法实质上遵循了瓦尔拉模型。这种解决法的核心是在生产领域内有效配置货物。在生产领域,存在两类经济当事人:企业(厂商)经理人员和行业经理人员(“行业领导人”)。企业经理人员必须遵循以下三条规则:(1)承认价格的参数性质,也就是他们只作为价格的接受者(*price takers*)和数量的调整者做出反应;(2)计算企业产出的短期边际成本,同时找出每一可选择的产出水平上的最小成本组合;(3)在边际成本等于价格时确定产出量。“行业领导人”服从于同一套规则,不同的是与他们相关的成本曲线是整个行业(部



门)的长期边际成本曲线,他们的决策涉及的是该部门生产能力的扩张或缩减(包括企业的创立和关闭)。中央计划机关(兰格论文中是中央计划委员会 CPB)像瓦尔拉的拍卖喊价人一样发挥作用;通过试错过程检验价格,直到所有市场上生产资料供给和需求相等为止。另外,中央计划委员会还具有除拍卖喊价人作用以外的两种功能:(1)决定经济中的投资额,也就是决定投资物品的供给,决定在各特定部门中使需求适应于这一供给的利息率;(2)分配社会红利,也就是根据与工作报酬无关的标准,分配国有化企业扣除投资费用(可能还有集体消费)后的纯收益的剩余。

以上这些都是兰格的解决办法中的不变因素。兰格解决办法也包括一些辅助性因素,使得有可能把以下三种模式——一种主要模式和两种次要模式——区分开来;主模式包含两个真正的市场,即消费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其中的价格和工资率具有市场出清性质,可被生产者用来作为相对稀缺的信号。第一个次要模式保留了消费品自由选择原则,但把消费品的市场价格和被生产者用来作为参数的会计价格区别开来,因而不存在消费者主权原则;在这种条件下,会计价格和因而而来的消费品产出构成反映的是中央计划者的偏好,而不是消费者的偏好。另一个次要模式则把消费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都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向作为消费单位和劳动供给者起作用的家庭直接下达指令(配给);但是,这仍然需要消费品和劳务的会计价格,因为它们反映了中央计划当局的偏好。在这些会计价格存在的条件下,如果生产领域遵守游戏规则,那么,该体制仍然有效率。

在兰格看来,他的体制不仅能满足标准的效率标准,而且

可望比资本主义优越,这除了其他的原因外,还由于采取了创造更多福利的分配原则,同时,它具有把外部性纳入考虑和加速技术进步的能力。从他的论文中可见,后两个判断的论据可能是很不充分的。

我们将从两个主要方面讨论兰格模式。一是模式的逻辑一贯性;另一个是兰格仿效的瓦尔拉方法是否能有效地应付米塞斯或哈耶克的挑战。就模式的内在逻辑一贯性而言,我们认为兰格成功地说明了中央计划当局能够具备拍卖喊价人的职能,能够和喊价人一样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在市场社会主义可以提供完全竞争的替代物的意义上,这可以看成是对一般均衡理论的重要贡献。<sup>②</sup>上述两种情况下的问题实际上是一样的:找到能保证所有市场都达到均衡的所有商品和生产要素的价格。但是,必须记住瓦尔拉的拍卖喊价人的概念和兰格的中央计划者的功能的概念之间的重要区别。瓦尔拉理论是实证经济学的一部分,它试图描述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方式;相反,兰格模式是有意识地成为规范性的,它试图规定出应该支配市场社会主义运行的规则来。错误的规范理论的危险性显然远远大于错误的实证理论的危险性。以一般均衡的存在或稳定问题为例。假如一般均衡状态由于生产的规模收益递增而不存在,那么,中央计划人员的活动就将不会发生作用,因为一个人不可能找到某种不存在的东西。<sup>③</sup>在一般均衡存在却具有不稳定性的情况下,中央计划委员会将陷入另一种困境。与瓦尔拉的拍卖喊价人制度下的情况不同,在市场社会主义中,交易也是在不正确的(“虚假”的)价格下进行的,这种不正确的价格本身会损害均衡的稳定性或使均衡难以达到。对于“新资本理论”学派(以斯拉法的著作为基础)<sup>④</sup>

来说,兰格模式的逻辑一贯性更是大可争辩的。“新资本理论”学派认为,除了极其有限的几种给定的资源外,新古典思想完全无效。不过,如果不管逻辑一贯性这一纯理论问题,那么在我们看来,兰格模式最重要的缺陷在于,它忽略了中央计划人员和经理人员这两种经济当事人的动力问题。中央计划委员会被看成是整体、公共利益和纯粹理性的化身;它的唯一考虑就是执行市场社会主义规则(调整价格以避免短缺或过剩),不会为其他任何目的而利用自己的巨大权力。经理人员同样如此,他们被认为毫无偏差地和准确地遵循规则,连最轻微的自利迹象都不会出现。兰格模式的逻辑一贯性,如有关论文所述,看来只有归结于这样一个暗含的假设才能解脱困境,即像在第1章讨论的正统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假设的那样,社会主义消除了利益冲突,也消除了阻碍完全而严格地执行任何颁布规则的障碍。<sup>30</sup>

讨论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第二个方面(它是否有效地对付了米塞斯或哈耶克的挑战),必须从考察瓦尔拉和奥地利学派之间关于市场经济运行方式的理论认识的差异开始。兰格实质上是运用没有资本家的瓦尔拉体系来回答挑战的。但是,如果挑战实际上完全不是瓦尔拉式的,新古典的观念对任何类型的市场经济都是不正确的,情况又会怎样呢?这是老的经济计算论战的新研究者最近提出的问题;他们的答案常常完全修改了对论战结果的标准描述。<sup>31</sup>

新古典理论及因此而来的这里所讨论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都把拍卖喊价人的试错机制看作是市场经济实际过程的一个合理的抽象概括。不过,鉴于瓦尔拉模型把重点放到在现实世界中几乎找不出具体原形的拍卖喊价人身上,所以,它就

忽视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真正核心人物,即狭义的企业家。瓦尔拉模型形式上有企业家,但其行为像机器人一样,根据给定数据使成本最小化或使利润最大化。他们的行为是那些在只有被动竞争的框架内运作的单纯最优化者的行为,这种行为被归结为对外生变化的反应性的状态调整。这很难说是对竞争的合理概括,在现实社会中,竞争是一个影响数据本身的无休止的斗争。在这里,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实际动态过程相反,一般均衡理论的静态分析方法表现得特别明显。

的确,熊彼特(他把企业家的地位提高到经济发展主要推进器的高度)曾经得出结论说(见第1章),成熟的资本主义使企业家功能变得过时了。但是,首先这种结论已被证明是错误的。其次,瓦尔拉经济学对企业家功能的低估,不是由于错误的历史判断,而是由于这种理论在上面论述过的意义上的静态性质。兰格模式是这一点的很好例证。兰格考虑的是一般均衡方程组的求解问题,并意识到中央计划委员会不可能知道要代入方程的系数,但它却(根据新古典传统)假定,如果向企业和行业的经理人员提供投入品和产出品价格,他们就可以获得这些技术系数知识。中央计划委员会一向他们提供价格,他们就开始最优化过程。然而,最优化行为只是企业家活动的许多方面之一,如果只把注意力集中于这个方面,那么,在现有的多种替代方案中进行选择的意义就被显著地夸大了,就像每一个企业家都知道全部有效选择似的。现实中的企业家必须是新替代物出现的敏锐观察者和新替代物的创造者。企业家的计划是以对未来发展的预期为基础的,由于发展是在一个有关数据不断变化的世界里进行的,所以,不确定性是一种必然状态,风险是决策的不可避免的重要组成部分。向瓦尔

拉方程代入元素所需要的知识不是一项数据,而是一种只有通过竞争性努力过程才能发现的信息。因此,问题在于企业家的特殊的“思维技术”,一种靠在竞争条件下真正发现自己而产生的直觉。这种情况在资本主义下一般是存在的,在那里,企业家追逐利润,这就为虽有巨大缺陷但却仍然运转的市场协调机制提供了基础。<sup>⑩</sup>就像科尔内观察到的那样,“在真正的市场过程中,参与者是那些想到用并且能够利用自己的特殊知识和机会的人。他们是对手……一些人胜利了,一些人失败了。胜利带来了奖赏:生存、成长、更多的利润和更多的收入。失败者带来了惩罚:损失、较少的收入以及极端的情形——被淘汰!”<sup>⑪</sup>

在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中,所有这些方面都是不存在的。这看来进一步证实了这样一种主张,即那种认为兰格已经令人信服地反驳了米塞斯或哈耶克挑战的断言是没有根据的,至少是言过其实了。无论是上面讨论的动力问题,还是兰格模式明显打算要解决的信息问题,都远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答案,尽管兰格模式也说明了同样有可能产生瓦尔拉模型具有的适合于有效配置既定资源的价格。另外,把企业家和竞争的恰当作用纳入分析也表明,通常认为动力和信息这两个虽有相互联系但却截然不同的因素更可能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经济活动的当事人必须具有恰当的动力,以从事于产生信息的活动,而这种信息则是广义上包括动态范围在内的资源有效配置所需要的。当然,这反过来提出一个重要的社会经济条件问题:如果经济活动当事人不是那种根据自己的风险和责任采取行动的人,而仅仅是其本身行为颇不适宜于充当企业家的公共机构雇用的代理人,那么,还能够设想有这种行为

吗?换句话说,这就重新提到了市场与社会主义的兼容性这个米塞斯、哈耶克挑战的核心问题。

把中央直接计划作为社会主义资源配置主要方式的支持者从相反的角度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兰格模式设计的生产领域内的模拟市场遭到了来自这方面的严厉批评,被认为与社会主义公开宣布的持续充分就业、消除波动、收入分配平等目标不相一致。考虑到现期的均衡条件和实现生产力的快速结构变化的需要之间可能有矛盾,模式的静态特征就成了批评的靶子。在更基本的层次上,市场社会主义思想受到了“来自‘左’派”的批评,它或者被认为是没有生气的资本主义,只是没有资本家而已,其效率是大有疑问的,其满足社会主义迫切需要的能力更是大有疑问,或者被认为是真正的资本主义借以卷土重来的入口。<sup>④</sup>

我们可以看到,对兰格模式的诘难数量众多,也很严厉。但我们认为这些诘难都没有使沿着兰格模式的道路发展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努力丧失它们在经济思想史中的地位和推动“现实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变化上的极端重要性。两次大战之间的辩论肯定对推动“现实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变化有好处,因为它提出了命令体制存在替代物这一思想,同时说明那种认为没有反映稀缺程度的价格也能合理配置资源的传统马克思主义信念是没有根据的。但是与此同时,也应该明白,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市场取向的改革列入实践的日程时,它们在批判性分析旧体制的缺陷方面有很雄厚的根基,但缺乏正面解决办法的适当的理论基础。在1947年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波兰版(原拟出版,但因意识形态原因而放弃)所写的序言中,兰格自己同样承认了这一点。在那里,兰格重

复了早些时候写给哈耶克的一封私信中的话,强调了在“我提出的纯粹静态的解决办法”中忽略了动态方面的重要意义。不过,他逝世前不久所著《计算机和市场》一文似乎说明,他从没有能够成功地对付如上所述的奥地利人的挑战。<sup>45</sup>对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作出贡献的其他波兰经济学家(以及我们所了解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也没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些其渊源属于非马克思主义的人们主要遵循瓦尔拉的方法,而赞成市场的马克思主义者(包括本书作者在内)则形成了科尔内所说的“天真的改革家”队伍,他们过于乐观地看待市场与计划相结合的前景。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理论的失败可能是政治及意识形态的限制引起的,但甚至在这类限制最少的国家和时期(如1956—1957年的波兰,1968年苏联入侵前的捷克斯洛伐克),也没有把米塞斯或哈耶克挑战的问题的全部内容都公诸于世。只是(谨慎些说主要是)在绝大部分市场取向改革经历都使人失望的影响下,有关问题才成为注意的中心。

## 注 释

- ① 说明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和市场关系立场的最清楚的总的声明,可能在《共产国际纲领》中就可以找到,《纲领》是在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上通过的。ch. 4, English edn (London, 1929), 31—3。关于马列主义的这一立场,见弗·布鲁斯:‘Utopianism and Realism in the Evolution of the Soviet Economic System’,载 *Soviet Studies*, XI. (3) (July 1988)。
- ② 布鲁斯在一篇历史概览中简短讨论了这些人的观点。见 Brus, *The Market in a Socialist Economy*, ch. 2。
- ③ 与关于市场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的经济计算直接或间接有关的文

献极为丰富,而且日渐增多。因此,在这里较恰当地看来不是努力编出一个颇有代表性的总清单,而是把有兴趣的读者引向那些本书作者认为是关于这个问题的最完备的著作和文章索引,这在·一部重要著作中就能得到,见 Don Lavoie, *Rivalry and Central planning: The Socialist Calculation Debate Reconsider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85)。不用说,在讨论具体问题时,我们将引证具体著作。勒纳定律是指:如果任一要素的边际(物质)产品价值高于这一要素的价格,就提高产量;如果低于,就降低产量;如果相等,就保持产量不变。见 A. Lerner, *The Economics of control* (Macmillan, New York, 1944), 64。

- ④ Oskar Lange, 'Marxian Economics and Modern Economic Theory'.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June 1935), reprinted in *Essential Works of Socialism*, ed. Irving Howe (Holt, Rinehart, & Winston, New York, Chicago, San Francisco, 1970), 343—56.
- ⑤ Abram Bergson, 'Socialist Economics', in *A Survey of Contemporary Economics*, ed. Howard S. Ellis, vol. 1 (Irwin, Homewood, Ill. 1949).
- ⑥ Leon Walras, *Elements of Pure Economics* (Irwin, Homewood, Ill., 1954).
- ⑦ 这一点是由 James E. Meade 提出的,见 James E. Meade, *The Stationary Economy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Unwin, London, 1966), chs. XIII—XV.
- ⑧ Benjamin N. Ward, *The Socialist Economy: A Study of Organizational Alternatives* (Random House, New York, 1967), 30—40.
- ⑨ Luigi L. Pasinetti, *Lectures on the Theory of Produc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77), 24—32 and 183—4.



- ⑩ 那些从不同意这种乐观假设的人激烈地抨击了那种对兰格—勒纳模式的动力方面进行检验的轻视,例如,像詹姆士·M·布坎南所说:“我们很可以问,为什么经济学家们过去没有停下来提出这样的问题,即社会主义经理为什么将根据理想化的规则行事。何处寻觅这些使这种体制得以运转的经济宦官呢?”见 James M. Buchanan, *Liberty, Market and the State: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1980s* (Wheatsheaf, Brighton, 1986), 25.
- ⑪ Lavoie 的著作 *Rivalry and Central planning* 就特别是这样。不过,从本书的主题这一角度看,有意义的倒是那些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意义上回到经济计算争论的著作家们也得出类似的结论。亚诺什·科尔内就提供了一个恰当的好例子,他在“*The Hungarian Reform Process: Visions, Hopes and Reality*”(in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December 1986)这一令人赞赏的述评中,设计了关于改革的理论方面的章节。Gabriel Temkin 所做的是这一方面的另一个尝试,这一尝试实际上等于全面地证明了米塞斯或哈耶克的论点。见 Gabriel Temkin, ‘On Economic Reforms in Socialist Countries: The Debate on Economic Calculation Under Socialism Revisited’ (*Communist Economics*, vol. 1, no. 1, 1989)。
- ⑫ Lavoie, *Rivalry and Central Planning*, 104—11.
- ⑬ Kornai, ‘The Hungarian Reform Process’, 1727.
- ⑭ 莫里斯·多布断言,在现期均衡条件和结构迅速变化的迫切需要这两者之间存在冲突的情况下,兰格模式有缺陷。见 Maurice Dobb, ‘A Note on Saving and Investment in a Socialist Economy’, *Economic Journal* (December 1939). 保尔·A·巴兰在他的短论中提出了类似的论点。见 Paul A. Baran, ‘National Economic Planning. Part 3: Planning under Socialism’ in *A Survey of Contemporary Economics*, ed. B. Haley, vol. 2 (Irwin, Homewood, Ill.,

1952)。保尔·M·斯威齐则运用南斯拉夫这一案例,试图说明市场与社会主义经济的不可兼容性。见 Paul M. Sweezy ‘The Transition from Socialism to Capitalism?’, *Monthly Review* 16 (1964)。

- ⑮ 前言的内容发表在 vol. 2 of the *Collected Works of Oskar Lange*, in Polish; Oskar Lange, *Dziela*, tom 2 (Warszawa, 1973)。在同一卷中,也刊登了给 F. A. 哈耶克的信(1940年8月31日,收到哈耶克的论文《社会主义经济计算:竞争解决法》后的答复);信中包括这样一段话:“如果我冒昧把你的文章中的观点看成是你的第三条防线的話,还望不要介意;这一次,你把争论的重心从纯粹的静态方面转移到动态方面。不过,老实说,你为此而将整个问题移向另一个层次,这一个层次也的确重要,但是却要求(在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以前)做出新的研究和新的解释;毫无疑问,你已经成功地提出了基本的问题,显示出了我给的纯粹静态解决法的缺陷。我打算在今年秋季的某个时候研究这一问题,对你的论文给出答复”(Dziela, 567)。不管兰格从未实践这一诺言这样一个事实,兰格在1965年逝世前几个月所著的《计算机和市场》一文中,仍然坚持认为:“在我的短论(1936--1937年的那一篇)中借助于试错的经验过程,使齐次方程组得以求解,从而表明市场机制怎样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建立起来,藉此,我反驳了哈耶克—罗宾斯的论点”。因为没提到哈耶克的争论,所以很明显,兰格把有关市场的问题看作本质上只是静态的问题,而动态问题则将在社会主义下通过另一机制来解决:“对计划经济发展而言,必须把长期投资从市场机制中拿出来,建立在经济发展政策的判断基础上”。这就要借助于“电子计算机。(在这里)电子计算机并没有取代市场。它完成了一种市场从没有能力履行的职能”。Oskar Lange, ‘The Computer and the Market’, in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Economic Growth; Essays in Honour of Maurice H. Dobb* ed. C. Feinstein, (Cambridge 1967) 158—61.



## 匈牙利的实践

把市场社会主义思想应用到经济组织实践中来的第一次尝试出现在 50 年代初期斯大林和铁托决裂后的南斯拉夫。变化的初始动因可能主要不是经济的，尽管命令体制移植（最初在东欧各国中是最彻底的，自相矛盾的是这竟是自愿进行的）产生的经济困难起了重要作用。南斯拉夫共产党针对斯大林在共产主义世界一直无可置疑的权威首先寻求的是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自决。南共找到了自治这个体现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概念：这里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强调社会主义是一种把生产资料置于“联合的直接生产者”控制之下，从而克服了劳动异化的社会制度。根据定义，自治经济单位必须是自主的，因此，命令体制必须被依靠市场协调的体制所取代。这一变化被拟想为一个连续的过程，最终目的是达到完全的（full-fledged）市场社会主义。在这种经济中，注定要“消亡”的国家的干预将是有限的和不断弱化的。<sup>①</sup>

至于苏联集团国家，对命令体制下经济绩效的不满构成了改革浪潮的主动因。这种不满在 50 年代中期开始公开化，并很快在波

兰(1956—1957)的旨在大大增加市场作用的比较全面的体制变化蓝图中表现出来。类似的想法在匈牙利也得到了广泛的讨论,但1956年11月对起义的镇压抑制了经济改革的尝试。其他国家,包括当时的中国,对集中计划与市场机制进行一定的结合的想法也感兴趣。

从那以后,东欧出现了一连串的经济改革的尝试(尽管改革一贯性的程度各有不同,但其方向都是增强市场的作用):1958年,捷克斯洛伐克;1963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实行新经济机制;1965年,苏联进行柯西金改革,保加利亚加以仿效;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经济方面的组成部分,苏联入侵后的压制只不过是使它的实施稍微推迟而已;1968年1月,匈牙利引入新经济机制;60年代,波兰进行了两次较小的试验(第二次以1970年12月在波罗的海海岸屠杀工人而告终),70年代中期又进行了一次改革(这次规模要大一些)。不过,直到80年代初期,所有这些尝试中只有匈牙利的新经济机制保存下来,其他尝试都只是在命令体制旧框架内所作的相当次要的修正。

人们对于大多数改革尝试的失败的解释是,统治集团的政治抵制;党政官员有既得利益,加上普通老百姓和经理不愿用安全性换取与效率相关的更大刺激;最后是设计与实施充分前后一贯的和可操作的改革方案存在实质性的困难。<sup>⑤</sup>在充分认识到头两个原因、尤其是政治原因所起的作用的同时,我们在这里就把注意力集中到最后一个方面,这方面的问题显然对本书的整个论题具有至高无上的重要性。这意味着我们必须考察改革了的体制实际上已经制度化了的两个案例:南斯拉夫,到80年代末,那里的改革已经有40年历史了;匈

牙利,1968年改革后称为新经济机制(NEM)的体制至今已跨过了20个年头。从其持续时间较长这一角度看,两个案例都能为作出某些结论提供丰富的资料。不过问题在于这些结论是否或在什么程度上允许由此概括出一般性的结论——这是我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从特殊案例作出一般结论存在明显的困难。与苏联或中国相比,南斯拉夫和匈牙利都是小国,单这一个因素就肯定会因为很多理由而减少其经验外推的价值,更不用说这几个国家具有非常不同的外贸依赖程度了。使每一种情况都成为特殊案例的因素可以列一个很长的清单,如深深植根于过去的文化因素,地理因素,种族差异或民族单一性,等等。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与过去的体制相比或与未改革的体制相比,评价改革了的经济体制成功或失败的标准是什么。总体绩效(如增长和福利效果)肯定要加以考虑,但这只有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才有充分的意义;不幸的是这种附加前提远离现实,现实充满了外来的冲击,充满了除体制因素以外的其他影响。就像格兰尼克(D. Granick)联系到自己对匈牙利新经济机制早期结果的分析所说的:“从理想上说,人们希望通过一个包括所有独立变量……并把改革看成是一个虚变量的回归模型,来评判改革的宏观经济效果。”<sup>③</sup>只要这一点不能做到,那么,在研究体制变化与宏观经济绩效之间的联系时,用不精确的数据来取代证据的做法就会占上风。从能够得到的研究结果看,比较方便易行的办法看来是确定经济改革是否在经济活动的环境和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方面带来了预期的结果。换言之,我们打算了解,与传统的命令体制相比,公开宣布的市场机制同社会主义经济的嫁接是否(如果是,又在

什么程度上)带来了经济运行方面的真正变化。实际上后者才是我们主要关心的问题,尽管参考宏观经济效果也是不可避免的。不过,应当记住,我们的目标并不是对匈牙利和南斯拉夫这两个国家的体制变化作出评价(这种评价需要多得多的细节分析),而是要考察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市场化这种一般主张所可能提供的教训。不管单个共产党国家之间,甚至一方是匈牙利另一方是南斯拉夫之间存在怎样的差别,他们毕竟具有共同因素:植根于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一党国家,生产资料公有制占据统治地位,经济长期在命令体制中运行(南斯拉夫除外)。虽然这不会使我们的作业更容易些,但至少提供了尝试的基础。

由于种种原因,匈牙利看来更便于作为分析的起点:这是一个更“自然的”经济体制演化,而不像1948年与苏联决裂时作为紧急措施采取的南斯拉夫改革;匈牙利经济学家们自己已经写出了大量评论文献,而且可以与在这之前南斯拉夫解决同样问题的尝试相对照。

几乎没有必要再对匈牙利1968年经济改革的细节进行研究了,因为人们对它们已经非常熟悉。<sup>④</sup>其主要特征可以描述如下:第一,新经济机制宣称的目标不是社会主义宏大的崭新设计中的目标(如南斯拉夫自治思想中那样),也不是社会政治制度的民主转变这一较为广泛的思想中的部分目标(就像在布拉格之春过程中可以观察到的那样);新经济机制集中于提高经济效率。第二,新经济机制所规定的更多的是实际政策的变化,它通过促进合作组织(真正的合作社,与苏联传统体制下国家社会主义化的合作社不同)和私人经济活动,而扩展到国有经济部门之外。第三,国有企业形式上不再按照计划

必须完成的原则(强制性指标被废除了)和产品与投入品实物分配的原则(这也被废除了)运转;它们在买者和卖者之间的自由合约关系下作为最大利润的追求者而行动,对价格和成本敏感,接受市场纪律的约束,在竞争力量的驱策下进行创新和调整。尽管存在这样一个事实,即改革的基本主张不是放弃中央计划,而是相反,想要通过消除“计划的自相矛盾”(见第4章)的根源,通过使中央机关不卷入到不必要的细节中去,通过运用经济手段而非行政手段协调国家与地方利益,来改善中央计划,使它变得更有效率,但是,人们还是认为,国有企业的上述行为变化能够实现。检验这种反映了计划与(行政规制下的)市场相结合的思想的主张的有效性,对于评价整个改革显然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我们将首先集中于国有经济,把非国有经济放到后面去讨论。

分析伊始,让我们在记住前面指出的所有保留的同时,从对改革绩效的原始资料的鸟瞰开始。国民收入(纯物质产品NMP)统计资料<sup>9</sup>表明,匈牙利引入新经济机制后增长加速了:实际的年平均增长率从1961—1965年这五年的4.1%上升到1966—1970年的6.8%和1971—1975年的6.3%,随后在1976—1980年下降到3.2%,1981—1985年下降到1.4%。科尔内把紧接着新经济体制引入的时期(1967—1973)单独列出来,这一时期的年平均增长率为6.1%,这一时期以前的十年为5.7%,随后的五年为5.2%,再以后就迅速下降;所以图像的基本轮廓是相似的。<sup>10</sup>不过,令人感兴趣的是,匈牙利增长的加速与下降时期和基本上没有改革的其他东欧国家(苏联和南斯拉夫外)非常接近;匈牙利的下降说起来更显著,1976—1980年匈牙利年增长3.2%,东欧平均是3.8%,1981—1985年匈牙利为

1.4%，东欧则为 2.4%。直到 80 年代初，只是在农业生产方面，改革后的匈牙利较之自己的过去，较之东欧其他国家，数据才确实更有利些。但在这里，我们发现自己很大程度上处在国有部门之外。至于所有其他的常规指标——工业生产、固定资产投资、人们的实际收入变动、对外贸易和负债，情况多少与国民收入统计数据告诉我们的情况相类似。应该指出，一个重要差别是在官方消费价格指数上，匈牙利远高于经互会其他东欧成员国（当然，80 年代的波兰除外）。但由于消费品和劳动力市场上价格作用和均衡程度的变化，所以这种差别不能从其表面意义上理解。匈牙利统计资料的质量也要考虑在内——一般认为大大高于东欧其他国家。

因此，如果不对经济体制运行以外的因素进行更详尽的分析（例如，人口的趋势使匈牙利劳动力增长不如几乎所有其他东欧国家，又如石油价格冲击给匈牙利的外贸造成了特别惨重的损失），人们可能会说，从总体绩效这一标准的衡量尺度看，新经济机制带来的经济机制变化无论是在长期内还是在在一个特定时期内都没有产生明确的效果。这种论断必须马上加以修正，否则就必须冒被每一个到过匈牙利的参观者、尤其是东欧其他国家人士所屏弃的危险，他们充分而公正地意识到，匈牙利和共产主义集团内的其他国家之间存在着广泛的有利于匈牙利的差别。宏观经济总体绩效的标准衡量尺度并没有说明全部情节：1968 年后匈牙利经济的特征，是具有比东欧其他国家好得多的均衡的市场，这就使货币指标更有意义，因为工资和价格的变化更准确地反映了实际流量的变化，较少被社会主义国家所特有的短缺所扭曲。之所以如此，不仅由于政策的制定者认识到了价格的市场出清功能，认



识到了像匈牙利这样的外贸依存经济,使国内价格结构更靠近世界市场相对价格的可取性,而且是由于在产出结构和投入品选择方面向国有企业提供了更大的行动空间,并且提高了财务指标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与那些在命令体制下完全服从于按实物指标完成计划任务的同行相比,匈牙利的国有企业对需求和成本较为敏感;这对于产品、特别是对于款式具有重要意义的消费品的质量和现代性来说不可能没有积极影响。(在这里,应该看得开阔些,把非国有经济活动的直接和间接影响考虑在内。)

不过,尽管存在所有这些必要的修正,无可争辩的是,新经济机制 20 年的运行并没有产生改革者预期的突破(我们坚持使用新经济机制这一称呼,因为它虽然失去了新奇性质,却已经成为一个类概念)。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体制的优点看来日渐消磨,就像到 80 年代末期日益恶化的绩效所反映的,在这里,副作用可以被更尖锐地感觉到。这种消极影响在社会领域里表现得特别突出:在收入差距拉大的总框架内,平均实际收入出现停滞并随后下降;补充“第一经济”收入的日益增长的需要,导致了把每周工作时数延长到人们可以忍受的极限;通货膨胀对一些阶层令人痛苦的冲击日益增加,等等。

现在,就产生了一个主要问题:与命令体制时期相比,新经济机制下的匈牙利经济运行方式是否发生了质的变化?根据绝大多数匈牙利经济学家的意见,答案是“没有”。亚诺什·科尔内以最明确的方式进一步论证了这种观点。<sup>⑦</sup>他根据有关这个问题的大量匈牙利文献,提出了自己的探察结果。科尔内对协调经济活动和经济当事人相互关系的两种“纯粹形式”:行政协调和市场协调作了区分。尽管现实生活中存在的

总是这两种协调方式的某种结合,但通过确定“混合物中各组成部分的相对重要性”,还是能够把行政协调体制和市场协调体制区分开来;由此,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可以归入市场协调一类,尽管存在某种程度的“行政干预”,苏联式的命令经济可以划归入行政协调一类,尽管存在一定的市场因素。至于1968年以后的匈牙利经济,科尔内界定为协调方式的形式上的而不是实质上的变化;它从直接的行政控制(通过强制性指标和资源的实物分配)转为间接的行政控制(通过运用金融手段,使企业服从于行政机关规定的优先项目)。在这个意义上,他提出了以下的看法,全文引证如下:

对市场过程进行行政干预的次数和强度有某种临界值。一旦超越这一临界值,市场就会被阉割,并为行政规制所主宰。这恰恰是匈牙利国有部门的情形。市场没有完全消失,它仍然起某些协商作用,但影响微弱。企业经理用一只眼睛盯着顾客和供给者,用另一只眼睛盯着自己的行政上级。实践告诉他把第二只眼睛睁得大大的更为重要;经理人员的职业生涯,企业的存亡,税收,补贴和信贷,价格和工资,所有影响企业繁荣的财政调节器,这一切都更依赖于上级权威机关,而不是市场行为。<sup>⑥</sup>

“双重从属”(从属于行政和从属于市场,其中前者占主导地位)以多种方式表现在国有企业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它们将是自己产出的负责人,但必须顺应来自各部委和其他经济行政机关的“要求”,这些机构自己认为或者被别人认为要对保证达到某些为满足国内市场或出口需要的预定供给水平负责(在出口情况下,各国在经互会协议中承担的义务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国有企业被授予选择自己投入品结构和供货者

的权力,但鉴于仍然广泛存在的生产资料卖方市场的征候,它们必须估计到,取得非正式的指标和许可证有时会更方便些。与旧的命令体制相比,它们是在一个大大自由化了的价格体制下运转,但是,通过直接确定某些价格,通过对被假定为由企业自行决定的价格规定详尽的成本计算规则,通过规定企业在打算进行价格调整时必须事先向监督机关报告,等等,行政规制仍然很高。工资总额的最高限额以及它与计划完成情况的联系、在册职工人数的正式的最高限额,都不再对企业有约束力了,但大量限制仍然同样以非正式的方式起作用。这些官僚规制方法(或者用我们自己情愿采用的词汇说,行政规制方法)可能只表明一个事实,那就是,尽管企业自己决策的范围扩大了,尽管评价标准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刺激转向像盈利能力这样的依赖于市场的因素上(后者更为重要,因为在新经济机制下,盈利能力毕竟不仅决定了经理人员和职工的奖金或企业发展基金的数额,而且决定了基本工资和薪金的支付能力),但是,旧的实践却难以消失。从表面上看,盈利能力可能具有刚才谈到的这些作用;但是,问题在于,通过个别对待的税收措施和补贴,通过根据上级强加的标准而不是根据即期的和预期的商业考虑来分配信贷,行政规制深深地介入财务领域。这样,就会进行大规模的基金分配,使之从较为成功的部门和企业流向不太成功的部门和企业,拯救低能者,限制高才的经营者。因此对财务方面绩效的更多重视并不能抵消旧的命令实践的非正式残留物的作用,而且(自相矛盾的是)强化了行政机关的力量。这些行政机关有权,即使不是根据什么异思奇想,至少也是根据自己的偏好体系,给经济单位以好处。这就不仅像科尔内正确指出的那样,使得企业财务状况更

多地是同上级权威机关进行成功地讨价还价的结果的函数，而不是市场绩效的函数，而且，它本身就带来了“棘轮原理”在变化了的形式下复活的威胁。

最重要的是，匈牙利的国有企业发现自己处于“软预算约束”状态，就是说，在面临任何破产威胁时，它都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指望政府的拯救，而且（同一硬币的另一面），只要企业在与行政机构的广义的讨价还价过程中取得成功，那么，单纯地不能满足商业标准，并不会阻止企业的发展。在资本投资的领域中，行政机构的权力尤其强大。通过直接的预算资金分配和通过将银行信贷用作中央计划手段的延伸，行政机关仍然把大部分投资活动控制在自己手中，建立企业自己的投资财务基础（发展基金），也起不到抑制作用。最后一个重要事实是，显然具有很强的政治含义的经理人员的任命、提升和降级，也是由行政机关控制的。

“软预算约束”和随之而来的企业对行政决定的从属，对相对价格（包括汇率和利率）合乎人意的调整其状况的潜力产生了不利的影晌，这反过来又成了寻求通过直接的行政压力实现这一调整的补充因素；于是，人们就不太注意消除价格结构的扭曲，较少依靠竞争的力量，而偏爱上级的直接干预。（一些观察家认为，新经济机制引入时匈牙利国有工业的组织集中程度非常高，反映了行政控制优先于竞争条件的建立。）

科尔内用若干有意义的实证性研究报告说明，新经济机制还没有根本改变经济的运作条件，从而也没有改变国有企业的行为。他引用的事例包括：因财政再分配引起的企业财务状况的变化，以及匈牙利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制造业中存货结构的典型差别。<sup>26</sup>但这种缺乏变化的最明显的证据是由对

期末“突击”现象的调查提供的,这种期末“突击”现象对于以完成指标状况(不论这种指标具有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约束力)作为期末工作成绩的判断标准的企业来说,乃是非常典型的行为。<sup>39</sup>与预期相反,匈牙利工业企业表现出了明显的“突击循环”,这可以作为很有说服力的标志,表明匈牙利企业的行为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与命令体制下的企业行为相同。

在解释这种情形时可以考虑几组并不完全相互独立的原因。首先,新经济机制的规定条款没有得到恰当的实施。某些作法,特别是一些作为“暂时”措施引入但实际上从未撤销的限制措施(在价格控制领域尤其多),导致了这种情况发生。不过,对初始蓝图被扭曲的怨言,主要与1972年以后的时期有关。当时党的高层权威机构的时事决策和人事决策都毫无疑问地从原来的改革计划大踏步后退了。人们在研究匈牙利有关这一问题的著作时得到的印象是,1972年以前的时期有时被看成是新经济机制的“黄金时期”。格兰尼克的著作<sup>40</sup>虽然主要以1970—1971年间的直接观察和访问为基础,实际上却包含了在后来的匈牙利文献中可以找到的、不用说是论述得更详细的大部分评价和结论。在格兰尼克的著作里,虽然没有明确使用科尔内的术语,但还是得出了新经济机制下的匈牙利经济仍然属于间接行政协调范畴这一结论,用以从分类上确认罗马尼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匈牙利之间存在着连续性。相反,

三个经互会国家为一方,南斯拉夫为另一方的两方之间却存在重大的不连续性。三个经互会国家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每一国都由集中计划指导,决策由单一的中心做出,……虽然三个国家集中指导的方法有很大的

不同,但都指向同一个目标:有效率地执行这一中心的决策。……相反,南斯拉夫的企业却应当在很大程度上看成是独立的权力中心,它的行动主要是通过市场协调的。<sup>42</sup>

现在我们先把南斯拉夫企业地位的特征放在一边,以后再加以讨论。在格兰尼克的著作中,有与本书前面提及的事实相类似的证据,这些证据支持了这样一种看法,那就是,甚至同实行新经济机制的初期一样,匈牙利仍然留在大家庭里。如果承认新经济机制开始实施时蓝图的扭曲程度很低,那么,实施不当因素的解释虽然不是没有一定价值,但也很难说是决定性的。

第二组原因难以用一个简单的标题来概括;最好的标题也许是:某些居于重要地位的政策目标对市场协调是有害的。这个令人迷惑的说法可以包括许多不同的目标,例如保持共产党精英分子的政治权力垄断,保护行政机关众所周知的、严加防护的既得利益(我们在本书决定略去这个主题)。不过,我们也可以把旨在提高社会福利水平这个高尚而又令人满意的政策目标放到这个标题之下。所谓社会福利,可以用一种内容丰富又可以被广泛接受的方式加以界定。这就是科尔内在其《短缺经济学》最后一章所用的概念——父爱主义,即支持处于困境中的家庭成员的原则的基础。<sup>43</sup> 格兰尼克在同一方向上指出了这一原则,但他试图更具体些,把“微观经济充分就业约束”(在某一给定工作岗位上的终身工作保障)作为市场协调的主要障碍,其次的障碍是“价格稳定约束”。我们认为,追求一些集中性的政策目标(无论是高尚的还是不太高尚的)会与市场机制的运作相冲突,甚至有选择地使某几个市场评判标准占据主要地位,也会导致连锁反应,把行政干预扩展到

远比原来的出发点更宽广的领域。这都是毫无疑问的。因此，第二组原因不能不加以考虑。不过，和第一组原因一样，我们认为第二组原因显然也没有告诉我们事情的全部真相。以“价格稳定约束”为例，如果说在新经济机制初期，说它阻碍了市场协调还说得通的话，那么，自70年代末开始价格大幅度波动以来，这一原因显然就说不太通了，80年代中期官方公布的通货膨胀率（消费价格指数）达7—8%，非官方估计则达两位数字。然而放宽这一约束，汇率和利率有了更大的灵活性，显然并没有提高市场机制的作用（相对于行政机关的作用而言）。“微观经济充分就业约束”的情形则更难以确定，因为它涉及的不是对事实本身，而是对事实背后的动机的评价。诚然，在匈牙利，经营不成功的国有企业并没有大量裁减劳动力，后来生效的破产法，至少到80年代末，一直都极少实施，因而更多地是一种宣传活动，而不是经济机制运行中的一部分。但在我们看来，纯粹（或主要）把这些事实解释成刻意追求“微观经济充分就业约束”概念中包含的特殊类型的父爱主义这一目标的结果，却太牵强附会了。与宏观经济充分就业不同，在既定工作单位中的就业保障很难看成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包括官方马列主义教条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我们所知，新经济机制期间（在这个问题上也包括新经济机制实行以前），匈牙利领导者的政策声明并没有包括这一承诺；相反，人力利用合理化的呼声却一直不断增强，人们也真心实意地试图采取具体措施达到这种结果。如果没有收到多大成效，其原因与其说在于政策约束，还不如说在于经济机制的缺陷，这种缺陷已被证明不适于引致令人满意的反应。在这方面，回顾一下波兰1982年的典型经历可能很有意义。当时，明确地旨在

使国有企业削减劳动力的改革措施被证明是如此的没有效力,以致当时为了防止造成宏观经济的失业现象所采取的提前退休计划,竟然造成了劳动力的普遍短缺。和任何一个类比一样,这个例子可能不完全适合匈牙利的情况,但说明了我们的观点,即,制度可能起阻碍而不是帮助作用。父爱主义的其他一些表现可能也属于这种情况。

这样,我们剩下了说明匈牙利经济为什么没能跨越行政协调和市场协调之间的边界的第三组原因:体制赖以建立的原则不恰当,改革蓝图本身有缺点。有人可能分辩说,不利于市场协调的政策目标的影响和市场取向的改革蓝图的影响之间并没有显著的区别,因而不足以证明二者应当分开分析。这话虽然有点道理,但正如我们对苏联式发展战略和命令体制的讨论所说明的,后者不能单独由前者来解释。我们认为这同样适用于改革了的体制:单单查考政策打算并不能正确地理解新的制度性解决办法及其效果。匈牙利的新经济机制以及共产主义国家的其他一些类似的经济改革尝试都产生于同样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根源:从社会主义有可能直接根据社会成本和社会收益而不是局限于私人成本和私人收益的评价标准而运作来观察社会主义的经济合理性。因此在新经济机制中,中央计划的决定作用仍然要保存,只是方法会发生变化;于是,就产生了宏观经济计划和市场的结合这个新经济机制的基本思想。当然,可以对新经济机制所主张的结合作多种不同的解释,而且这种结合可能丝毫也行不通。显然,不管结论是什么,新经济机制的理论框架都不仅值得单独讨论,而且值得特别注意。匈牙利的经济讨论在这方面没有留下什么疑问,讨论的大多数参加者都指出,1968年蓝图的主要缺点是,它甚



至在原则上都把市场力量的作用范围只局限于产品市场内，而把生产要素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摒除在外。<sup>④</sup>要深入讨论这些问题，就要求除其他问题外，还要对匈牙利新经济机制的理论背景的某些方面进行简要地重新评价。

### 注 释

- ①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纲领》。 *Programme of the League of Communists of Yugoslavia (Program Saveza Komunističke Jugoslavije)* (Kultura, Beograd, 1958)。在南共联盟第七次大会上通过的这一文件，可能最好地揭示了“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道路”。根据大会举行地城市的名字，这一文件以“卢布尔雅那纲领”著称。
- ② Włodzimierz Brus, 'The East European Economic Reforms: What Happened To Them?', *Soviet Studies* XXXI (2) (1979)。
- ③ David Granick, *Enterprise Guidance in Eastern Europe: A Comparison of Four Socialist Economies* (Princeton, 1975), 305。
- ④ 对于形成了所谓“新经济机制”的1968年匈牙利改革的那些原则，在Istvan Friss编辑的一部书中由这一方案的促成者们用英文作了介绍。见Istvan Friss, *Reform of the Economic Mechanism in Hungary* (Publishing House of the Hungarian Academy of Science, Budapest, 1969)。这些原则也可见于Granick的 *Enterprise Guidance*, part II 和 Paul Hare, Hugo Radice, Nigel Swain (eds), *Hungary: A Decade of Economic Reform* (Allen & Unwin, Hemel Hempstead, 1981)。本书作者之一(弗·布鲁斯)也讨论了匈牙利1968年改革的主要特征。见其著作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Eastern Europe, 1919--1975, Vol. II*, 'Institutional Change Within a Planned Economy,' ed. M. C. Kaser (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86)。Jean-Charles Asselain 做了一个饶有兴趣的尝试，他在社会

主义经济学的更一般意义上讨论了匈牙利的改革。见 Jean-Charles Asselain, *Planning and Profit in Socialist Economies*, English trans. (Routledge & Kegan Paul, London, 1984)。

- ⑤ 统计数字是以官方的国家出版物为基础的,大多数数字在维也纳比较经济研究所的经济绩效定期概览中被制成图表。
- ⑥ Kornai, 'The Hungarian Reform Process'.
- ⑦ Ibid.
- ⑧ Ibid, 1699--700.
- ⑨ Ibid, 1697, 1719.
- ⑩ 新经济机制下“突击”现象重现的第一个说明是由 M. Laki 发表的,见 M. Laki, 'End-Year Rush-Work in Hungarian Industry and Foreign Trade', *Acta Oeconomica* 25 (1-2) (1980)。从比较角度进行的进一步的分析,可见 Jacek Rostowski and Paul Auerbach, 'Storming Cycles and Economic System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10 (3) (September 1986)。
- ⑪ Granick, *Enterprise Guidance*.
- ⑫ Ibid., 10.
- ⑬ Kornai, *Economics of Shortage*, ch. 22, 'The Degrees of Paternalism'. 参见科尔内:《短缺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2 章。
- ⑭ M. 塔多斯特别强调了这一点,见 M. Tardos, 'The Conditions of Developing a Regulated Market', *Acta Oeconomica* 36 (1-2) (1986);我们将在下一章回到塔多斯的论点上来。并见同一期 *Acta Oeconomica* 中 L. Szamuelyi 的文章 'Prospects of Economic Reform in the CMEA Countries in the 80s'。

# 7

## 含有受管制的市场的集中计划 有缺陷的模式

从一开始就应当强调指出，不管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对于市场一般的反对的力度如何，社会主义对于资本市场肯定是彻底地、毫不妥协地加以反对的。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种态度的确立不仅仅是以教条为基础（资本市场，即使限于非私人参与者的范围内，也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声称的劳动最终说来是唯一的生产要素和合法的非剥削收入的唯一来源），而且是由于，资本的社会化，代表整个社会并为整个社会利益而进行的资本配置，表现为社会主义在经济上优越于资本主义主张的主要支柱。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生产力不受束缚的发展，波动的消除，过剩资本、过剩劳动力和未满足的需要同时存在的荒谬现象的消除，所有这一切都与社会直接负责为扩大再生产而从现期消费中抽出资源进行积累和分配密切相关。因此，个人储蓄就不再是积累的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来源；在决定积累应怎样使用时，也没有市场的位置，正如恩格斯在对杜林把储蓄率留给个人去决定的思想做出愤怒反应时强调的：“社会的最重要的进步职能即积累被剥夺，并且被

个人所掌握和支配。”<sup>41</sup>

在 30 年代“市场社会主义”概念被详细阐明时,恩格斯所主张的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积累必须是公共的事务这一主张得到了坚决的维护。兰格毫不怀疑资本积累率将由“公共”决定,也就是由中央计划委员会决定,中央计划委员会强制贯彻它自己的而不是消费者的对“收入流量的最优时间安排”的评价。兰格认为这类决策是任意的,也承认这有可能导致消费者福利的减少,但是,替代方案(让全部积累都由个人储蓄提供)“很难和社会主义社会的组织兼容”。所以,资本积累率决定权的丧失应该看成是为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生活的个人付出的代价,但它的收益却大大超过了这一项成本;兰格列出的收益包括,克服了资本主义无力保证资源充分利用、特别是无力保证充分就业的状态。<sup>42</sup>对于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模式,勒纳持有类似的观点,尽管他对“混合的但受控制的经济”具有不同看法。<sup>43</sup>这一切都意味着除其他特征外,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必须具备的特征是实施宏观收入政策,也就是决定全体居民收入总量(除去个人储蓄的净值)与一定时期消费品和劳务的总值(除去存货变化的净值)的总体比率,简单地说,决定工资同价格和税收的关系。因此,在资本积累率决定领域内对市场的排除,在一定意义上溢出到劳动力市场,因为这种排除给劳动力市场确立了界限,在界限之外不能进行讨价还价;可能正是这种内在的联系,在 80 年代的匈牙利推动了对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同时展开争论。

尽管存在着决定总体积累率的“任意性”,但是为了在各个部门和各个项目之间配置投资,兰格模式仍然包含了资本市场(或模拟的资本市场);配置机制通过“由资本需求等于可

供资本量这一条件简单地确定的”资本价格(利率)运作。<sup>④</sup>不过,如第5章已提到的,利用这种投资配置机制的合理性遇到道布的尖锐批评。道布争辩说,这种方法将或者会把资本主义式的波动放进来,或者要求非常复杂和累赘的反周期措施。<sup>⑤</sup>另外,道布和由市场机制分配投资的思想的其他反对者(如保罗·巴兰<sup>⑥</sup>)都坚持实行直接的集中投资计划的优越性,因为中央计划者能比单个经理得到更多有关整个经济未来发展趋势的信息,也不再需要猜测这类经理对(也是猜测的)未来价格的未来反应。

对于在社会主义中利用利率的怀疑,由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隐含内容,特别是由于卡莱茨基关于“利息率不可能由对新资本的需求和供给决定,因为不论利率是高是低,投资都能‘为自己融资’”的论断的坚实性而增强了。后一时期,卡莱茨基由于主张以下观点而引人注目。他说,在集中计划经济中,借助于利率的代用品(“边际补偿期”)计算投资效率只是在对实现既定生产指标和外贸格局的技术进行选择时有所帮助,而无助于选择整个经济结构的变化方向。<sup>⑦</sup>

反对使投资配置服从于市场机制的理论论证与斯大林逝世后在共产主义国家逐渐出现的经济改革思想非常合拍。改革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命令经济的缺乏效率深有感触,但他们(包括本书作者在内)却不是把失败归咎于集中计划本身,而是归咎于过度集中,认为这种集中显然超出了计划者对信息流量的搜集和处理能力。这种缺陷的产生,看来是因为计划者试图通过详细的强制性指标计划和资源的实物配置,来涵盖国有企业现期运转的所有方面:产出规模和产出构成,劳动和物质投入,供给来源和销售方向,价格、财务结果,等等。因此,

这类决策能够而且应当留给企业自己去作,企业间的横向联系则应当由行政管制下的市场(a regulated market)加以协调。但是,和现期决策不同的是,人们不仅对重大投资决策由中央作出的可能性仍然毫不怀疑;相反,被认为不能根据长期的社会标准保证有效配置的正是市场。而且,投资领域中过去的消极经历被归咎于现期运作细节使中央计划负担过重,而把它们交给受管制的市场去协调就能消除这种缺点。不用说,根深蒂固的社会主义集中计划和社会主义产权关系思想(它们被解释为国家对于建立新的生产能力和决定未来经济结构具有排他的权利),对于限制变革范围的倾向肯定有作用。改革家们(甚至那些被加上“修正主义分子”污名的人)只准备从无所不包的计划的老的十分绝对的观点挪动一段距离。但是,我们认为,不管意识形态(和政治)因素的作用如何,认为集中决定重要经济选择比市场机制决定能带来更好结果的基本考虑对于在5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在共产主义国家出现的改革蓝图中实际上把资本市场排除在外的做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sup>⑧</sup>

为了给排除资本市场提供理论基础,在有关探索合适的改革思想的经济争论过程中,人们做出了一些尝试。有些尝试,如卓越的中国经济学家孙冶方所做的,<sup>⑨</sup>以马克思的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划分为基础,用以指导如何在企业自主活动范围和中央保留的范围之间划定界限。有的尝试则超越了这种划分,赞成给予企业扩大生产能力和实现设备现代化的机会,但这也仍然局限于指定的活动范围,从而保持投资基金纵向再分配机制的统治地位,使中央继续充当通过部门配置和空间配置确定国民经济的积累率和结构变化的决定力

量。属于后一类尝试的还有布鲁斯的“含有内装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模式”(model of a planned economy with a built-in market mechanism),它有时被说成是1968年匈牙利实际改革的灵感源泉之一。<sup>⑩</sup>

人们决不应夸大理论构想对实践解决方法的影响,特别是在通常肯定包含政治许诺因素在内的体制改革情况下。然而可以说,匈牙利新经济机制的蓝图大体上遵循着上述划分,尽管归类不那么严格。在一部新经济机制刚实施就出版的关于改革了的体制的主要特征的权威介绍中,对这一点描述得非常清楚。<sup>⑪</sup>由于起始前提是,“中央计划组织能够最好地估算和计划标志经济发展主要过程的增长率和主要比例”,<sup>⑫</sup>所以,中央在投资配置中应起支配作用。就像这部著作的编者I. 弗里斯(Friss)所说的:

在新体制中,相当一部分的并且数量日益增加的投资将在企业自主决策的基础上实现。在这里,政府主要通过信贷政策工具保证自己的投资政策意图得以实现。不过,政府另外也有对主要发展趋势发生决定性影响的其他手段,即,集中决策最大的投资项目,决定一系列投资总额,其中的每一投资总额都将服务于某一特殊目的。最后,在国家预算外筹集一定的投资。<sup>⑬</sup>

把银行信贷与企业自主投资一起提及,可能被想象成开辟一个不发达的资本市场(没有使用这一术语),但是,“银行的信贷政策,从其主要特征看,也由政府规定,并因此成为计划经济控制的另一个工具。”<sup>⑭</sup>这就破坏了存在资本市场的印象。而且,由于企业自己的发展基金(利润留成)常常不足以进行投资,所以,国家支配的银行信贷就成为不可缺少的了,这

就把计划者的控制甚至扩大到业已分散化了的积累的用上。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在匈牙利国有部门中,中央投资活动和分散投资活动所占份额的统计,为什么没有恰当地反映出行政协调和市场协调的各自范围。

与把公共产权明确解释为由国家行政机构行使联系在一起的对资本市场的排除,在新经济机制蓝图中有关企业建立和解散的条款里得到了反映。以下来自弗里斯前书的有关引述虽然长些,却很有启发。

很明显,企业自主权的~~大大增强~~及企业经理的权限扩大,并不与它们对企业所有者即国家的从属相抵触[着重号是原有的]。其中自主权表现为有权处置企业资产(在法律规定确定的限度内)……。另一方面,企业对国家的从属反映在如下原则中:规定只有部长、国家权威机构的领导人、或地方议会的执行委员会才能建立企业,规定建立者有权决定企业的活动范围、任命和解除厂长和副厂长(们);而且,如果企业活动不再为国民经济所需要,如果企业不能继续盈利,或如果企业的有关活动可以由另外的企业更经济地完成,那么,建立者就可以将企业清算。在特殊情况下,在国家经济利益必要的时候,建立者也可以命令企业重组。建立者也可以把几个企业联合成一个托拉斯。……建立者有权利和义务,吹毛求疵地评价整个企业的活动和经理及其副手所完成的工作,决定他们的工资和奖金。<sup>66</sup>

与这种观点非常一致的是,把与新技术有关的所谓企业家风险转嫁给行政机构:

对于范围不同、重要程度不同的发展任务,在各种较



高或较低组织层次上精心制定了经济和技术构想。这些构想必须在以后相互联系起来,并相应地加以协调。一般说来,与国民经济的某一部门有关的构想应由有管理能力的部或其他全国性的权威机关精心制定;制定具有全国意义和涵盖几个部门的构想则属于国家技术开发委员会的职权范围。<sup>20</sup>

我们最感兴趣的,是把资本市场排除在新经济机制设计的市场协调因素之外的意义,这些因素原设想能够使新体制运转,并使新体制比旧体制更有效率。就像在其他事情中一样,把一个特殊因素的影响单独区分出来是困难的,人们必须谨慎从事,不要夸大这一因素相对于可能在同一方向(缩小市场协调在经济中的作用范围)上起作用的其他因素的意义。不过,我们(根据匈牙利的文献和我们自己的分析)仍然认为,可以在资本市场排除和产品市场减弱这两者之间建立一些有效的联系。

首先,十分明显的是,从上述原则可以自然地得出结论,要维护经济行政管理机关(用科尔内的术语是“行政协调”)的强有力的中心地位。任何类型的经济发展都要求有在部门间和空间上进行资本投资资源再配置的机制,如果横向再配置渠道被阻塞,这种功能就必然要被中央行政管理机关所接管,它们通过纵向渠道收集和再分配资金。这样做的意图在诸如上面提到的布鲁斯和新经济机制蓝图中的理论模型里表达得直截了当,但这些理论模型显然没有考虑到这样一种内在趋势,即,如果一个主体在一个领域中强大有力,它就会把自己的影响扩展到其他领域。共产主义国家所有改革尝试的实践使我们对于存在一种力量这一点确信无疑,借助这种力量,上

述趋势在中央决策者对被设想已经分权的经济活动的实际控制的复活中得到证实。而且,资本横向流动的阻塞(银行作为真正的中介组织,而不是“另一个经济的计划控制的工具”<sup>106</sup>的极其微不足道的作用除外),造成了一种特殊的集中化的反馈。被剥夺了在规定活动范围以外使用发展基金的权利的企业,倾向于尽可能多地在企业内部投资,这就可能导致无效配置;为了防止这一点,拥有更大的机会选择空间的上级行政机构就对企业的决策自由施加限制。

排除资本市场的第二个含义涉及到中央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作用。使广义的投资和消费总体比率得以有效调整的宏观经济收入政策,是计划经济实现下列目标的不可缺少的因素:避免由需求决定的波动,保证充分就业,保证生产能力利用的高水平。如上所述,这就要求控制价格和工资;不过,由于不存在资本市场,也就是不允许企业甚至家庭(作为借出者)也能对现期收益同未来收益之间的权衡施加影响,实行这种控制的全部重担就落到中央身上。这样,控制规定就会变得愈来愈僵硬、愈来愈详细,例如像我们在新经济机制设计中为将企业利润划分为职工分享的利润和发展基金所作的极精细的制度规定里看到的那样。对工资管理的规定也是如此,特别是在最初的一般规定(平均工资控制,超过平均工资时征收惩罚性的税收)已被证明不恰当、明确工资规定要适应相当频繁的变化和各产业间的差别以后,情况更是如此。不用说,工资规定的随意性,企业工资政策对上级行政机关的从属,肯定增强了。所有这一切都必然会影晌劳动力市场的运转(见后)。

与利用没有资本市场的市场机制的尝试相联系,需要讨论的第三个问题是竞争。命令经济的反面经历教育了改革家

们：竞争有益。而且，在经济运行新体制的理论建模和大部分蓝图中，竞争的作用都一直是与摒弃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中过度需求能够刺激生产这一声言相联系的；人们坚决主张把市场出清价格作为消除命令体制所特有的短缺现象的不可或缺的手段，并作为调整产出组合和投入构成的信号发生器。除了建议废止对于对外经济联系的控制外，人们还期望逐渐地使人们所熟悉的“国家外贸垄断制”连同它那使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相隔离的“价格均等化机制”，让位于两个市场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是通过由规范的关税制度来调节的“交易价格”（在国外市场支付或接受的价格，并通过单一汇率兑换成的国内价格）进行的。这可能为生产者和消费者提供一个竞争性的替代物。

国际收支平衡的约束说明，对外部竞争动力的期望过于乐观了，国际收支平衡的约束反过来又反映了外部的冲击和经济的适应能力不足的这两方面的问题。不过，除此以外，促进竞争行为的良好愿望无论在理论著作中还是在改革蓝图中一般都没有受到作为目标的社会主义改革大厦中其他的、有时是基本的特征的检验。首先，我们从与社会主义具有卓越的经济合理性声言的一个主要内容，即能够充分利用人力和物质资源有关的情形开始。人力物力的充分利用怎样影响竞争行为的条件、范围和方向呢？答案是相当模糊的——包括从认可需要“一定的”过剩供给（包括“一定的”失业）到坚持认为在充分就业水平上的需求和供给的总量适应决不意味着处处存在局部平稳，因而竞争的空间和刺激还是存在的。认为局部非均衡不可避免肯定是正确的，但如果排除资本市场，就没有理由期望在正在发展的部门里有竞争的位置。这是因为靠企业

自己的投资主动性是不可能越过部门之间的界线的；竞争最多出现在现有装配线可能生产的各种产品在市场上变换这一有限的范围内。在这种情况下，由企业家“创造性的破坏”精神<sup>20</sup>产生的那种竞争就更不大可能出现，这种精神的实质不是通过调整而导致均衡的恢复，而是通过开辟新的机会空间扰动现有的均衡；没有风险资本的进入，没有新的活动领域的开拓，就没有出现这种过程的余地。这本身并不意味着不能克服非均衡和寻求新机会；但是，它们肯定不是通过竞争机制而是通过适当的行政规制实现的，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配置机制，不论人们对这两种配置机制的比较效率如何评价。至于同垄断行为作斗争，则显然要求对有关部门和地区自由进入，很清楚，这是与资本横向流动的可能性联系在一起，从理论上说，像在兰格模式中那样，自由进入可以通过设定适当的规则加以模拟；在实践中，只有把竞争条件的维持看成是资本配置和新企业建立等等的标准，中央机构才能像上面所说的那样行动。不过，中央机构这样行动的可能性很小，因为它与有效的集中控制的利益相冲突（少量大企业比大量小企业更易控制），更不用提作为经济官僚统治特征的对于规模经济的夸大了的认识了。总的说来，那种认为即使不开辟某种资本市场，在产品市场或现期经济决策（用布鲁斯模式的说法）的范围内也存在竞争的观点，很难得到证实。

最后，在新经济机制及其理论先行者的设计中，排斥资本市场的蕴含意义的第四个因素，是对市场约束功能的影响，或者是对国有企业预算约束硬度（回到为人们广泛接受的科尔内的术语）的影响。这和上面讨论的竞争问题有联系，但又不完全相同；人们毕竟可以对大型组织的下属单位强制规定严

格的财务定额和其他定额,而不在它们之间建立相互竞争的关系,就像资本主义中大量的多部门分支机构的公司所实施的办法。人们期望经济改革的主要贡献是使国有企业服从市场纪律,强迫它们注意关于生产什么和怎样生产的正确信号。含有受管制的市场机制的中央计划这一思想的实质就在于,通过恰当的激励制度使企业成为利润导向的,使企业面对不以它们的意志为转移、并对所有企业都统一适用的“选择参数”(即面对货币数量或价格一般)。这些参数将反应中央计划的宏观经济优先选择,并把这些选择变成对微观层次上的行为具有约束力的指导;这可能包括补贴上的特殊优惠,但必须根据产品事先确定,而不能因企业而异和随企业的资产负债表而定。但是,像上一章指出的,管理经济的“参数制度”在匈牙利并没有实现,用格兰尼克的公式说,在那里,“财务监护代替了早先的实物计划。”<sup>④</sup>几位匈牙利经济学家,特别是塔多斯,把这种失误特别强烈地同缺乏资本市场联系起来。<sup>⑤</sup>

就投资活动而言,预算约束的“软化”乃是决策高度集中于行政权威机构、特别是中央手中的未曾预料到的结果。这意味着,一方面,企业的投资需要不受市场检验的制约,它们取得资金的成功依赖于它们使行政机关相信项目重要的劝说能力。因此,这里的问题是一个信息问题——中央独立评估有关项目并将它与一系列的能够得到的替换方案相比较的能力问题。另一方面,与模式中暗含的甚至是明显的假设即中央是社会利益的化身相反,在现实中,中央多半会在不同的局部利益之间寻求妥协,因此容易受到各种压力的影响。这里的问题是激励问题——中央自觉地为整体利益抵制局部的各种排他主义要求的能力。考虑到中央几乎是投资需求的唯一关卡这一

条件,它的信息结构和激励结构的可能的不恰当,不仅对于宏观经济均衡,而且(在我们讨论问题相关的范围内)对于企业的财务纪律,都肯定具有极大的破坏作用。一个附带的结果也会经常出现:有缺陷的项目完工投产后,它们就会向行政机关提出给予特批财政支持的合法要求,因此也就成为破坏现行财务纪律的一个根源。

不过,缺乏资本市场对于软化现期运转的预算约束的意义并不限于刚才提及的方面。最重要的含义,如同匈牙利经济学家所强调的,包括产生这样一种状态,它使绩效欠佳的企业完全不可能,或者说极难受到被迫缩减其活动和最终破产的威胁。如果禁止目前不成功的企业为重组它们的业务而到市场上筹措资本,包括把业务范围扩大到其他更有希望的领域,或者使它们不能被那些能看到潜在机会的更有活力的企业接管,那么,严格应用市场博弈规则实际上将导致总体无效率:不仅那些不能恢复过来的企业要垮台,就是那些尽管暂时困难但前途光明的企业也会垮台。在这种资本市场评估机制缺乏的条件下,行政机关必须插手——这再次为任意破坏财务纪律打开了大门。塔多斯这样总结新经济机制在这方面的实践:

目前,新经济机制不能成功地把财务压力作为调节方式来运用,这不仅因为,如果没有中央干预,普遍引进的规则会使过多数量的企业陷入破产境地,而且因为,在市场制度中,破产意味着存在随时准备接管垮台企业的自由资本。[在匈牙利]则缺乏这种自由资本,其原因不在于资本稀缺,而在于收入集中化,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如果有一点资本的话,留给企业的资本也只够用来完成

中央同意的经济目标。因此，政府不会允许财务约束普遍变硬。在过去的将近 20 年间，中央机构不断地被迫不仅运用据称是规范的干预办法……而且运用公开区别对待的干预办法。干预有不同的强度而且做法往往因企业而异……。中央机构常常允许企业提高出厂价格（生产者价格），并被迫给予企业个别的税收减免、补贴和优惠信贷。<sup>②</sup>

这就清楚地说明，经济单位预算约束软化的根子不能一般地归结为父爱主义政策，特别是归结为微观经济就业保障原则，而应该追溯到体制设计的缺陷上去，即明确地放弃上述政策，也不足以有效地抵制这种内在的体制倾向。

从匈牙利经验看，为资本市场作论证的论据总起来说是强而有力的，匈牙利经验揭示了把“受管制的市场机制”（the regulated market mechanism）只限于产品市场这种改革思想逻辑上的不一贯性。另一个问题是资本市场的范围和型式，它与国家经济作用的联系，特别是它在社会主义所有制框架内的可行性，不过在目前的讨论阶段上，着手处理这个问题还太早。

就我们所能够判断的，不太清楚的是匈牙利经济文献常发出的对新经济机制中缺乏劳动力市场这个项目的批评。一旦存在职业和工作地点的选择自由——换句话说，当人们不是由权威当局的命令分配工作时，人们就可以预料劳动力市场实际上会出现。当行政分配和罚处劳役（严格意义上的强制劳动）的做法归于消失时，即使在命令经济的条件下，也可以说存在劳动力市场。无可否认的是，在占优势的国有经济中，劳动力市场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市场：只有一个总雇主，它自己

制定规则,谁都不能公开地对规则提出疑问(禁止提出疑问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制度的结果)。但在配置过程中,仍然必须利用劳动的相对价格(工资差异),也不得不以这种或那种形式承认调整工资(和/或其他报酬形式),以适应供给和需求条件的变化的必要性,这相当经常地违反从上到下的规定。命令体制向新经济机制的转轨,扩大了劳动力市场的运行范围,增强了企业的自主权,企业受到的强制性指标和生产资料实物分配的强制减少了,特别是受到了日益增加的国有部门之外的活动的影响。当然,考虑到上面说的新经济机制下行政协调和市场协调之间真实的总体关系,劳动力市场的状况也肯定不尽如人意,特别是某些保护雇员权利的传统规定(例如,经理人员有法律义务对每一个被解雇的人员说明解雇他的属于个人方面的具体缘由)继续影响着劳动的流动性。

但是,在匈牙利经济改革新阶段上“引进”劳动力市场这一含混的需求的背后,存在一个真正的主要问题:怎样创造条件,使工资决定过程的基本法则从行政领域进入市场协调领域。我们已经几次强调收入分配(价格同工资间的关系)对宏观政策目标的重要性,强调资本市场的缺乏同国家在这一领域中的管制范围之间的联系。但其意义不止于此:就劳动而言,劳动的“买者”和“卖者”之间缺乏市场式的利益对立,显示了达成市场(“合理”)劳动价格的难以克服的障碍,这本身就给官僚协调敞开了大门。国营企业经理并没有限制工资支付的内在动力:只有在外部压力下,他们才努力这样做,而且,如果没有(或没有足够的)由市场产生的“预算约束”,那么,这就意味着压力是来自上级的,具有行政的性质。因此,所有改革尝试都进行过长期的努力,以寻求命令体制中工资控制的替



代物。命令体制中工资控制的主要工具是计划工资单与计划产出之间的联系(通过也是由上级确定的定额系数对超额完成或没有完成进行校正)。自1968年新经济机制引入以来,已经尝试了几种方法,结果是成败参半,用大白话说就是,控制越有效,从市场标准看的劳动配置越无效。

因此,如果对缺乏劳动力市场的批评暗含的意思是,国有企业的经理和劳动力都应受市场纪律和市场配置机制的支配,那么,它是有事实根据的(这当然并不等于说它能提供容易的解决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劳动力市场的活力依赖于它与市场机制其他因素的运作相互衔接的程度,也依赖于比较坚定的宏观经济政策。但在许多方面,它依赖于是否有可能重新建立双方真正的讨价还价过程,不用说,这又反过来触及到社会主义本质的基本方面。

本章的论述可以总结如下:正是“含有受管制的市场机制的集中计划”这一概念,应被看成是未能使匈牙利国有经济受到市场协调支配的哪怕不是唯一的、显然也是重要的甚至可能是主要的基本原因。从蓝图中排除资本市场显然首先要对这样一个事实负责:国有部门中市场式组织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被降低成了一种新的行政协调形式。市场式的组织不是在宏观层次上与计划相互作用,而是大体上被作为计划的工具来使用,它们虽然不同于原来的行政命令手段,但最终仍服务于类似的目的,产生大体类似的结果。新经济机制在这方面的经验表明,甚至由改革家们长期为之奋斗(在多数国家未能取得成功)的诸如废除强制性产出指标和生产资料配给这样的重要措施,如果缺乏必要的辅助因素,也不能带来重大的实质性的变化。在评价“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过程的其他

方面时,这种需要把形式和内容区分开来的教训的意义不应该被忽略。

匈牙利、中国、波兰,乃至 80 年代末期的苏联,构筑资本市场和扩大劳动力市场的要求,以及随之而来的试验性实践步骤,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与这里提出的相类似的结论。在目前,试图废止行政性工资控制,把一定形式的资本市场(没有用这一名称!)引入社会主义经济已经有了一些经验,这就是南斯拉夫的经验。因此,我们将转而考察南斯拉夫的改革记录。

#### 注 释

- ① *Anti-Duhring*, 370. 参见《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663 页。
- ② Oskar Lange, 'O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a Socialist Economy', in *O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ism*, Oskar Lange and Fred Taylor (Lippincott, Minneapolis, 1938); paperback edn (McGraw-Hill, New York, 1964), 85.
- ③ Lerner, *The Economics of Control*, 263 and 314-15.
- ④ Lange, 'On the Economic Theory'.
- ⑤ Dobb, 'A Note on Savings and Investment'.
- ⑥ Baran, 'National Economic Planning'.
- ⑦ Michal Kalecki, *Theory of Economic Dynamics*, revised second edn (Allen & Unwin, 1965; published in America by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8), 50 and 73.
- ⑧ 见 Michal Kalecki, 'The Scope of the Evaluation of the Efficiency of Investment in a Socialist Economy', in *Selected Essays on the*

*Economic Growth of the Socialist and the Mixed Econom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72).

- ⑨ 特别是从这一角度对东欧经济改革的考察,可见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Eastern Europe 1919-1975* 一书的第三卷第 25 和 26 两章。
- ⑩ Sun Ye-fang, *Some Theoretical Problems in the Socialist Economy in Chinese*, (Beijing, 1979), as reviewed by C. Lin in *China Quarterly* no. 98 (June 1984), 357-61. 孙冶方:《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C. Lin 的评论可见《中国季刊》第 98 期(1984 年 6 月),第 357-361 页。
- ⑪ 这是布鲁斯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市场》(*The Market in a Socialist Economy*)一书中提出的模式。
- ⑫ Istvan Friss (ed.), *Reform of the Economic Mechanism in Hungary*.
- ⑬ Ibid., 73.
- ⑭ Ibid., 19-20.
- ⑮ Ibid., 20.
- ⑯ Ibid., 17.
- ⑰ Ibid., 16.
- ⑱ Ibid.
- ⑲ Sc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81-6.
- ⑳ Granick, *Enterprise Guidance*, 281.
- ㉑ Tardos, 'The Conditions of Developing a Regulated Market'.
- ㉒ Ibid., 83.

# 8

## 南斯拉夫的教训

我们对南斯拉夫经历感兴趣的主要是它在 60 年代前半期进行的种种改革(这里改革一词用的是复数,因为 1961 年就开始采取了一些措施,在 1965 年又作出了重大改变)。这些改革的明显意图是:跨越行政手段和市场手段相结合的经济机制同充分发展的“劳动自治的市场经济”<sup>①</sup>之间的分水岭,前者在许多方面类似于匈牙利的新经济机制(但着力强调自治成分)。这些改革是作为在通向“自治社会主义”这种向苏联式国家社会主义模式挑战的宏大设计的道路上进一步前进的步骤提出来的。<sup>②</sup>然而与此同时,人们也期望改革能够提供有利于经济效率提高的条件,从而带来现实的好处。在此之前,据认为由于经济体制框架缺乏前后一贯的性质而使经济效率受到损害(在 80 年代中期的激烈争论中,人们也提出了另一个稍微带些冷嘲热讽意味的原因,即由于组成南斯拉夫联邦的各民族共和国不可能就联邦投资政策的重点取得共同意见,因而可接受的解决办法只好到决策分散化中寻找)。

60 年代的南斯拉夫改革也以这种或那

种方式遇到了我们在讨论匈牙利新经济机制时提出的两个重要问题,第一,1961年,企业被授权自主决定纯收入(支付税收和社会保险后的增值)在个人收入和公积金之间的分配,而这在以前是由工会(在相对工资方面)和对决定投资活动水平感兴趣的地方当局(公社)共同地相当严格地控制的。同时,银行的作用也提高了,外贸体制也自由化了。

第二,1965年,通过减轻税收负担,减少并随后取消了对国家拥有的固定资本的付息,企业分配权力的数量维度扩大了:企业在附加价值总额中占有的份额从1960—1963年的平均47%上升到1967—1971年的平均59%。<sup>③</sup>一直被国家作为动员和分配投资资源的主要工具的“社会投资基金”也随之取消了,社会投资基金的未支出的余额转移给银行,银行也积累了可贷基金,用以作为投资信贷。联邦政府剩下的主要直接投资责任只限于为加速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提供基金。结果,由不同组织控制的投资基金的比例大大改变了:属于联邦、共和国和地方政府的“社会基金和预算”的份额从1960—1963年的60%下降到1972年的20%,银行的份额(私人储蓄除外)从3%跃升为42%,企业(“联合劳动基层组织”BOAL,即企业或它们的自治单位在1976年以后的称呼)只有微小变动,从37%上升到38%。据认为,企业占有的份额在附加价值总额中增加和在投资基金中几乎保持不变,二者之间之所以存在差别,其原因在于,工人集体在个人收入和投资之间优先选择前者。<sup>④</sup>

南斯拉夫的当代经济文献没有把以上重要变化的任何一组看成是劳动力市场或资本市场的引进或扩大。

劳动力市场的概念很难在意识形态上与一般的社会主义

思想和特殊的自治社会主义思想一致起来；后者设想是把工人联合起来而不是雇用他们，雇佣被认定是劳动所有者和生产资料所有者之间的买卖关系的保持。自治实行后不久，个人收入就取代了工资。据认为个人收入的称呼不只是具有象征意义，它也反映了一种崭新的现实，即劳动者也分担企业家的职能，因此有权取得扣除成本与外部义务后的剩余。由于需要计算成本，也由于需要事先确定工人的基本收入，所以，实践不可能简单地遵循上述概念变化的全部逻辑。因此，除“最低个人收入”外（最低个人收入是由法律确立的统一数额，对所有工作种类都相等，它是作为工人生计的最低保障来支付的），有保障的收入水平因部门而异。不过，不管理论观点的精微之处及其与实践的联系如何，企业得到的收入分配自由显然提高了企业调整自己的工资（“个人收入”）政策以适应劳动供求状况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有利于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尽管这种劳动力市场含有由南斯拉夫总的经济制度框架产生的许多特点。

在南斯拉夫的意识形态名词术语中，资本市场也不是一个很受欢迎的概念，尽管事实上至少从 1961 年以来，某些形式的货币市场已经存在了，甚至在 50 年代，部分国家投资基金就在企业提出的利率的基础上在企业之间进行拍卖了。<sup>39</sup> 但不管用什么词，60 年代特别是 1965 年的改革却是打算让市场机制逐渐配置投资资源的。在这一方向上变动的基本因素是，把马克思所说的扩大再生产的责任从国家身上转移到企业身上，或者（根据流传很广的南斯拉夫说法）从政治领域转移到经济领域。同时，向企业提供更大的投资自筹范围；而且，就像让企业自己斟酌决定纯收入在积累和个人收入之间

的划分一样,企业将通过市场参数的评估在现期收益和未来收益之间进行选择。企业之间、部门之间和地区之间投资资源的再分配再不是通过国家预算这种纵向的路径(上述特别发展基金除外),而是通过横向路径进行的;通过企业直接投资或借给其他企业以及通过银行体系进行。从上面的数字可以看到,银行成为金融媒介的最重要的工具。银行在政府的宏观货币政策和信贷政策范围内按照商业原则运转,政府的宏观政策目标,则被认为“从集中注意力于部门投资配置的定性目标向集中注意力于投资总体水平的定量目标”转移。<sup>⑧</sup>在这样的条款规定下,可以把银行体系看成是资本市场的一个要素,特别是如果采取了措施来防止出现银行权力过大的威胁,情况就更是如此。这些措施包括以企业资源的汇集、公债发行等等作补充的相当大的资金自筹范围,还包括企业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的银行部门的组织结构。根据1965年的“银行和信贷法”,商业(“基层”)银行(在既定活动领域内其运转不受限制)由企业和国家机构(地方、共和国或联邦的“社会政治共同体”)建立;它们作为平等的合作者,向银行提供自有资本(信贷基金),成为股东。银行的经营管理人员由建立者成员根据它们在资本中的份额进行控制,但投票权最高只能占总数的10%,借以防止垄断。投资体制和银行体制的变化一直伴随着宣布对价格管制的广泛解除和使已经放开了的对外经济关系体制进一步合理化。

如果进行严密细致的考察,前面提到的措施就要加上一些限制,并且要把形式和内容仔细区分开来。尽管如此,南斯拉夫大部分经济学家仍然会同意前面引述的关于南斯拉夫1965年以后是“劳动自治的市场经济”的性质规定。对于后来

向“契约”(dogovorni)经济过渡的完成时间,可能有一些争议,但这和我们讨论的问题关系不大。与南斯拉夫大部分经济学家相似,许多国外的分析家对这种提法也毫不怀疑:如格兰尼克,他以1970年对斯洛文尼亚的调查为基础,在援引南斯拉夫经济学家拜特(Bajt)的话时感到他的论断确定无疑。拜特的话大意是,“南斯拉夫沿着亚当·斯密的道路前进,达到的程度对于整个欧洲来说都是非同寻常的”;<sup>⑩</sup>10年之后,林达尔(Lydall)总结说:“南斯拉夫和资本主义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共同特征,那就是市场经济”。<sup>⑪</sup>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至少就几个方面从上一章讨论的匈牙利新经济机制思想上的不妥当之处这一角度,至少对南斯拉夫60年代初期改革的结果进行一番考察。

让我们像在匈牙利的场合下一样,在记住所有的必要保留的条件下,再次从观察经济绩效开始。

一般而言,与大多数其他“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相比,对南斯拉夫特定时期经济绩效更加难以评价,这是因为南斯拉夫的短期经济波动强烈,从而使评价结果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进行比较所选择的时间跨度。也许最适于我们目的是约热·门辛格(Jože Mencinger)进行的比较分析,<sup>⑫</sup>他按照三个继起的“经济体制”来安排资料:1952—1962年,“行政和自治相混合的市场经济”,1963—1973年,“劳动自治的市场经济”,1974年到资料截止的1984年,“契约经济”(鉴于体制转换的准确确定存在明显的问题,门辛格选择把新宪法的颁布作为一个时期的开端)。附表列出了他给出的主要经济指标的平均年率(我们略去了1946—1952年“行政社会主义”时期的资料和1980—1984年的特殊资料)。表中还补充了一些比率;



这些比率可以看成是比较效率的试验性的指示器,尽管对于它们的计算方法缺乏明确的说明。

**南斯拉夫:主要经济指标的年平均变化率**  
(%,按 1972 年不变价格计算)和附带的效率比率

	1952—1962	1963—1973	1974—1984
<b>经济指标:年平均变化率</b>			
国内生产总值	8.3	6.5	3.9
工业产出	12.2	8.6	5.4
农业产出	9.2	3.1	2.1
就业(农业除外)	6.8	2.4	3.6
出口(美元现价)	12.0	14.0	13.3
进口(美元现价)	10.1	16.6	11.8
固定资产投资	11.5	5.3	1.0
私人消费	6.5	6.4	2.8
零售物价	3.6	13.0	28.3
<b>效率比率</b>			
投资/国内生产总值	41.99	38.87	35.21
资本/产出	2.28	2.23	2.64
就业/产出*	3.37	2.42	1.86
劳动力中的失业份额	5.01	7.58	13.29
出口在进口商品值中的份额	64.56	69.44	63.96

\* 按 1972 年价格计算的每 100 万第纳尔产值中的社会部门就业额。

比较得出的结果非常明显:与匈牙利在改革后的第一阶段(见第 5 章)改进虽不显著但却可以看得出来的情况不同,

南斯拉夫的改革后时期的情况表明,经济绩效明显恶化了,很少有什么例外。在我们看来,在许多方面近似于匈牙利新经济机制的南斯拉夫的第一个体制表现得明显好些。因此,对于80年代中期激烈争论的参加者之一,把这一时期描述为南斯拉夫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sup>⑨</sup>就没有什么令人感到意外之处了。当然,也有一些给这一时期“镀金”的特殊因素。第一,在1949—1961年间,美国的援助总计20亿美元,按现在的标准看,这是非常多的,它等于进口商品价值的28%。<sup>⑩</sup>第二,这里有“过去错误的储备”,如卡莱茨基描述的,取消明显荒谬的行政性的超工业化运动所得到的一次性效应(在农业方面特别明显,1946—1952年间年平均下降3.1%,接着在1952—1962年,年平均增长9.2%)。第三,前一时期拖后的一些工程现在可以投入使用,因此现期投资费用总额较低。第四,在成长的阶段,可能出现比较普遍的减速趋势,尽管南斯拉夫一些经济学家强烈否认这一点。<sup>⑪</sup>

尽管一些特别有利的条件可能影响了1952—1962年的纪录,使“劳动自治的市场经济”出现了一些积极的迹象(首先是劳动生产率的较快增长,还有60年代末国际收支的改善),但是可以说,改革的总体结果肯定是非常令人失望的,从严格的经济角度看是这样的,从社会和少数民族问题的角度看也是这样。增长的减速,伴随着通货膨胀的加速以及连开放边界、大量向西欧移民都抑止不住的失业的增长,引起了人们特别是工人的不满。经济权力从联邦向共和国地区政府的转移与市场力量的更大作用结合在一起,看来更有利于国内比较发达的地区,因而激化了民族冲突。局势紧张程度增加的第一个公开的政治反映发生在1968年,当时工人支持贝尔格莱德

的学生抗议；紧接着是 1970—1971 年克罗地亚的民族主义骚乱，其危险性不仅在于骚乱本身，而且在于它的其他含义。据认为，对经济上的消极后果和政治骚乱之间联系的感受变得十分强烈，以至于足以说服统治集团认识到需要改变轮廓分明的市场社会主义道路。1974 年的新宪法，特别是 1976 年的“联合劳动法”(Zakon of Udruženom Radu 或 ZUR)，再加上同年的“计划法”，在目前都被相当一致地看成实际上用“自治的社会计划”取代市场而成为主要的协调机制。原设想“自治的社会计划”能与市场兼容，因为它的执行是通过自治单位间的自愿协议、通过自治单位与国家各级权威机关以及各级国家权威机关相互之间签订契约进行的。但在实践中，新制度把国家带进了一个官僚主义随意性的真正迷宫，其中，单一的执政党(“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的地方机构行使最大的权力。随之产生的经济机制不仅没有提供任何一种有效协调(“既不是市场也不是计划”)，反而大大促使国民经济进一步肢解为含有六个共和国和两个自治地区的松散联盟，其中，共和国(地区)当局有充分的职权全面干预资源配置，人们认为，被一些南斯拉夫经济学家称之为“多中心国家主义”(polycentric étatism)的“契约体制”(contractual system)，是这个国家 1976 年以后无情地滑入 80 年代充分成熟的经济和政治危机的主要原因。

不管对上述主张有效性的检验多么吸引人，我们在这里应该研究的却不是这个问题，我们要研究的是，南斯拉夫显然没能得益于、也显然没能维持市场社会主义的改革阶段，其原因何在？南斯拉夫经济学家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分歧特别大。我们将试图简单介绍一些主要的思想趋向——鉴于在特殊问题

上划分派别时的内容和方法的复杂性,这样做并不容易。

一种思想趋向认为,市场社会主义的概念本身是完全的市场社会主义尝试未能取得成功的原因。在一部可以看成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作中,K. 米哈伊洛维奇(K. Mihailović)强调,60年代的改革实际上打乱了“计划与市场之间、激励与协调之间、宏观经济要素与微观经济要素之间的均衡”。<sup>48</sup>通过把扩大再生产的责任转移到企业身上,改革就从战后初期那种把市场完全排除在生产领域之外的片面的行政体制转向完全排除计划的另一种片面性,要求市场履行至少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是超出其能力的职能:决定国民收入中积累和消费各自的份额,决定部门和地区的投资结构。在一个苦于资本短缺的不太发达的国家,资本市场特别不适合于完成这些职能。在这一方面以及其他方面过多地依靠市场,就不可避免地要求有矫正性的行政干预,但这种干预不可能恢复失去了的制度均衡,并且还会产生“既不是市场也不是计划”的混乱。在南斯拉夫的特殊情况下,联邦一级的计划就成为过分市场化的图谋的主要牺牲品,同时,使得共和国和自治区一级的行政性对抗措施极为有效,而这种行政性的对抗措施则带来了经济分割的一切恶果。指出这一点是很有意思的:米哈伊洛维奇完全没有提及匈牙利人对于新经济机制运作所作的批评,以及这些批评对内装受规制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模式的有效性的可能含义,看来他自己实质上是赞成这一经济模式的。

与上述思想趋向相反的意见则强调,对人们的失望和最终转向错误地构想出来的“契约”制度负有责任的,不是市场社会主义思想,而是在实施这种设想时过分小心翼翼和举措失当。尽管持这种观点者并非人人都准备无条件地赞成拜特

的直言快语,后者简单明了地指出:“1965年改革不成功的突出原因在于市场剂量不够大”。<sup>④</sup>但是,从1986年对“我们所有的经济改革”<sup>⑤</sup>的大量讨论来判断,人们对于一般市场和特殊资本市场没有恰当运作这一点的认识的一致程度还是很高的。讨论中提出的最典型的说法是对实际上取消了一切形式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批评,认为这种取消使市场运作完全失去了控制,结果,带来的与其说是竞争的自由,还不如说是垄断掠夺的自由。这种批评的提出者没有清楚地说明他们认为不可或缺的是哪种政策(或计划),他们隐含的最重要的意思可能是,国家缺乏首尾一贯的财政货币政策(这也是世界银行报告所强调指出的一种现象),而不是米哈伊洛维奇的思想趋向所支持的集中计划。讨论提出的改革实施中的最薄弱的环节,是没有注意到生产要素定价(区别于产品定价),特别是没有注意到资本价格。不仅企业内由国家赋予的资本不需付费,银行信贷的利率也是大大低于通货膨胀率的。这种古怪的政策很可能从银行体系的组织构造中来追溯根源。银行几乎不能保持独立性并在商业上愿意对抗其有控制力的股东即“社会政治共同体”和大型企业的权力和利益,后者感兴趣的与其说是银行的盈利,还不如说是贷款的价格低廉和条件宽厚。软弱的国家银行以各种形式提供头寸,对于市场运作会产生多重消极后果:企业(尤其是与银行相比地位更强大的企业)可以靠牺牲内部积累(有时甚至包括折旧)支付较高的个人收入,并且申请投资信贷,利息率的适当增加也挡不住这种过多的信贷需求。结果,资本配置的价格机制只好由非价格配给来取代。这就使有控制权的国家机关更多地介入了决策过程,能够影响投资的实物结构,这特别会阻止资本在地区之间流动。

这种机制的通货膨胀效应也是明显的,这种通货膨胀效应越明显,“软预算约束”在南斯拉夫越是一个普通现象(和其他共产主义国家不同,与南斯拉夫存在买方市场的印象正相反),也就是允许企业拖欠债务和货款支付,或简单地由地方行政机关拯救企业。很难确定社会考虑在何种程度上刺激了这种松弛,但值得一提的是,1986年改革争论的参加者之一认为,如果实行严格的财务标准,10%的企业(拥有50万以上的雇员)就只能倒闭。<sup>⑩</sup>指出这样一点也是很有意义的;南斯拉夫一些经济学家强调,南斯拉夫未能通过对外经济关系的自由化来发展国内竞争条件。

如果接受了第二种思想趋向的论证方法(我们认为总的说来它似乎有道理),人们就只能说,不管表面现象怎样,甚至在“劳动自治的市场经济”的鼎盛时期,南斯拉夫所提供的也只是一个旨在引进有限资本市场(以及前述意义上的劳动力市场)的流产了的尝试,而不是由于这种市场的制度化而使经济绩效日益恶化的一个案例。这并没有使第一种诊断(不同于疗法),即在建立好更好的投资配置体制之前就拆除掉旧的体制会产生有害效应这一诊断完全无效。从后一角度(能使一个更好的配置机制投入运转)看,如同劳拉·泰森(Laura Tyson)正确地指出的,南斯拉夫1963—1965年改革的经历“说明了从资本配置的传统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换中可能遇到的某些困难。”<sup>⑪</sup>

在这里,我们不打算深入考察南斯拉夫发生这些困难的原因。政治因素显然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在关于经济改革的公众讨论中,人们强烈地强调了这一点,尽管常常很不具体。另一个明显的批评对象是非常复杂的少数民族问题,许多年来

这个问题被掩盖起来了,而不是加以研究,并找出可行的解决办法。不过,很有必要在南斯拉夫的背景下,从两组问题对“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取向经济改革的一般意义的角度,对它们进行考察。这两组问题是,私营部门的地位,乃至更为重要的、自治的经济后果。

关于第一个问题。南斯拉夫(不同于匈牙利和中国,或者1987年后的波兰)从国有(“社会”)部门的改革和私营部门的范围扩大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中得益甚少。匈牙利新经济机制的经历表明,后者不仅对市场刺激作出迅速的反应,增加商品和劳务的供给(这在从一种体制向另一种体制转轨期间特别重要),而且对国有部门的一些领域产生了竞争压力,因而成为改革过程的特殊催化剂。这种情况在南斯拉夫60年代的改革过程中很少发生,其原因不在于与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相比,南斯拉夫的私营(和小合作社)部门所占的份额小,而在于阻碍私营部门对市场发挥更大潜在影响的大量限制仍然没有解除。例如,直到1980年,虽然农业中有90%的现役劳动力是替私人工作的,但其中大多数都在贫瘠的土地上进行只能糊口的耕作,而且装备低劣,没有土地集中的可能(自共产主义政权初期以来,就施行了可耕地最高拥有量为10公顷的法律)。私有农户的相对低收入和前景黯淡是推动农民大规模向城镇移民的有力因素。这不仅加剧了失业问题,而且使私营农业日益掌握在老人和缺乏教育的人手中,其中,妇女还占有很大的比例。至于非农业私营部门,则经常受到行政性的骚扰和财政压力,受到正式的雇工限制(林达尔<sup>®</sup>给出的数字是最多为5个非家庭成员工人),这对于旅游业和饮食业可能最少,因为除国外劳工汇款和带回的货币以外,这是吸引外币投资

的两个行业。不用说,人们大规模地逃避正式限制,兼职也成了广泛现象,但这(虽然对收入分配产生了重大影响)对整个经济运行并没有产生在匈牙利或中国可以观察到的积极影响,因为在匈牙利和中国,一些私人的和真正合作性的活动领域在经济改革过程中合法化了。在南斯拉夫,许多人把斯洛文尼亚较高的市场化程度和相应的效率优势,除其他因素外,还归结为私人企业和合作企业的贡献;这些企业在斯洛文尼亚比在国内其他大部分地区都享有更大的合法性。

至于说到自治,它对经济运行的含义长期以来一直是理论争论和人们寻找经验证明来支持不同观点的尝试的主题。1958年由沃德<sup>⑧</sup>(B. Ward)挑起的这场争论的问题是,在类似的市场参数下,与资本主义企业相比较,自治企业具有什么样的行为。特别是由于自治企业的目标函数是每个工人收入的最大化,而不是利润的最大化,所以,问题就特别在于,在其他条件不变时,自治企业是否会通过比资本主义更低的产出、更少的雇工、更高的资本密集程度,来达到自己的最大化。在这里对这场争论加以考察没有什么意义,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看一下注<sup>⑨</sup>提到的几本出版物。但值得指出的是,在寻找克服危机的可能方法时,南斯拉夫国内争论再起,这一次,那些彻底拒绝沃德式的论据的人们发现自己遇到了有力的挑战。<sup>⑩</sup>

我们直接关心的问题是南斯拉夫的自治形式对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意义。南斯拉夫企业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合作社。通常意义的合作社是,社员们集体拥有资本,每一个社员在资本总值中都保持一份股本,他有权按照通过的章程撤回和处置这一股本。南斯拉夫自治企业的资本——包括过去拨付或现期拨付交给新建企业的资本(1965年以来免交利息)



和来自纯收入留成的积累——据认为是归社会所有的。企业（严格说来是“联合劳动基层组织”）的全体劳动者可以说是一种受托人团体，它负责管理社会资产、充分享有用益权，因而也对企业家风险负责。但是，所有这些都与单个工人有关的权利和责任都绝对建立在受雇任职的基础上，如果停止受雇，他也就无可挽回地失去这些权利和责任。这就产生了富鲁布顿（Furubotn）和佩杰维奇（Pejović）首先提出的假说：<sup>⑤</sup>从自利的观点看，理性地行动的南斯拉夫企业工人可能不太愿意将剩余用于集体再投资，而更愿意将它分配为个人收入，这种个人收入（如果进行私人储蓄的话）将会创立个人能够自行处置的资产。前面提到的数字表明，企业资金在整个投资资金中的份额是停滞的（随后甚至下降），这种现象被看成是这一假说的经验证明。南斯拉夫一些经济学家对此则持不同意见，<sup>⑥</sup>他们认为，这种现象只是产生于真实利率为负数这一错误政策，这一错误政策使自治集体的上述分配行为完全合乎理性原则。然而，如我们描述银行体系的组织时所指出的，利率政策本身可能和自治企业自有资金再投资倾向低有关。不管怎样，如果考虑到很难确定各种因素对实际发展的具体影响，人们可以说这些经验证据至少在逻辑上同假说是一致的。因此，自治制度损害了未来收益自然属于做出现期投资决策的人这一规则的确定性，为他人享受积累资产的收益提供了可能性，从而削弱了资本市场的基础。

关于通过在现有企业之外的直接投资（无论是投资于别的企业，还是创建附属于自己的独立生产单位）进行的资本的横向流动，似乎也宜于作出同样的结论。对于第一种直接投资（投资于别的企业），唯一的公开途径是通过某种形式的兼并，

这种兼并常常意味着兼并的双方共享收益,而不论各自的相对力量如何;取得资本股本和在管理委员会占据相应的地位,当然和自治体制的本性相冲突,更不用说完全接管了。对于第二种直接投资(建立附属于自己的独立单位),必须考虑到附属企业脱离出去成为独立自主实体的可能性,在新单位建立在别的地区、有可能得到当地政府的支持时,就更是如此;这种独立意味着最初的资本支出转化为一种单纯的贷款,成为一种全然不同的事情。而且,大型企业内的生产单位分解成若干自治的“联合劳动基层组织”,甚至会给企业内部的资本流动造成障碍。只要证明这种分解的正当性的理由是“为了工人的真正参与,必须使生产单位规模变小”,那么,这种分解就不应该看成是一种政策执行上的偏差,而应该看成是自治的一种必然结果。关于资本流动的限制对“自由进入”其他部门和地区的原则的实施产生了不利影响,在全国范围内资金再分配的潜在可能减到最小、地方政府表现出强烈的自给自足倾向的情况下,这种限制往往促成垄断地位的建立。

至于自治对劳动力市场的意义,我们首先观察到:这种体制的规则没有给工资上的讨价还价留下余地。按照正式的规定来说,无论是在资本所有者与工资争取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中,还是在一方(如国家)把自己看成是更广泛、更长期的利益的代表,而与眼前的、本位主义的利益的对抗中,任何一方都不可能讨价还价。在自治集体能够自由决定怎样分配纯收入(就像南斯拉夫60年代初期的规定非常接近地达到的那样)的限度内,它的地位就相当于一个个体经营者,这种个体经营者必须在考虑市场压力和市场前景的条件下,亲自在现期收益和未来收益之间找到适当的平衡点。但是,一旦把产权问题

考虑进去,一旦把现实中使自治企业预算约束软化的诸种因素考虑进去,这种相似性就不复存在了。所有这些,都给劳动力市场的运作制造了巨大的障碍。在实践中,必须建立一种能够遏制要求增加工资的浪潮的屏障;在南斯拉夫,这往往是由非规范的行政干预来承担的,在紧急情况下,也包括正式的工资冻结。但不管使用哪一种行政干预方法,行政干预方法的经常使用本身,就是劳动力市场失灵的一种表征。

当然,只要遵循“按市场检验过的劳动成果分配的原则”,<sup>②</sup>简言之,只要企业的分配受他们的净收益总额的限制,市场条件对南斯拉夫企业支付个人收入的一般能力就会有影响。不过,这也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收入差别和市场。据我们判断,在南斯拉夫,因绩效不同产生的企业之间和部门之间的同工不同酬的现象,不仅比资本主义国家和其他“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严重,而且,由于存在与自治制度有关的生产要素流动障碍,这种现象还特别持久。至于劳动力,南斯拉夫经济文献经常强调的是,比较成功的集体不愿意从失业者行列中或从其他企业和地区招募追加的劳动力,以免稀释自己的收益。这种看法是同人们观察到的相对资本密集型投资和消除失业特别困难这两种趋势相一致的。<sup>③</sup>但这并不意味着一个企业在决定个人收入水平时能够完全不顾其他企业的情况,并不意味着不存在一种朝同种工作的报酬均等化的方向起作用的机制。但正如波波夫(Popov)所指出的,<sup>④</sup>在自治的条件下,这种机制的作用表现出奇异的不对称性:赶上整个部门中平均收入水平的任何一种增长的趋势十分强烈,但朝相反方向的趋势却非常弱,甚至不存在。个人收入的这种上升的灵活性和下降的刚性,肯定是加剧通货膨胀、增加失业的另一

个因素。

无论在纯粹的经济意义上,还是在社会政治意义上,我们的讨论都没有打算成为,也不应该被看成是一种确定自治思想的一般的有效性的尝试。这种讨论只在于分析自治对于社会主义经济中发展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前景具有怎样的意义。我们的结论是,如果认为南斯拉夫式的自治完全阻碍了达到这种前景,这种看法可能过于苛刻,但是,认为这种自治对达到这种前景大大增加了困难,看来是正确的。不过无论如何,从南斯拉夫经历中,从匈牙利的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对新经济机制的无可争辩的不同反应中,我们所应汲取的最重要的教训可能是,必须考察市场运作同资本所有制形式之间的联系。我们将在第四篇研究这一问题,在对这一问题展开分析之前,让我们首先分析完全的市场社会主义的宏观经济含义。

## 注 释

- ① 这一提法来自 Jože Mencinger, 'The Yugoslav Economic Systems and Their Efficiency', *Economic Analysis and Workers Management* XX (1) (1986)。他指出,“混合的行政和自治的经济”是从 1953 年持续到 1962 年,“劳动自治的市场经济”是从 1963 年到 1973 年。其他的南斯拉夫的著作家们,以及外国的学者如哈罗德·林达尔 (Harold Lydall, *Yugoslav Socialism: Theory and Practice*, 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84),则运用了不同的术语和稍微不同的时间跨度,但是,他们对南斯拉夫经济体制变化、尤其是关于 60 年代初期的改革意义的描述,却基本上类似于 Mencinger 的描述。

- ② 对这两个模式的比较讨论见布鲁斯 *Socialist Ownership and Political System*, ch. 2。
- ③ 见世界银行派往南斯拉夫的代表团的报告; World Bank, *Yugoslavia: Development with Decentralizati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Baltimore, 1975), 219。
- ④ 数字来自 *World Bank, Yugoslavia*, 221, Table 9. 11。
- ⑤ Branko Horvat, 'Yugoslav Economic Policy in the Post-War Period: Problems, Ideas,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LXI (3) (June 1971), part 2 supplement, 139。
- ⑥ Laura d'Andrea Tyson, 'Investment Allocation: A Comparison of the Reform Experiences in Hungary and Yugoslavi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7 (3) (1983), 296。
- ⑦ Granick, *Enterprise Guidance*, 342 and 486; Alexandar Bajt, 'Yugoslav Economic Reforms, Monetary and Production Mechanism', *Economics of Planning* VII (3) (1967)。
- ⑧ Lydall, *Yugoslav Socialism*, 150。
- ⑨ Mencinger, 'The Yugoslav Economic Systems'. op. cit.
- ⑩ 见南斯拉夫杂志 *Gledista* (Views) (May-June 1986)关于“所有我们的改革”的令人瞩目的争论中的 Zoran Pjanic。
- ⑪ World Bank, *Yugoslavia*, 289。
- ⑫ 除其他人外,见 Alexandar Bajt, 'Trideset godina privrednog rasta: problemi efikasnosti i društvenih odnosa' (Thirty Years of Economic Growth: Problems of Efficiency and Social Relations'), *Ekonomist* XXXVIII (1) (1985)。
- ⑬ Kosta Mihailovic, *Ekonomska Stvarnost Jugoslavije* (*The Economic Reality of Yugoslavia*), 2nd edn (Beograd, 1982), 205。
- ⑭ Bajt 'Trideset godina privrednog rasta', 14。
- ⑮ 1986年的几期 *Gledišta* 都进行了这一讨论。

- 
- ⑩ 这一论点是由 France Cerne 在 *Gledišta* 1986 年 5-6 月这一期上提出的。
- ⑪ Tyson, 'Investment Allocation', 297.
- ⑫ Lycall, *Yugoslav Socialism*, 272. 该书的整个第 13 章都是关于私营部门的。
- ⑬ Benjamin M. Ward, 'The Firm in Illyri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48 (September 1958). 对于工人管理的企业的行为与资本主义企业的行为和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行为进行了比较, 这篇文章引起了一场广泛的而且仍然在继续着的争论。林达尔的 *Yugoslav Socialism* 一书的第三章包含了一个关于这场争论的有益的综合评述和作者对自己观点的陈述。我们将在本书的第 10 章对这场所有制问题争论的若干结论加以考虑。
- ⑭ Branko Horvat, 'Farewell to the Illyrian Firm'; Lubomir Madjar, 'The Illyrian Firm - An Alternative View'; Branko Horvat, 'The Illyrian Firm - An Alternative View: A Rejoinder'; *Economic Analysis and Workers' Management*, nos 1 and 4 (1986).
- ⑮ Erik G. Furubotn and Svetozar Pejović, 'Property Rights and the Behaviour of the Firm in a Socialist State; The Example of Yugoslavia', *Zeitschrift für Nationalökonomie*, (3-4) (1970).
- ⑯ 在这方面, 南斯拉夫经济学家中最突出的当推 Branko Horvat.
- ⑰ Sofija Popov, 'Utvrđenje ličnih dohodaka u samoupravnom socijalizmu' (Determination of Personal Incomes in Self-Management Socialism'), *Ekonomska Misao*, no. 3 (September 1985).
- ⑱ 奥斯卡·兰格和 Marek Breit 在 1934 年承认市场社会主义下需要消减由于这种“关门主义”(closed doors) 倾向产生的失业和收入差别过大的危险, 他们在给波兰社会主义党的一个左翼集团起草的纲领文稿中, 提出了一个建议。根据这一建议, 自治企业“有义务雇用所有申请[工作]的工人”。对于这一模型及其含意的广泛的理论

讨论, 见 Alberto Chilesi, 'Self-Managed Socialism with "Free Mobility of Labour"',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10 (3) (1986)。

② Popov, 'Utrvđenje ličnih dohodaka u samoupravnom socijalizmu'.

# 第 四 篇

---

市场社会主义——面临的问题





# 9

## 资本市场和充分就业问题

我们对一些“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的经历和作为这些改革的基础的规范理论所进行的讨论表明,那种只有产品市场、特别是没有资本市场的折衷方案,没有带来人们切望发生的从行政调节到市场调节的变化,从而没有给困扰社会主义经济的效率缺乏问题提供答案。这已为共产主义集团内外的经济学家们所共识,已经成为一种通常的见识了。抽象地说,由这样的估计并不一定会得出结论,认为走出这种缺乏首尾一贯性状态的唯一出路是进一步大踏步地向市场推进。也可能往相反的方向(如运用更好的经济组织和更复杂的技术实行全面计划化)寻求一贯性。但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在中国的改革浪潮和苏联改革的情况下,占上风的态度看来是赞成建立在市场基础上的一贯性。在这里,我们不打算论证或反对这种或那种选择。不过,因为市场取向看来占据优势并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很可能付诸实践,所以,我们打算探索“现实的社会主义”朝这个方向发展所可能带来的问题。

我们将把包括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以

及资本市场在内的首尾一贯地改革了的体制称为严格意义上的市场社会主义(MS)。由于与折衷方案相比,市场社会主义的主要创新显然在于资本市场的引进,所以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到资本市场问题上。

### 资本市场——需要、形式和预期

看来,简短地重新叙述一下市场取向改革中赞成资本市场的主张,由此开始我们的分析,是适当的。在命令体制(集中计划经济CPE)和受管制的市场体制中,效率缺乏和由此而来的短缺经济的直接根源,用科尔内的术语说,在于长期存在着的软预算约束。软预算约束为什么会长期存在呢?我们尝试着顺着以下线索回答这一问题:一个硬的预算约束意味着企业(厂商)绩效的好坏完全取决于它的收益的多少。但是,如果企业的优劣只是从财务成果上来评判,它们就必须拥有利用所有可利用的机会求得生存和进行发展的权利。这就涉及包括那些与企业内外的产品和工艺创新有关的决策在内的投资决策权,如果企业内部和部门内部的机会有限的话,还包括部门内外的投资决策权。另外,如果真正实行竞争,那么,严格遵循与利用这些机会的可能性相关联的自由进入原则,就是必不可少的了。自由进入,不管是实际的进入还是仅仅潜在的进入,都真正是维持竞争压力的必要条件。由此看来,投资决策的分散化乃是旨在硬化企业预算约束的体制变革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投资决策的分散化为企业家精神和创新开通了道路,因为后两者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与现期决策,而是

与投资有关。反过来,投资决策的分散化又产生了对资本市场的需要。如果没有资本市场,企业手中的盈余(它随着为集中投资而积累的国家收入的减少而增加),无论是用于扩大现有的生产线还是用于兴建全部归企业自己所有的附属单位,都只能在本企业的范围内投资;同时,企业的投资规模也完全被它的自身储蓄限制住了。这样的体制可能非常繁琐,限制也很严格,对资源再配置的限制程度可能比旧的通过中央预算的再分配机制更高。在这种条件下,由于折旧基金的积累和再投资之间在时间上的可能不对称,即使折旧基金运用得当也会出现问题。

从最一般、最简单的意义上说,资本市场通过储蓄者和生产性资产的投资者(企业家)之间的交易,提供了一种横向的再配置储蓄的机制。我们在这里不需要研究这种机制的纷繁复杂的结构,它在实践中涉及一个由许多中间阶段和流向转换所组成的迷宫。对我们来说,在一个投资过程分散化了的经济中,把注意力集中在资本市场的最终职能上就足够了。不过,把资本市场的主要形式,如企业间的直接信贷关系、商业银行业、债券市场、股票市场(经济文献中相当经常地把后面两项称为“资本市场”)区分开来,可能对我们以后的讨论有意义。

就企业间的直接信贷关系而言,在现代西方市场经济中极少有企业间的长期资本贷款,没有理由认为在市场社会主义的条件下情况会与此不同。资本领域中的发达的信贷关系显然要求专业化的金融中介组织。在市场经济中,这种功能是由商业银行体系执行的。所有开始了投资分散化过程的“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也都认识到了需要建立这种体系;到80年

代末,南斯拉夫、中国、匈牙利、波兰、苏联都出现了初期形式的商业银行业。国有商业银行的创立等于(至少在形式上)消除了传统的单一银行体系,在那种传统的单一银行体系中,中央银行的职能和从事核算、结算和信贷的单一的行政性组织的职能结合在一起了。这一变化涉及一些技术问题(例如,向商业银行提供初始法定资本的方法),但主要问题当然在于商业银行的真正“商业化”,也就是商业银行和国家行政机关真正分离,作为追求利润的企业而自由行动。

我们知道要有一个不可避免的学习过程,也知道存在其他因素,但迄今为止的经历几乎没有提供足够的线索,说明商业银行在市场社会主义下的资本市场中能够起什么实际作用。因此,我们的评估肯定主要是假说性的。尽管如此,看来也可以正确地说,即使不考虑资本市场的其他的可能形式,银行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满足由投资分散化产生的需要。在某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德国、日本),银行体系在资本配置过程中的作用长期以来都比证券市场的作用大,在由“现实的社会主义”演化而来的市场社会主义中,它也很可能仍然如此。显然,银行不是储蓄者和商业借款者之间的简单中间人,它能够借出吸引来的大量存款,成为信贷资金的积极创造者。通过执行这一职能,银行能够而且确实能够改变货币量,从而影响利息率,使投资水平发生变动。银行有能力在商业基础上扩大或缩小投资信贷额,从而有助于硬化对投资者的预算约束。同时,因为商业银行网络结构的特征常常是比较少量的大银行占据领导地位,所以,中央银行就能获得一个相对有效的货币政策工具。关于货币政策的任务和基本的潜在能力,我们将在本章的第3节进行讨论。

尽管银行在资本市场领域的活动范围相当宽广,但很难期望它成为市场社会主义中资本市场的唯一要素。这种看法的基础与其说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在一些“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匈牙利)中,证券市场在商业银行业建立之前实际上已经出现了,<sup>①</sup>还不如说是银行不具备而证券市场却能具备的一些特征,这些特征是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共同具备的,其中之一是通过开辟二级市场(或通过买回过程)引进了贷款偿还日期的灵活性。二级市场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长期借入意愿和短期借出意愿之间的冲突。证券市场,特别是在有二级市场的情况下,增加了储蓄者的风险因素(也就是使资本受到损失的幽灵),但同时也提供了得到资本收益的期望。总的看来,通过吸引更多的和集中那些不集中就会分散的储蓄,证券市场扩大了资本市场的规模,也鼓励了投机。这种投机在减少资本运动的可预测性的同时,加速了资本的运动。

“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激进的改革家们对股票市场抱有特别高的期望。<sup>②</sup>其主要原因在于他们相信市场评价企业(股份公司)绩效具有很大的效率强化的影响,其中最大的影响是接管(包括接管意图的潜在压力)和与股票交易密切相关的持续地对资本进行评价的过程的作用。在和“现实的社会主义”向市场社会主义的转变问题具有比较特殊的关系的多种因素中,人们把重点放在把国有企业转变为股份公司上面,从而为国有企业从国家行政机关中真正独立出来提供更大的机会。股份公司在董事会中接纳各种利益的明确代表,甚至允许个人和(或)集体少量持股,从而在企业内部引入混合经济成分。人们认为,工人持股的股份所有制能够提高劳动者在整体运行中的参与程度,并使之与那种在没有个人股本的普通自

治环境中达不到的责任水平结合起来。

不用说,对社会主义经济中建立资本市场的预期往往被过度夸大了。没有一个市场能在教科书描述的顺利状态下运作,即使这种情景是在不完全竞争的假设前提下描述出来的。金融市场的情况尤其如此。在西方世界,金融市场的运动反映了许多与真正的生产和交换事务无关的因素的影响。对于社会主义会出现奇迹,也就是能既让马儿跑、又能让马儿不吃草,不用付出代价就能收获到资本市场可能产生的果实的希望,即使目前仍然残留在人们心中,它显然也是站不住脚的。与此相反,人们对本节开头提出的如下观点,即,在公有(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对投资分散化的需要和与之密切相关的对资本市场的需要是完全合理的这一观点,态度却全然不是肯定的。硬预算约束下的公有企业在不确定条件下的运作能力还需要得到检验(第10章)。然而,如果暂时假定合理性问题已经解决,那么,必须面对的问题就是引入资本市场后的宏观经济后果了。

在接下来的一节中,我们试图讨论这些后果以及处理这些后果的可能手段。不用说,大部分讨论是以理论的方式进行的,并会留下像如何在抽象的理论同复杂的社会经济实践之间架起桥梁之类的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甚至在纯粹的理论模型中,我们对许多重要问题也未加考虑。因此我们假定,我们所考察的经济只由国有企业构成,从而不分析生产资料的国有制和私有制之间的关系问题。不过,最重要的简化是把所论的经济看成是一个封闭的经济。只是在本章的结尾部分,我们才非常简短地涉及到放松这种假设所产生的复杂情形。

## 市场社会主义中的经济波动和失业

分析一个还不存在的体制是非常困难的。不过,如果这种体制与那种其经历已被长期研究过的资本主义制度具有一定的共同特征,那么,设想一下这种体制的某些规定倒并不应该是不可能的。当然,并不存在一种被人们普遍接受的关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理论,但有些理论假设还是被人们所共同接受,至少被某些具体的经济思想流派所接受的。如果注意到这一点,那么,宣布本书作者也运用了分析动态经济问题的凯恩斯—卡莱茨基方法的一些基本要素,可能也是可取的。以下分析就将运用这种方法。

市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企业(厂商)的地位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在市场社会主义中,企业必须只由短期和长期利润以及资产价值的增值来驱动。它必须对自己的行动负全部财务责任,并在一个除其他要求外,还要求有进入自由和退出自由安排的竞争环境中行动。它与资本主义企业的唯一的(却是重要的)区别(在目前的分析阶段上)是它排除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因此,这种企业的行为被认为与资本主义企业的行为完全一致。如果企业是一个股份公司,就假定社会主义经理和资本主义经理同样地有效率、同样地事事操心,尽管在董事会中,社会主义经理面对的股东只是国家或其他国有企业和组织的代表。也假定董事会的决策只由盈利性的考虑支配。当然,我们的分析结果赖以导出的这些假设都很严格。在这里,我们的任务在于尝试性地考察这一体制在宏观经济稳定与增



长的条件下能够被期望如何运转。

市场社会主义指的是一种真正货币化的经济,其中,所有物品(不仅是指集中计划经济中的消费品)都是作为商品提供的。它们为出售而生产,只有在转化为货币(即转化为一般的购买力)之后,生产过程才算结束。商品向货币的转化(用马克思的话说是实现)是货币化经济中再生产过程的关键阶段。当然,在这种条件下,商品的实现不是自动地得到保证的。一方面,储蓄意味着购买力退出流通,因而产生没有相应需求的供给。另一方面,投资意味着把购买力注入流通,因而意味着没有相应供给的需求。在这种条件下,不考虑储蓄和投资的关系,就不可能解决现实问题。

让我们设想,整个经济分为生产投资品 I(部门 1)和消费品 C(部门 2)这两个部门。每一部门的附加价值都在工资  $W$  和(毛)利润  $P$  之间进行分配,在这里,利润包括除工资和折旧外的所有要素支付。工资花费在消费上,没有任何时滞,利润则全部储蓄起来。

让我们从部门 2 开始。假定已知价格与成本的比率,产出价值  $C$  相应于部门 2 的工资总额  $W_2$  和利润(或剩余)  $P_2$  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出售给部门 2 的工人;但第二部分却在这个部门内部找不到市场。假定、且只假定投资品在部门 1 生产,就会产生工资总额  $W_1$ ,从而出现部门 2 中剩余产品的市场。如果  $W_1 = P_2$ ,那么消费品需求就与其供给相适应。如果把  $P_1$  加到这一等式的两边,就得:  $W_1 + P_1 = P_1 + P_2$ ; 即  $I = S$ ,  $S$  表示等于投资的(毛)储蓄。

投资和储蓄之间必须在一切情况下都保持事后相等。然而,哪一个因素是主动的,哪一个是被动的呢? 计划预定的投

资服从于投资决策,这有一定的时滞,因此它在给定的短时期内是一个外生变量。在同一时期,储蓄则是,或主要是国民(总)收入  $Y$  的增函数,即  $S = S(Y)$ ; 储蓄因此是一个内生变量。如果我们不考虑非计划预定的存货变化,  $Y$  就必须达到  $S(Y) = I$  的水平,这一水平称为均衡国民收入  $Y_E$ 。因此,如果已知储蓄函数,那么,每一投资水平(低于还要进一步讨论的一定水平)都决定了一定的适应于市场规模的国民收入水平。在这种意义上,与萨伊定律相反,总需求创造自己的供给。但是,均衡国民收入可能达到、也可能达不到它的依赖于投资规模的充分就业水平  $Y_F$ 。如果储蓄是国民收入的比例函数,储蓄率等于  $s$ ,那么,  $I_F = sY_F$ , 这里  $I_F$  表示充分就业时的投资水平。因为  $I < I_F$ , 所以我们有  $Y_E < Y_F$ ; 与  $I_F$  相比,  $I$  越小,失业就越多。

在进一步着手分析以前,我们必须对价格和成本作一些假设。价格可以分成两组——需求决定的价格和成本决定的价格。<sup>③</sup> 原材料和农产品属于第一组,它们的供给在短期内是没有弹性的。需求增加(减少)时,价格上升(下降),但商品数量却保持不变。所有其他商品属于第二组,它们的供给在一定限度内是有弹性的。需求增加(减少)时,商品数量也增加(减少),但价格却与成本保持着比例关系。如果成本不变,价格也就不变。

在这一章中,我们只研究成本决定的价格,而不考虑需求决定的价格。假定平均可变成本是常量,只有在生产能力接近于得到充分利用时才开始增加。至于价格/成本比率,我们假定它是由市场不完善程度决定的,并且在生产能力瓶颈起作用以前保持不变(或至少是粘性的,即只是缓慢地起变化)。由

于价格/成本比率保持不变,所以,(总)利润就和产出同步增长;因此,储蓄率(等于国民收入中的利润份额)也保持不变。

现在让我们假定,(实际)投资按照原先的决策增加了  $dI$ ,部门 1 中的工资总额增加了  $dW_1$ 。如果存在失业(这说明首先要有投资增长),那么,部门 2 的产出就会增长,直到利润增加到等于  $dW_1$  的  $dP_2$  为止。部门 2 的产出增加是  $dC$ ,它必须大于  $dP_2$ ,因为部门 2 中的工资总额也增加了  $dW_2$ 。加起来看,国民收入  $Y=I+C$  增加了  $dY=dI+dC$ 。著名的  $dY/dI$  关系被称为投资乘数,并大于 1。类似考虑也适合于  $dI<0$  的情形。因此,投资的任何变动都产生了国民收入的多倍变动,产生了等于投资变动的储蓄变动。的确,根据  $dW_1=dP_2$ ,在两边都加上  $dP_1$ ,我们得到  $dW_1+dP_1=dP_2+dP_1$  和  $dI=dP$  或  $dI=dS$ ,因为利润的增加意味着储蓄的等量增加。因此,投资是主动因素,储蓄是被动因素,投资借以创造储蓄的中介则是国民收入额。

我们迄今已研究了包括存在失业(和空闲生产能力)及不变的价格/成本比率(价格不一定不变)的纯粹数量调整。现在我们转过来讨论已经存在充分就业的一种情形。上面已描述的机制于是不能再运作了。的确,由于存在充分就业,投资只有损害消费才能增加,因为劳动必须在两个部门之间进行转移。假如货币工资率水平已定,工资总额  $W_1$  就必须增加,而如果价格已定,剩余  $P_2$  就必须减少;这就导致消费品的需求超过消费品的供给。即使消费品价格与工资相比提高了,在消费品市场上也可以重新达到均衡,但价格/成本比率可能有变化。现在我们有了一个纯粹的价格调整过程,而不是前面描述的数量调整过程。国民收入总量没有变化,但其结构却发生了

改变。<sup>37</sup>

在投资决策只由盈利能力考虑支配的市场经济中,是不太可能存在纯粹的价格调整的。整个过程的确从假设就业从部门 2 向部门 1 转移开始,但这一转移不一定成功,因为在部门 1 试图出高价吸引工人时,部门 2 也可能试图提供更高的工资,以留住本部门的工人。如果劳动转移没有成功,货币工资的初始增加就会传递给价格,而没有进一步的后续影响。如果一些转移在开始成功了,它们也会很快结束。的确,价格增长必须快于货币工资增长,但由于工人们可能维护自己的实际工资,所以,预料会有通货膨胀的发展。在对劳动的名义需求增加时,难以想象工人们还会接受较低的实际工资。另一方面,成本的增加会抬高投资品的价格,并有可能对首先推动整个过程运转的投资扩大产生不利影响。在进一步分析中我们假定,在达到充分就业之前,价格/成本比率不变(或是粘性的),数量调整占据优势。

资本主义经济的特征有二:相对不变的价格/成本比率和投资波动;投资之所以波动,是因为对未来盈利能力的预期有波动。结果,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国民收入、就业和投资一同波动。卡莱茨基把资本主义的价格/成本比率不变看作资本主义的主要缺陷。他把社会主义经济中这一比率的预期的可变性判定为社会主义的优点。<sup>38</sup>不过,他脑子里想的是这样一种社会主义,其中,某个中央权威机关(按照传统的名字,我们称之为中央计划委员会 CPB)将确定相对于货币工资的投资和价格;也就是说确定成本。总的说来,中央计划经济的实践支持了他的观点;也就是说,如果投资被削减(与国民收入相对而言),中央计划委员会就会降低价格/成本比率,以便阻止国民

收入下降和防止失业。<sup>66</sup>

在这个意义上,集中计划经济不是一种需求决定的而是供给决定的系统。国民收入总量是由现有的生产能力和劳动力(包括它们在这一系统内特有的效率水平)决定的,而与投资水平无关。市场社会主义企图成为一个需求决定的系统。因此,人们期望在市场力量的影响下,过去的价格“固定性”会重现。换句话说,分配参数将恢复其首要作用,国民收入将随投资活动的变动而变动。在这样的条件下,假定只有企业有权作出投资决策,那么,我们要分析的就是市场社会主义中企业的预期投资行为问题了。这些决策不是重复性的,它们具有长期的、几乎不可改变的后果;而且重要的是,由于存在与未来事件有关的不确定性,它们还涉及到风险。因此,对未来的预期将在投资决策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企业的预期严重地依赖于预算约束的硬度。预算约束越硬,企业就越是深信自己的生存和增长只取决于自己的赢利能力,预期赢利能力也就越能影响投资决策。但是,不只投资有风险;如果在真正的、势均力敌的竞争中,更有进取心的企业与缺乏自信心的企业相比占了上风,那么,机会丧失会成为同样危险的事情。<sup>67</sup>因此,预期未来会发生的事件中的一个重要项目是经济环境中其他当事人进行的活动,这些活动反过来依赖于预测者自己对未来的预期。在这些情况下,一个企业就会努力猜测其他企业的预期,后者同样会这么做。预期之间的相互作用将产生其最终结果极难预测的投资决策。<sup>68</sup>

在实践中,企业投资决策受市场信号影响,这种信号可以(而且必须)被看作预期的状况的代表者,不用这种办法就无法观察到预期的状况。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企业的财务状况。它

是由企业自有资本及其流动性(liquidity)、以及进入资本市场的机会,也就是企业取得信贷的可能性所决定的。自有的货币和借入的货币将决定企业财力所能承担的最高投资水平。

企业是否应当充分地利用这些融资可能性,取决于具体的投资项目和对未来收益和成本的预期。那些有望开辟新市场和(或)导致成本进一步减少的产品和工艺创新会鼓励作出投资决定。利润水平及其变化也具有同样的作用。的确,如果企业资本存量已定,这些因素就会决定利润率及其变动。明确表达市场社会主义中的投资决策函数是不可能的,即使对于现行体制的宏观经济分析来说,这一函数的明确表达也是一种不可逾越的障碍。根据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经验来判断,更有用的办法看来是把注意力集中到预料将在市场社会主义中出现的一些最重要的特征上面。所谓市场社会主义投资决策的主要特征,是指投资决定的累积起来的趋势以及投资决定的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性是由利润和利润率决定的。

让我们从第一个特征开始分析,假定在一个特殊事件(如产品创新)的影响下,投资决定和(经过一个时滞后)投资支出都增加了。根据乘数原理,在利润和投资同步增加时,国民收入比投资增加得更快。如果利润刺激了投资,那么,可望作出进一步投资的决定,投资就趋向于累积性地增加。这一过程受到生产能力利用和生产能力规模这两者变化的影响。随着总产出的增长,生产能力和利用程度提高了,同时产生了使生产能力与总产出的扩大相适应所需要的投资新刺激。在这一发展的背后,存在着著名的加速原理。另一方面,投资及由此而来的生产能力的增长本身产生了与生产能力利用程度的提高相反的趋势。因此,生产能力及其利用程度的提高就以一种无

法预测的方式影响着投资累积趋势的速度,加快或减弱这一运动。

当然,上述的所有相互联系也可能在相反的方向上发生。如果投资决定和因此而来的投资支出减少了,那么,它们将趋于累积性地减少。而且,这一运动将受到生产能力及其利用程度变化的不可预测的影响。

我们要分析的投资过程的第二个特征即不稳定性与这样一种事实有关:累积性的运动一停止,就会开始投资的反向运动。假设生产能力及其利用程度变动的矛盾过程使投资的累积性增加在一个较高水平上(至少超过折旧水平)暂时停止了。因为投资不变,利润也就不变,但由于净投资是正的,所以资本存量仍然增加了。因此,利润率虽然较高,却开始下降,并引致投资下降。或者因为类似的原因,投资的累积性下降在一个较低水平上(低于折旧水平)暂时停止了。因为投资不变,利润也就不变,但由于净投资是负的,所以资本存量仍然减少。因此,利润率虽然较低,却开始了上升,并引致投资上升。

至此,我们只是解释了内部因素引起的累积性投资运动的暂时停止。但除此以外,一些外部因素无论如何都可以作为制动器起作用。例如,由于部门1中出现了生产能力的充分利用,或者由于投资的累积性扩大过程中迟早会出现其他一些瓶颈,投资就不可能进一步扩大。由于总投资不可能变成负数,所以,这同样适用于投资的累积性下降。如果投资运动因为外在因素在较高或较低水平上暂时停止了,那么,相反的运动就会由于同样的原因按照上述方式开始进行。换句话说,在假设的条件下,无论是在较高水平上,还是在较低水平上,投

资都不可能保持不变。

于是,我们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由对市场信号作出反应的企业所决定的投资可能会发生波动,利润也可能会发生波动。如果像前面假设的那样,在市场社会主义中,价格/成本比率保持不变(或是粘性的),那么,利润的波动就会传递给国民收入。由于国民收入的波动,就业也就发生波动。即使在繁荣时达到了充分就业,在商业循环的其他阶段也不可能维持下来;如果在繁荣时没有达到充分就业,情况就更是如此。因此,在受市场自发势力影响的市场社会主义中,从循环的平均状况看,失业是不可避免的。

应该再次强调指出,我们的结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企业行为假设。如果企业行为由于现实中预算约束硬度不足变得不一样,那么,企业的投资需求就不会只受到盈利能力考虑的限制,对不正当货币工资要求的抵制也会变得软弱无力。在这些条件下,资源就会被过度利用,短缺和通货膨胀压力(像在集中计划经济中通常看到的那样)就会不可避免。投资和工资总额的中央控制可能迟早会不得不重新出现,从而使市场社会主义观念本身完结。

另一方面,几乎任何一个市场制度都不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市场制度肯定不是,在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状态下运作的。所谓自由放任状态,是指对于市场协调暴露出来的从宏观经济和(或)社会角度来看是有害的一些现象、国家不进行任何旨在修正或减轻之的干预。这种干预和市场协调原则的兼容问题是经济学中最有争议的问题之一。既然宣称自己是凯恩斯—卡莱茨基经济动态分析法的遵循者,那么,我们的观点就是,在市场制度的框架内存在着国家干预的大量空间。



我们认为,不仅在市场完全失灵的情况下是这样(这说明了把一定类型的活动置于市场协调之外、形成我们所说的“非企业部门”是合理的),在市场协调应该占据统治地位的主要的经济活动领域(“企业部门”)也是如此。因此,这里所规定的市场社会主义不必是自由放任的市场制度,我们对那种由追求利润的企业的投资行为引起的波动所做的描述,应该以分析兼容于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国家政策的可能影响作补充。在本章的下一节,我们讨论通常的宏观经济政策,而在第4节中,我们将遇到最复杂、最有争议的长期增长和就业问题。

###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可能性和局限性**

货币将在市场社会主义中起重要作用。货币制度(像已经提到的那样)由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构成。中央银行的货币扮演最终支付手段(纸币)的角色,并由商业银行用作准备金的纸币所创造的存款货币做为补充。银行部门以外的纸币和存款货币总量通常被定义为货币量。这个定义有点模糊不清,例如,很容易地把某些储蓄形式包括在这个概念之内,而把其他的一些支付手段(汇票、信用卡创造的货币,等等)排除在外。

纸币和存款货币的供应将由中央银行来控制,三种最重要的控制手段大致包括(和在资本主义制度中一样):公开市场操作、最低准备金率、再贴现率。通过公开市场操作,中央银行买进或卖出证券,从而增加或减少商业银行系统中的纸币数量。于是,在最低准备金率已定时,商业银行就能扩大或减少整个经济中的贷款机会。在纸币数量已定时,中央银行能够

通过最低现金准备金的变动影响存款货币的数量。最后的但不是最不重要的手段是,通过再贴现率即中央银行作为最后的借出者准备出借给商业银行的利率的变化,中央银行影响利率。不过,利率也决定于公开市场操作;因为证券的市场价格和现期利率之间存在着反向关系,所以,公开市场操作就能直接影响利率。因此,中央银行也能通过控制货币数量影响利率。众所周知,在实践中,如果有必要的话,中央银行也利用非正式的信贷限额供应的办法。在市场社会主义中,没有理由把这种可能性排除在外。

习惯上把货币需求分为三类:交易需求、预防需求和投机需求。在国民收入的一个职能即支付惯例已定时,前两类需求在市场社会主义中肯定会继续存在。的确,因为企业的收入和支出不一定同步进行,不一定正好同时发生,企业(和家庭)将不得不保持交易的货币余额。与意外的交易机会有关的各种预防原因也使得要保持货币余额。至于投机性的货币需求,情况则不太清楚。不过,如果像许多改革建议所提出的那样存在二级证券市场,那么,各种理由都会说明也将产生投机性的货币需求。

让我们假设在市场社会主义中存在二级证券市场,并且允许企业在二级市场上购买和出售证券。我们把所有能支付固定利息的证券(政府债券、企业发行的信用债券,等等)都看成是债券,把它们的价格和现期利率的关系看成是反向的关系。如果企业自由决定是持有货币还是持有债券,那么,“流动偏好”理论对它也适用。假设利息率是这样的:债券持有者愿意出卖的债券的供给等于愿意购买者的需求,同时,所有其他企业都满足于自己的所有物。持有投机性货币余额的企业将

期望利率上升(即债券价格下跌),而持有债券的企业则期望利率下降(债券价格上升)。

如果由于某种原因,在投机性货币余额的总额和债券的总量保持不变时预期发生了变化,那么,在现期储蓄或投资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时,利率将会改变。让我们假定投机性余额的需求曲线移向右方,这意味着,在任一既定利率上,企业都愿意比过去拥有更多的投机性货币余额。在原来的利率不变时,现在的债券供给大于债券需求;债券价格将会下降,利率也因此上升。这一运动一直持续到市场在一个较高的利率上达到新的均衡为止。

因此,即使现期储蓄和投资总量没有发生任何变动,利率也会发生变动。另一方面,那种储蓄更多或投资更多的意愿可能不影响利率,即使有影响,这种影响通常也是微弱的。的确,来自新的储蓄者的债券需求或来自新的投资者的债券供给,都只不过代表整个债券市场的一小部分。如果一些企业打算储蓄和购买债券,债券价格就会上升,但只是轻微的上升。相关利率的轻微下降却可能足以带来对投机性货币余额需求的增加,从而吸收新储蓄。投资将增加很少(或者一点都没有增加)。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更多储蓄的意愿就不会得到实现。当国民收入减少时,如果储蓄率增加,投资总量将大致保持不变。在这种条件下,根据既定投资对国民收入和储蓄进行的调整,会按照“储蓄反论”(“savings paradox”)的规则进行。

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问题,我们之所以在这里重新叙述一遍,目的在于提醒自己,在市场社会主义中,要使储蓄等于投资,利率这一工具的作用可能不太有效。我们认为这种看法也适用于一般的货币政策。如果对投机性的货币余额需求的

利率弹性大,投资的利率弹性小,货币政策就不会很有效;这首先是因为货币数量的变化不会引起利率的足够变化;其次是因为继利率变化之后,投资不会发生足够变化。这在经济活动的低潮期特别明显;如果潜在投资者情绪悲观,那么,增加资产流动性和降低利率可能都不足以刺激经济活动。相反,在货币政策目标是对抗经济过热时,保持流动性不变和提高利率却可能相当成功。这种不对称性可能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

坚持凯恩斯—卡莱茨基分析方向的大部分经济学家倾向于把影响经济活动水平的可能性和财政政策工具联系起来。因此,我们必须观察政府收入和支出的作用,从而结束我们的概览。

假定存在来自工资税  $T_w$  和利润税  $T_p$  (包括社会保障支付减去转移支付) 的政府收入,也存在现期政府支出  $G$ 。政府支出和收入之间的差额  $(G - T_w - T_p)$  是预算赤字  $D$ 。因此,我们一方面有  $Y = W + T_w + P + T_p$ , 另一方面有  $Y = C + I + G$ , 在这里,  $P$  和  $W$  分别指税后利润和税后工资。根据以上等式,我们得到  $W + T_w + P + T_p = C + I + G$ , 设  $W = C$ , 就得到  $P = I + G - T_w - T_p$ 。因为  $G - T_w - T_p$  就是预算赤字  $D$ , 所以这一公式变成了  $P = I + D$ ; 企业利润(也就是储蓄)等于投资加预算赤字。因此,在企业投资总量已定的情况下,预算赤字越多,利润也将越多。如本章第 2 节所述,国民收入将随着利润的变动而变动。

如果政府支出按照与收入无关的正常速度进行,预算赤字的作用就将是反周期的。情况的确是这样,随着国民收入的增加,税收收入也会增加(在用于失业的转移支付下降时,情况更是如此),预算赤字因此将会减少。随着国民收入的减少,

情况将会相反。所以，利润虽然将会增加和减少，但并不像投资那样强烈，结果使得国民收入的波动不像投资的波动那样明显。预算赤字的这一影响要归结于依赖于收入的税收的存在，它像一个内在稳定器那样发挥作用。收入制度越是累进式的，内在稳定器的作用越大。

作为经济控制的手段，预算的作用并不仅仅限于赤字开支。甚至在预算平衡时，如果政府支出的增加能够通过利润税的相应增加来融资，国民收入也会被刺激增长，在这一条件下，价格/成本比率（意指税前利润和工资的固定关系式）保持不变。用  $P_B$  表示税前利润，我们就有：

$$P_B = P + T_p = I + G - T_w$$

现在，如果政府支出增加了  $dG$ ，利润税增加了  $dT_p = dG$ ，则可得：

$$dP_B = dP + dT_p = dI - dG - dT_w$$

如果进一步假定  $dI = dT_w = 0$ ，则有：

$$dP_B = dP + dT_p = dG$$

因为已假定等式  $dT_p = dG$  存在，所以有  $dP = 0$  和  $dP_B = dG$ 。这意味着税前利润的增加量等于政府开支的增加量，增加的利润税使税后利润保持不变。现在（如已假设的那样），如果价格/成本比率保持不变，工人消费就会和税前利润、也就是和政府支出一同增加。的确，由于  $dP = dT_w = 0$ ， $dT_p = dG$ ， $dW = dC$ ，所以有  $dY = dW + dP + dT_w + dT_p$  和  $dY = dT_p + dW$  或  $dY = dG + dC$ 。<sup>⑧</sup>

以上的结论依存于两个假设条件。第一个暗含的假设是，投资不会因利润税的增加受到损害。这一假设的事实基础是，一个既定时期的投资支出是前一时期投资决策的结果；因此，

在当前时期内,投资支出保持在既定水平上,并产生了未因利润税的增加而受到损害的税后利润。因此,如果企业在税收增加后不紧接着改变自己的投资决策,那么,也就不存在什么刺激使得企业在将来会改变。但是相反,如果税后利率保持不变,利率就必须提高。这将导致新的投资项目在纳税和支付利息后的盈利能力下降,并且当然对投资偏好产生消极影响,除非其他一些因素(如生产能力利用程度提高)具有足够的抵消作用。第二,我们曾经假定,增加的税收没有通过价格/成本比率的上升传递给价格。如果发生了传递,实际工资和来自工资的消费都会受到损害,涉及到国民收入总量的结果就会变得不明确。由于这些原因,通过利润附加税为政府额外开支融资的做法虽然相当有效,却不是没有一定风险的。

应该提到的是,政府开支的增加通过工资税增加来融资可能使国民收入保持不变,因为政府支出的增加可能被工人消费的等量减少抵消了。

总的结论是,在市场社会主义中,财政政策和(在较小的程度上)货币政策将能够减轻周期波动和失业。如果预算在萧条时出现赤字,在繁荣时出现结余,但在商业循环过后保持平衡,那就不会出现长期公共债务问题。即使情况并非如此,在整个周期过后有预算赤字,但假如债务总量和国民收入的联系不持续加强,那么,债务就不会引起特别的困难。在这种条件下,有可能成为问题的是为支付公债利息的筹款所必要的税收的增加;这类税收的增加受到抵制之事经常发生。这也有一些再分配的含义,因为它意味着用增加税收收集到的一部分收入给了公债利息的接受人了。除此之外,在前面提到的条件下公共债务将不会给后代添加额外负担了。

在商业周期过后预算保持平衡的情况下,不会产生额外的有效需求,但利润的波动减少了。由于利润将成为市场社会主义中影响投资决策的主要因素,在这些条件下,投资波动本身也很可能变得不太明显。完全可以期望,通过必要时辅以货币政策措施的成功反周期的财政政策的运用,完全可以取得优异的效果。

在现实中,情况可能会并且肯定会变得非常复杂。在一个周期中,国民收入增长率可能有变动。例如,如果国民收入增长率长期下降,公共债务增长率上升或甚至保持不变,那么,公共债务对国民收入的比率就会上升,公共债务的相对负担就会迅速增加。产生债务困难的另一个来源可能与利率的意外上升及其对公债支付的影响有关。很清楚,在市场社会主义中,所有这些问题都会发生,并导致极其复杂的局面。然而,我们的分析(尽管过于简化)已经表明,恰当的政策这一因素可以缓解总产出和就业的周期波动,而又不打乱市场社会主义的框架。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就国民收入的长期增长和就业而言,能否得出这种甚至只是尝试性的结论来。

## 市场社会主义中的充分就业计划

让我们回想一下前面的内容:市场社会主义(像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样)是一个需求决定的体制,具有典型的价格/成本比率的固定性(见本章第二节)。当我们越过纯粹的商业周期、转向增长过程的时候,这一固定性所产生的问题就变得特别地显而易见了。尽管投资增长水平和国民收入增长水平的

周期波动现象可能是市场社会主义中的一种正常情况,我们这一节中还是完全不考虑经济活动的波动现象。让我们假定,追随市场信号及因波动排除而来的投资的增长率不变,因此国民收入增长率也不变。考虑到资本主义经济的经验,可以预料,在有望存在较高利润和新市场时,各种形式的创新趋势越强,这种增长率越高。因此,在市场社会主义中,技术进步的加强在增长加速过程中仍然是一个重要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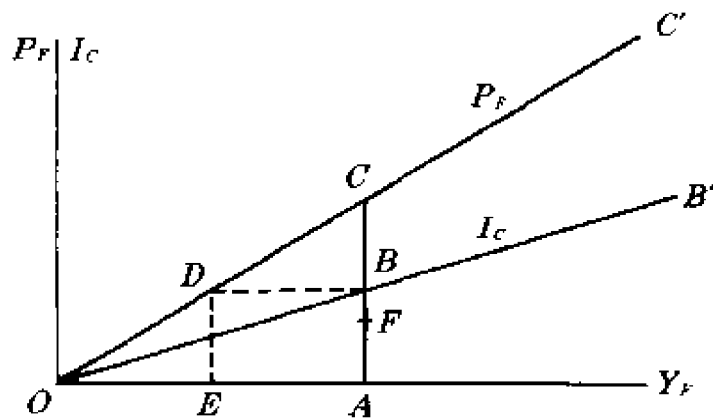
我们将假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m$  不变并由技术进步决定,资本/产出率在一定时期也保持不变。这种情况符合哈罗德和卡莱茨基定义的中性技术进步类型。<sup>10</sup> 还假设就业增长率  $n$  是一个常量。这样,国民收入增长率就是  $g = m + n$ , 它表示排除了国民收入周期波动的那种趋势。如果为了简单起见我们进一步假定,劳动力(假定参与率已知)也以速度  $n$  增长,那么,失业率(失业与劳动力之间的关系)就保持不变。在这种条件下,充分就业意味着失业率为零。我们希望在市场社会主义中找到一些条件,也能够达到并保持充分就业状态。

我们也假定,如果总需求充足,在时间  $t$  时就存在足够多的资本(存量) $K$ ,能够保证充分就业。我们假定,在充分就业水平上,现有生产能力的利用程度最优,其意义是,现有生产能力利用程度对适应于需求结构进行供给结构的灵活调整不会产生损害。现在,如果在时间  $t$  时总需求足够大,那么,就可以达到生产能力最优利用程度上的充分就业。在充分就业水平上,国民收入增长率将是  $g = m + n$ , 这是因为,一方面,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由技术进步决定,另一方面(假如劳动力增长率已定),就业增长率大于  $n$  时就引起劳动短缺,小于  $n$  时则产生失业。在这些条件下,要求维持充分就业水平上的生产能



力和国民收入之间恰当关系的投资总量,必须保证资本增长率等于  $g$ 。由于假定资本产出率不变,生产能力的增加速度也是  $g$ 。这样,由于国民收入和生产能力都以速度  $g$  增加,生产能力利用程度就保持不变。我们将把这种投资称为“调整生产能力的投资”,在时间  $t$  时表示为  $I_c = (g+a)K$ ,其中,  $a$  表示折旧参数。

在附图上,我们用斜线描出  $OB$ ,它对应于调整生产能力的投资在充分就业国民收入中的份额。设在时间  $t$  时,充分就业国民收入为  $Y_F = OA$ ,调整生产能力的投资为  $I_c = AB$ 。 $OB'$  的斜度对应于投资率  $I_c/Y_F$ ,这考虑到了资本的增长速度  $g$ 。随着时间的推移,充分就业水平上的国民收入就会沿着横坐标移向点  $A$  的右方,调整生产能力的投资则沿着  $OB'$  线移向点  $B$  的右方。



现在,我们在图上描出斜线  $OC'$ ,它对应于国民收入中的利润份额(即储蓄)。我们用  $P_F$  表示充分就业水平上的利润(储蓄)。在时间  $t$  时,由于国民收入  $Y_F = OA$ ,所以,充分就业储蓄就为  $P_F = AC$ ,在国民收入中的储蓄份额则为  $S = (AC/$

OA)。这一份额是由现有的价格成本比率决定的(假定储蓄倾向已定)。

假定在我们考虑的市场社会主义中存在某种程度上保持不变的失业率。从图上看,这可以表示为在时间  $t$  时实际投资为线段  $AB$  这一状态;也假定这一投资随着时间的变动以  $g$  的速度增长。因此,资本和生产能力的增长速度也是  $g$ 。但假如  $OC'$  线斜率表示的  $S$  已知,在时间  $t$  时的国民收入就是  $Y = OE$ 。的确,在投资为  $AB$  储蓄为  $ED$  时,国民收入就处于其充分就业水平以下。如果现在投资像假设的那样以  $g$  的速度增长,国民收入也会以  $g$  的速度增长。不过,这仍然以一个不变的比例低于充分就业时的国民收入。在这些条件下,生产能力利用程度虽然不变,却比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要低。在市场社会主义中,充分就业必须属于政府的主要经济政策目标。那么,在面临图中描绘的这种情况时,中央计划委员会,这个在市场社会主义中负责战略性经济决策协调的机构,打算做什么呢?在图中,存在着通货紧缩缺口  $BC$ ;换言之,在经济中总需求是不足的。在这些条件下,中央计划委员会能够把企业部门的投资决策刺激到  $AC$  水平,从而以额外投资弥补通货紧缩缺口吗?让我们假定这不成问题,中央计划委员会运用的刺激手段是降低利率。如果投资有利率弹性,那么,降低利率就能使投资增加到  $AC$  的水平。这样,就能达到充分就业,但因为  $AC > AB$ ,也就是说投资高于其调整生产能力的水平,所以,资本和生产能力的增加率就大于  $g$ 。这就引起生产能力利用程度的降低,并且反过来导致了利润率的下降。的确,在资本存量以高于  $g$  的速度增长时,国民收入和(假定价格/成本比率已定)利润只是以  $g$  的速度增加。因此,为了维持初始的

刺激,就必须不断地降低利率,从而使支付利息后的盈利能力保持在同一水平上。利润率和利率之间的差额则是风险报酬,而且,如果期望企业部门沿着  $CC'$  线投资,就必须使这一差额保持不变。<sup>①</sup>

当然,如果投资继续以  $g$  的速度增长,资本存量和生产能力迟早也会适应这一增长速度。从适应那一时刻起,生产能力和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将达到  $g$ ,生产能力的利用程度将保持不变,尽管这种利用的程度低于最优水平。这一较低的生产能力利用水平将产生较低的利润率。因此,利率的下降就会停止,却是在一个相对的低水平上,作为对利润率降低的必要补偿。生产能力利用水平较低和利润率较低表明,做出的投资已经过多了。投资的目的在于保证充分就业(所谓“收入效应”),而在于形成生产能力(所谓“生产能力效应”)。有人可能会说,为了保证充分就业,无用的投资支出也比支出不足要好。但是,对必要生产能力的合理支出显然更合人意。

上面提供的理论案例(我们希望它足够清楚),目的在于说明在市场社会主义中,中央计划委员会所面临的一个一般问题:既定的国民收入分配(价格/成本比率)和国民收入最终使用之间的冲突的可能性。这种最终使用是保证最优生产能力利用和充分就业需要的。调整生产能力的投资(图中的  $AB$ ),就是一个经济为了使生产能力保持在恰当的、也就是可以被恰当利用的水平上所需要的投资。但在同时,使劳动保持在充分就业水平( $AC > AB$ )所需的投资也可以找到储蓄(利润)。因此,如果投资为  $AB$ ,失业就会不可避免,而如果投资为  $AC$ ,部分生产能力就会处于闲置状态,部分投资因此就会被浪费掉。在这种条件下,中央计划委员会可以尝试把国民收

入分配的一个灵活性因素(价格/成本比率)重新引入市场社会主义。但是,我们在第二节讨论这一问题时已经指出,这种灵活属于集权的社会主义经济,在那里,一定的权威机关确定与货币工资有关的投资和价格,也就是确定成本。在不破坏市场社会主义基础的条件下,怎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呢?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

沿着卡莱茨基的思想线索也许能找出一个解决办法,他主张,制定一个一般的资本付费标准,对企业拥有的每种资产都征收费用,不管资产的流动程度如何——不管是投资于新的生产能力、作为债券持有,还是存入银行账户。<sup>④</sup>据认为,这种类型的收费方式(不依存于用盈利水平表示的企业实际绩效)是可以和市场制度兼容的。下面就让我们研究一下它在市场社会主义下是怎样运作的,对维持长期充分就业又有什么样的作用。

资本收费构成中央计划委员会的一项收入,中央计划委员会将有权根据自己对宏观经济的考虑来自由地使用它。中央计划委员会最优先考虑的事可能是达到并保持充分就业,但也可能是别的任务。另外,资本付费水平将留给中央计划委员会斟酌决定。举例说来,也许值得指出的是,在资本/产出率每年为3时,只有2%的资本收费就可能使6%的国民收入归中央计划委员会自由支配。

资本费用可以用于两个主要目的:其一是向作为国有企业最终所有者的全体社会成员支付社会红利;其二是为企业部门本身不能(或不能恰当地)融资的项目筹集资本。在“非企业”部门中的投资属于广义的基础设施。这首先适用于真正的基础设施的投资(与共用品的生产有关),也适用于具有明显

外部效应的领域,其中,个人的和短期的盈利能力对引导效率明显不利。(在这里,与区域政策和新兴产业有关的投资可以作为一个例证。)不过,应该强调的是,如果要保持市场社会主义的真正含义的话,中央计划委员会的直接投资就必须仍然是一个有充分理由的例外,而不是常例。

假定由价格/成本比率决定的利润和工资之间的分配已定,那么,通过资本收费的收集和分割为上述两类支出,中央计划委员会就掌握了一个影响国民收入最终使用的重要工具,而并不威胁到企业的主权。举例来说,如果中央计划委员会面临着图中描述的情景,如果资本费用确定在等于线段  $AC$  的水平,同时企业投资恰好达到  $AF$  的水平,那么,国家通过把全部的资本收费用于社会红利支付(等于线段  $BC$ ),或用于非企业部门的投资(等于线段  $FB$ ),就能够很自然地保证充分就业。如果企业的投资大于  $AF$ ,中央计划委员会就会削减自己来自资本收费的支出,以使总需求适应于充分就业时的国民收入。因为资本收费已定,所以,这意味着部分收费将被储蓄下来,并通过这一形式为企业部门的过渡投资提供资金。

反之,如果企业的投资小于  $AF$ ,中央计划委员会的支出就会扩展到线段  $FC$  以上;因为资本收费已定,所以,这意味着中央计划委员会暂时变成一个净借款人。不过,可以证明,在企业部门的理想投资水平和实际投资水平之间不一致的两种情形的任一情形中,只调整资本费用的支出结构实质上是不足的,必须运用货币政策(提高或降低利率),运用刺激或阻碍投资的财政因素;在极端的情况下,甚至可能采取诸如投资许可证之类的措施。

资本收费标准的变化可以作为鼓励企业投资活动的一个重要工具。让我们暂且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在国家预算平衡时,利润(税后) $P=I+E$ ,其中, $E$ 表示中央计划委员会对社会红利和(或)国家投资的支出。如果假定(与过去一样)不存在来自个人家庭的储蓄,利润现在当然就由企业投资和中央计划委员会的支出这两者决定。如果对企业部门的资本收费为 $E$ ,资本收费后的利润(也就是企业的储蓄)就等于 $I$ 。假定企业部门的投资保持不变,那么,在中央计划委员会增加了 $dE$ 的资本收费及相应数量的支出时,利润就增加了 $dP=dE$ 。因为投资支出和决策之间存在时滞,所以,资本收费增加后紧接着出现的就是这种企业部门投资不变时的情形。但是,由于资本收费的增加没有降低用自有资金或借入资金进行的投资的盈利能力,所以,这一增加甚至对现期投资决策都不会产生消极影响。资本收费的原则(对所有资产都收费,而不论其流动程度如何)意味着企业即使不投资也要交纳费用。如果企业通过信贷筹集投资资金,它的自有资本没有增加,那么,投资决策就不会引起较高的收费。而且,因为利润(包括资本收费)增加了 $dP$ ,用 $P$ 衡量的投资盈利能力也增加了,所以,企业对未来盈利能力的预期转好,就会有一个较高的投资倾向。因利润(包括资本收费)增加引起的国民收入的增加 $dY$ (和消费增加 $dC$ )也在同一方向起作用,并导致了较高的生产能力利用程度。因此,资本收费的增加看来可以证明是一个刺激企业投资活动的很有希望的工具。<sup>19</sup>

一般说来,中央计划委员会应该把资本收费确定在一个在长时期内能使支出和收入达到平衡的水平上。但是,通过把资本收费的支出的结余或赤字作为间接的收入政策工具来使

用,中央计划委员会也可以偏离这一常规。例如,如果把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目前的份额看成是恰当的,但价格/成本比率的移动又趋向于改变这一份额,那么,就可以把使资本收费的支出出现结余或赤字的机制作为一个抵消因素来发挥作用。因此,如果价格/成本比率上升(国民收入中的利润份额增加),社会红利就会增加,借以支撑消费,保证充分就业。在资本收费标准已定时,中央计划委员会就成了一个净借款人。这实质上还是没有解决收支平衡问题,但能给中央计划委员会提供一个喘息的机会,以制定旨在降低价格/成本比率的政策(例如,支持工会要求较高工资的压力,或者在极端的条件下实行某种形式的价格控制)。如果因为货币工资增长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在价格已定时),价格/成本比率将要下降,那么,就会削减社会红利,以抵消通货膨胀的压力。因为资本收费的水平已定,中央计划委员会现在就变成了一个净储蓄者。在这里,同样需要采取其他一些措施,从而把价格/成本比率提高到一个令人满意的水平。

不用说,上面描述的机制只是在相当短期(或中期)现象的有限范围内才带来一些结果。如果价格/成本比率呈现一个长期的增长趋势,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资本收费也必须增加,从而用社会分红的较快增加弥补货币工资的过于缓慢的增长。相反,在价格/成本比率呈现长期下降的趋势的情况下,资本收费必须相应减少。不过,如果后一趋势无限地持续下去,资本收费最终就会完全消失,从而使中央计划委员会连自己的投资资金都不能再筹集出来。这样,使得市场社会主义体制有效的条件就可能是一个长期的收入政策,它保证在充分就业的水平上,使国民收入中的利润份额大于调整生产能

力的利润份额。另外,价格/成本比率的长期下降趋势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企业没能抵制住劳动者的货币工资要求,企业的预算约束不是真正硬的。

## 结论

我们分析的结论是,在市场社会主义中,一个保证长期充分就业的有效的政策,是有可能存在的。同时,这一分析也表明了这一答案必须具有怎样的限制条件(我们希望足够清晰)。首先,甚至在非常简化的假设下,中央计划委员会在追求长期充分就业的过程中也不能单纯地依赖于非企业部门和间接影响企业部门(把资本收费作为影响的主要手段),而要常常考虑到需要直接的行动(投资许可证,价格控制,收入政策)。顺便说一下,这就给中央计划委员会这一市场社会主义中的战略经济决策的协调机关的传统名称添加了实质性的内容:它的活动和时间跨度可以证明“计划的”这一形容词是有道理的,尽管其含义和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的有关含义具有实质上的差异。

其次,我们对简化了的假设的每一步放松都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充满问题的领域,产生了极其(许多人会说,引人注目的)复杂的状态。例如,我们一直假设用于规定调整生产能力的投资水平的增长率是既定的。而实际上这一速度是经常变动的,特别是在短期内,但有时在长期内也是如此。从中短期、甚至(根据技术进步类型)从长期来看,这种不稳定性可能来自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变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则受到资



本/产出率(或设备的生命周期,或两者)变动的影晌。这些变动可能相当复杂,例如加速增长之后接着出现减速,或者相反。即使资本/产出率或设备的生命周期没有变动,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也可能因为技术进步的加强变动的不可预测性而发生变动。另一个基本的增长因素(劳动力的增长)也不能看成是稳定的。人口增长率是波动着的,而且,即使这些变动都忽略不计,参与率和(或)工作间长度也都可能发生变动,等等。如果同现有劳动力相比,在资本稀缺的条件下,而不是在总需求不足时,完成了达到充分就业的任务,一个另一类的重要问题也会出现。所有已提到的因素都会对调整生产能力的投资份额产生很有意义的影响,而在分析中我们一直假定这种投资份额是一成不变的。即使不用进一步深入研究也能完全清楚,中央计划委员会在正确地纠正自己的计算和恰当地调整自己的政策时,将面临许多的问题。如果我们从贯穿分析始终的封闭经济转向开放经济的话,问题就不可能轻易地得到调和解决,而要提高到一个不同的困难数量级:不仅预测变得非常复杂,中央计划委员会的行动自由也将受到严重的限制。

对于那些把市场社会主义看成是解脱“现实的社会主义”痛苦的一种方法的人士,我们的回答显然将是指出上述困难。这些困难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市场社会主义中那种把微观效率与保证长期充分就业的宏观稳定结合起来这个令人望而生畏的要求。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在制定这种经济政策目标时可能会遇到类似的、甚至更大的阻碍,这是因为,举例说来,在私人市场经济中采取资本收费办法存在着政治障碍。事实就是如此。但是,在至今为止所讨论的情形里,我们在本章

忽略了市场社会主义本身的一个沉重的包袱：我们假定，企业（厂商）尽管是公有的（国有的），但其行为与其资本主义的同行们完全一模一样，显示出具有同等水平的微观经济效率，同样机警灵活地对待技术进步和体制参数变动所提供的机会。在得出任何进一步的结论之前，我们必须对这一假设检验一番。

### 注 释

- ① 商业银行的缺乏可能一直是债券发行比较成功的真正根源，债券至少能给储蓄者和借款者提供一定的灵活性；另一方面，股票市场的大门封闭也在同一方向上起作用。这可能有助于解释企业发行的固定利息债券为什么受到相对说来非同寻常的欢迎。
- ② 这一问题在匈牙利第一次提出来是和蒂伯·里斯卡的一篇文章有联系的，见 Tibor Liska, 'Kritik es koncepcio; tazisek a gazdasagi reformiahoz (Critique and Conception; Theses for a Reform of the Economic Mechanism)', *közgazdasági Szemle*, no. 9(1963)。由于人们广泛承认股份公司作为国有企业的可能组织型式具有重要意义，所以里斯卡的思想在沉寂了一个很长的时期之后，于 80 年代又重现了。不过应该强调的是，里斯卡的“企业家社会主义”不能看成是股票市场；这是一个不同的概念（见本书第 10 章注④）。波兰关于这一问题的出版物，典型的有 Maciej Iwanek and Marcin Świecicki, 'Handlowac kapitałem' ('Trading in capital'), *Polityka*, no. 24(1987), and 'Socialist Joint-Stock Company; the Missing Link in Economic Reform', presented at the workshop on Financial Reform in Socialist Economies, 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 Florence, 12-16 October 1987; Jacek A. Likowski, 'Droga

przez giełde' ('The way leads through the stock exchange') Supplement to *Polityka*, no. 22(1987)。对于市场机制及其对波兰的意义所进行的理论方面的综合分析,特别是关于资本市场的综合分析,则见于 Asam Lipowski, *Mechanizm rynkowy w gospodarce polskiej (The Market Mechanism in the Polish Economy)* (Państwowe Wydawnictwo Naukowe, Warszawa, 1988)。在南斯拉夫,股票问题的讨论者则是 Milica Uvalić, *Shareholding in Yugoslav Theory and Practice*, EUI Working Paper no. 88/330, 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 Florence。对这一讨论的一篇述评和一篇稿件可见于 Domenico Mario Nuti, *Financial Innovation under Market Socialism*, EUI Working Paper no. 87/285, 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 Florence。

- ③ Michal Kalecki, *Selected Essays on the Dynamics of the Capitalist Economy 1933 - 197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71) 43 - 4. 也可参见 Michio Morishima, *The Economics of Industrial Socie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84), 25 - 37.
- ④ Amit Bhaduri, *Macroeconomics: The Dynamics of Commodity Production* (Macmillan, London, 1986), 36 - 54.
- ⑤ Kalecki, *Selected Essays*, 62 - 3.
- ⑥ 可能需要提到的是,在社会主义经济中,预期价格灵活性只在一个方向起作用。如果投资必须增加(与国民收入有关),所必需的价格/成本比率的增加通常也不会实现,因为国家会极力避免实施自己直接负责的不受欢迎的措施。结果,隐蔽性价格上涨和抑制性通货膨胀与公开价格变化相比,常常被给予优先地位。因此,在集中计划经济中,在价格/成本比率不得不提高时,隐蔽性价格上涨和抑制性通货膨胀成了“价格灵活性”表现的具体形式。
- ⑦ Kornai, *Contradictions and Dilemmas*, 45.

- 
- ⑧ Maurice Dobb, *On Economic Theory and Socialism* (Routledge & Kegan Paul, London, 1955), 41-5.
- ⑨ Kalecki, *Selected Essays*, 38-41.
- ⑩ 参见 K. Laski, *The Rate of Growth and the Rate of Interest in the Socialist Economy* (Springer, Vienna, New York, 1972), 88-90.
- ⑪ Michal Kalecki, 'Full Employment by Stimulating Private Investment?', *Oxford Economic Papers* no. 7, March 1945, 85-7.
- ⑫ Kalecki, *Selected Essays*, 41-2.
- ⑬ 在投资大于  $AB$  的情况下也可以尝试运用这一工具。资本收费的减少加上来自这方面的支出的减少就会减少利润, 并且对投资倾向产生消极影响。不过, 减少中央计划委员会的支出应该考虑到降低中央计划委员会在国民收入中的支出份额的意义。

# 10

## 所有制问题

在对构成第9章分析基础的假设进行检验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简单地把要回答的问题表述如下:市场社会主义(要求有完全独立的企业和真正的企业家身份)和生产资料公有制(国有制)是兼容的吗?

从事后诸葛亮的有利地位出发(with the benefit of hindsight),事情变得很清楚,所有制的问题老早就应当提出来了,也就是说,在“含有受管制的市场的集中计划”模式纳入讨论的日程时,就应该提出来了。就连所谓的现期或基准经济决策权从中央向企业的下放,也能使企业拥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权,因此就应提出这一自主权是否能够以及如何能与企业国有这一不变地位相协调的问题。本书作者之一在70年代早期讨论所有制问题时,却把注意力集中在通过政治体制民主化实现所设想的国有制度的社会化方面,认为这一过程也能提高国家投资决策的效率,并因此为把投资决策权保持在中央一级提供了理论基础。<sup>①</sup>

尽管对市场社会主义而言政治因素仍然重要,我们分析的主要中心还是转向兼容性

问题：国有企业具有完全的市场行为吗？我们在本章中就研究这一问题，但并不打算讨论所有制理论的一般性问题。我们的兴趣限于那些和市场社会主义的运作条件直接有关的方面，甚至在这种界限内，我们也要省略掉一些领域，例如正在出现的跨国所有制形式（合资企业）。

我们分析的起点是苏联式的“传统的”国有企业，所有“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在1945年以后实际上也未加变动地照样建立了这种企业。如果沿用霍尔索夫斯基的说法，<sup>⑥</sup>实质性的所有权(substantive ownership rights)或所有制的实际内容(the practical content of ownership)被定义为包括监护权、用益权、转让权、毁坏权，那么就可以说，在命令体制中，“传统的”国有企业不享有其中的任何一项权利；一切权利都毫不含糊地归属于国家行政机关（在这里我们不考虑国家行政当局同政治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因此，向市场社会主义转轨的变化首先就必须意味着国家行政机关放弃这些权利的大部分，把它们交给企业；其次，企业必须有能力运用这些权利。我们将依次讨论这两个问题。

乍看起来，从人们熟悉的所有权和控制相分离(the divorce between ownership and control)的角度讨论第一个问题(所有权是怎样从国家行政机关向国有企业转移的)似乎方便些。但一般说来，“控制”实际上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当它变得更具体，包含在监护权(决定如何利用资产的权利，也就是经营权)之内时，根据上面沿用的定义，它就涵盖了一部分所有权。而且，在对私有制和公有制进行比较的大量争论中，两个主要的理论阵营在所有权和控制的分离是不可行的这一点上持同一个观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说的核心命题是，所有

者最终控制，<sup>33</sup>对这一命题提出质疑的任何尝试都总是遭到马克思主义者的极力驳斥；这里的思想根源可能是认为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的基础是不可动摇的。与此对应，私人自由市场经济的理论家们同样断然认为，控制不能从所有权中分离出来；因此，私有制作为市场的基础是不可动摇的。对于“产权学派”的主要人物来说，甚至公司经理人员（更不用说企业家了）对于股东控制的任何程度的独立都等于是对所有权的实质性的削弱。<sup>34</sup>

我们在讨论中可能避不开“控制”这一方便的包罗一切的词汇，但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将尽量使它更明确些，特别是把与我们所讨论的问题有关的最重要的（或者是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区别即所有制、经理人员和企业家身份（entrepreneurship）之间的区别考虑在内。

命令体制使所有制、经理人员和企业家身份产生了特殊的结合（有人可能对企业家身份这一称呼提出疑问，因为它在原则上不适用于命令经济）。国家行政机关通过规定企业活动的因素来管理企业资产的使用（监护权）；国家预算可以挪用剩余收益（用益权）；没有国家行政机关的明确指示（或至少是同意），企业不得向其他任何单位出售或转让企业资产的任何一部分（转让权）；即使企业被授予毁坏权，它也要极其小心地控制资产的毁坏，不然的话，就明显被认为是一种严重的犯罪行为。不用说，所有这些权利把企业的进入和退出，即企业的建立和倒闭完全涵盖在内了。所有制、经理人员和企业家身份的这一特殊的结合可能并且实际上已经被那些违背规定的行动（我们在这里所指的不是为侵占国家利益即改变所有权而进行的活动，而是为了有利于这一制度而进行的偏离规

定的活动)破坏了。

“含有受管制的市场的集中计划”的改革思想,包括匈牙利新经济机制的最初方案在内,已经在某种程度上破坏了这种结合。人们要求国家把它的一部分监护权从行政机关转移给经理阶层——不管这种监护权的结构如何(组织形式问题将放到本章后面加以研究)。不过,除南斯拉夫外,国有制在其他方面的原有地位和范围几乎没有受到挑战。而且,人们还做了大量的努力来说明国有部门的改革并没有引起所有权的任何变化。除此之外,在一个稍微不同但与此有关的意义上,苏联杰出的经济学家 V. V. 诺沃日洛夫阐述了这种观点。他认为,改革的利害攸关的问题不是放弃集中控制,而是用间接集中化取代直接集中化,这种间接集中化更灵活、更有利于效率的提高,同时范围也更广。<sup>①</sup>这种观点的提出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策略性的考虑。不过,一个基本的因素也不应该被忽略掉;国家行政机关虽然放弃了对企业生产能力利用的细节的控制,但“参数管理”这种金融手段仍然保证了生产能力利用的结果同中央计划规定在总体上的一致性;人们认为,这些规定也是用来反映中央对经济的实物结构的偏好的,尽管较之在命令体制下的计划规定总体上使用了更加明确的语言。国家行政机构在投资决策中、特别是在决定新企业建立的投资决策中的支配作用,构成“受管制的市场”这一工具性手段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反映出国家所有权的行使方式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

市场社会主义恰恰要求有这种基本的变化。整个监护权都必须属于企业自身。不仅现期问题由企业决定,与投资活动有关的所有复杂问题,包括(可能是最重要的)价值增值在工



资和利润之间的分配问题和投资在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之间的选择问题,也要由企业决定。转让权也必须给予企业;无可辩驳的是,企业可以变更资产的形式(例如,出售部分生产能力,用货币形式持有卖得金额),而且,如果证明商业考虑,特别是长期的商业考虑是合理的话,那也就难以说明为什么要阻止企业牺牲自己资产的部分净值。进一步说,在竞争的条件下,资本价值的变化是企业兴起和衰落过程的一个因素;因此,在南斯拉夫,对于这种有正式约束力的规则的仿效,即向自治实体提供一个既定部分的“社会资本”的监护权,但以维护这部分资本的初始价值为条件,看来是行不通的。就受益权而言,它只能被分享;用最简单的话来说,(税后)利润给企业,资本(和土地、自然资源等等)的固定收益归国家。企业的初始资本和积累的自有资本(见第9章)都要向国家支付一个最低的资本收益额,这就使国家对资产价值的增加感兴趣;企业增加资产价值的刺激则来自盈利能力。

我们提供的图像虽然过于简化,但足以使人明确地认识到我们的市场社会主义的要求是多么的矛盾。一方面,企业的地位实质上不同于“受管制的市场”体制下的企业地位,更不用说命令体制下的了;对企业独立程度的规定等于使企业得到了大部分所有权。另一方面,企业仍然是国家所有,从而意味着国家保留着委托人的地位,保持着控制企业的最终的权力;企业经理人员则仍然处于代表委托人利益的代理人的地位,因而仍然处于从属地位。极而言之,这里存在着无法解决的冲突:企业的完全独立与国有制或者任何有关的其他外部所有制都是不相容的。因此,在市场社会主义中唯一值得考虑的就是前面描述的股份所有权这一折衷解决方案的可行性

问题。

这一解决方案的核心是,除资产收益和资产增加外,国家放弃在企业活动中的任何利益和参与。这反过来预先假定了,迄今为止一直由社会主义国家充当的一些角色,相互之间要坚决分离开来,这些角色之间的相互联系是如此紧密,以致一直被认为是不可分割的。这包括:国家作为所有者的角色应与作为负责行政、国防、政治秩序的国家,以及有法律授权征收税收和关税的权威当局的国家分离开来;其次应与作为制订工商业、保健、安全以及其他的标准的规制机构的国家分离开来;第三,应与作为例行的和特殊的(第9章)宏观经济政策中心的国家分离开来;第四,应与作为社会和基础设施的政策机关的国家分离开来,作为社会和基础设施的政策机关,国家不能用一般的盈亏含义来界定处理的目标和达到目标的手段(共用品、外部性)。最后,(国有)企业部门必须和非企业部门分离开来,让非企业部门起作用的前提条件是,在这个领域中,用其他办法也无法避免的政府失灵一般地比市场失灵为害小些。

这是一个难以满足的、在任何条件下都令人气馁的要求清单。另外应当指出,我们不准备进入对全部复杂问题的讨论,就“现实的社会主义”向市场社会主义的转轨而言,这种分离产生了大量的政治问题。经济必须非政治化,也就是说,必须摆脱委派和免职的苏联式任命制度(*nomenklatura*);同时必须消除无视法律治理的现象,法律应对个人和国家具有同等约束力,在实行法治的条件下,国家只是作为订立合约双方中的一方,是一个税收权威机关和经济政策的制定者。而且,经济的非政治化必须伴有政治的民主化。因为不存在其他能

起作用的担保物来维持经济的非政治化,特别是维持对于市场机制的正常运作所必不可少的真正法治(rechtsstaat)。在市场社会主义中,那种宣称自己有权作为社会利益化身而独断专行的全能国家概念,必须让位于这样一种概念,这就是,国家作为经济主体之一发挥的经济作用和其他经济主体一样,必须遵循规则。而且,作为权威机关,国家的责任在于维持市场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经济活动权利,并防止这些权利被滥用。

现在,我们回到企业部门中来,在市场社会主义中,必须存在另一个至关重要的分离:国有企业(不管它的集聚规模有多大,我们都用这一命名)不仅必须与具有更广泛作用的国家分离开来,它们相互之间也必须分离开来。企业必须作为单独的实体来运转,这并不像在命令体制或“受管制的”市场体制中那样,由中央直接根据一些总的偏好函数作出投资决策,规定企业的活动范围,企业作为单独的实体,仅仅是由于核算上和组织上的原因;这里还有纯粹的经济原因。它们之间的关系必须是竞争性的——根据具体条件决定是对手还是联盟,合并还是接管;所有这一切,都根据它们各自的不同利益来决定。对国有制这一概念来说,这就提出了一个新的、很少被人提及的有关国有制概念本身的问题:国有制分解为诸多部分的组合体,每个部分都代表自身的利益。这一状况不同于大型私人企业的状况。在大型私人企业中,可以根据各事业部对总结果的贡献来评价每一个个别部门,在国有制中,如果根据总的衡量尺度支付报酬的话,各个个别部门所得之间就会发生交叉补贴,如此等等。产生区别的原因,在于国有企业总量在整个经济(企业部门)中的权重不同;甚至在寡头垄断竞争的

条件下,一个大型企业也仍然在市场环境下运转,而不会破坏游戏的主要规则,而在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下,根据全部国有资产的盈利能力这一衡量尺度采取的协同行动,会在实际上破坏市场,把命令体制从后门放进来。因此,不管听起来多么的自相矛盾,除非国有企业在企业部门中的份额变得足够小,否则,市场社会主义下的国有经济的组成单位必须享有较之私人企业的事业部更大的自主权。这从而也说明了,西方学者如此津津乐道的“苏联公司”(或有关任一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的类似说法)这一名称不仅在命令体制的情况下是错误的,在市场社会主义的情况下也是错误的,尽管后者是为了别的原因。为了达到市场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计划地实现对自己的财产的分解。

这一切不用说都大大背离了“直接社会劳动”这种最初社会主义思想。这种思想着重强调结合和协作,反对分离和竞争(见第1章)。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制被称为“全民所有制”,这种说法可能一直广泛地用于宣传目的,但也反映了这样一种基本思想,即公有制的客体不可分割,<sup>36</sup>至少在一国的范围内不可分割(国家边界预期消失的含义从来没有真正纳入到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的思想中去)。公有制的不可分割性为下列说法提供了基础,这种说法宣称社会主义具有更加优越合理的性质,同时也宣称国有制优越于任何一种包含产权分割的非私有制:集体所有制(合作制)、乃至属于国家机关的但属于地方一级、因此也含有产权分割因素的所有制(地方所有制)。值得指出的是,随着改革过程中要求国有企业独立的压力的增加,人们对地方所有制和合作制的态度也变得比较好了。它们已逐渐地得到认可,被认为不仅是小土地所有者(特

别是像列宁在“合作社计划”中描述的农民)借以到达公有制终点的桥梁,也是社会主义经济中一个合法的、长期存在的成分。

这样,市场社会主义的折衷解决办法要求作为所有者的国家同作为权威机关、管理机构以及非企业部门的管理者的国家分离开来,也要求各个国有企业相互分离开来。这种分离尚无先例,因此,谨慎的说法是,要达到这一点可能比较困难。但即使假定达到了这一点,在涉及到企业的财务绩效问题时,特别是在涉及到实际绩效和潜在绩效的关系问题时,作为所有者的国家必须有权行使对企业的控制权。如果否决了这项权利,那么,国家所有制就几乎剩不下什么东西了;企业将处于拥有全部(但不明确的)所有权的地位,唯一的义务是交纳资产费用。

当然,我们不能把国家与企业的分离理解为在任何条件下都禁止国家进行直接干预。实践总是比模型更丰富。企业部门内的一些情况可能表明,政府干预是不可或缺的。不过,我们这里考虑的是规则,而不是一些不可避免的偏离。

我们现在转向第二个问题,即,在上述分离要求都得到满足的条件下,国有企业作为完全的市场参与者运转的可行性。首先考虑这样一个企业,它拥有大部分所有权,因此具有必要的独立程度,但仍由国家进行最终控制。能说这样一个企业在与私人企业相同的预算约束和企业家身份的条件下运转吗?

根据过去的经验,答案看来显然是否定的。但是,因为国有企业实际上从来没有实现市场社会主义为自己所规定的权能。所以,还不能把这种经历看成是充分的经验证据。另外,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在那些其经济改革已经取得进展的

国家里,最充分地利用了修正了的体制的不是国有企业,而是私人企业和合作企业。但这一事实实质上也没有提供决定性的证据,因为后者被给予了行动自由,前者却没有。1965年后南斯拉夫“社会”企业的经历本来可能最接近于证实这一否定性的答案;可是南斯拉夫案例所具有的特殊性,尤其是企业的自治形式和国内市场的割据使它很不适合于用以引申出一般性的结论。西方市场经济中的国有化企业的经验也是不明确的;首先,与不成功的公共企业同时存在的有一些(公认为数量较少的)相反的事例(大众汽车被认为是其中之一);其次,某些分析家把公共企业糟糕的绩效不是归咎于企业的公共所有制本身,而是归咎于不正确的政府政策和错误的组织形式。<sup>②</sup>多少有点讽刺意味的是,后者的观点还找到了一个自相矛盾的证据,这就是撒切尔夫人的保守党政府在匆忙进行私有化时,用科尔内的话说,硬化了预算约束,迫使国有工业变得相当有利可图,结果,英国公共企业的绩效提高了。

如果我们同意过去的经验不能提供令人信服的答案,那么,我们的问题的答案就必须到假说性的(有人可能说是推测性的)推理中去寻找。让我们从国有企业经理(主要负责人)的地位和私营企业经理的地位的比较开始分析(假定后者不是企业的所有者或共有者——股票持有者)。假定国家严格遵循上述分离规则,乍看起来,社会主义经理的行为应该和它的私人企业同行的行为没有原则上的区别。他的目标函数与后者相同,他的工作也按同样的标准进行评价。一组恰当的刺激(利害攸关的职业前程、高薪金、依绩效而定的奖金或罚金、享受养老金的权利、契约期限的长度,等等)应当产生足够的动力。假如对于上述制度所要求的收入差别的意识形态障碍消

除了(在市场社会主义中,必须把这一点看成是不可缺少的),那么,要为在不确定状态下运行的国有企业经理设计激励机制,显然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sup>64</sup>如果这是事实,那么,社会主义经理就应当对成本、市场份额、利润、资本收益等等很敏感,敏感的程度也决不亚于资本主义企业中受雇的职业经理。对社会主义经理来说,最感困难的可能是工资和因此而来的劳动成本领域。在经济改革过程中,迄今为止提出的、包括(也可能尤其是)以自治为基础的所有“自动”工资控制方案,实际上都明显失败了。这似乎表明,市场社会主义必定会重新产生和出现工资谈判这一矛盾的特征。在经理人员对所谓工资过度要求的抵制的背后,站在拥有其全部资源的国家的角度,承认国有企业内部存在冲突,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允诺的和谐这一状况,可能不仅在意识形态上是令人尴尬的,而且在实践过程中处理起来也非常复杂。然而,即使在这个方面,国家经理人员和私人经理人员之间的差别也不一定很大——当然,这要以国家作为所有者坚持自己的立场,不给不严格控制工资支出的企业解救财政困难为前提。

真正的问题在于企业家身份这个具有很大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创造性的破坏”的领域。把经理人员和企业家身份区别开来也许是烦琐无益的;不过,指出这样一点可能是有好处的:前者所强调的是经营受托资源,对变化的环境作出反应,而对于后者来说,首先进入脑海的却是抓住新机会,抓住迄今一直为人所不知和别人没有很好加以实现的机会。一般说来,私人企业的高级经理人员都要求具有企业家的素质,但这并没有使两种角色的区别归于无效。

社会主义经理能够成功地担当企业家角色吗?令人产生

疑问的原因更多地不在于他们缺乏动力。尽管社会主义的经理不可能聚集到与其资本主义同行一样多的财富,但他们毕竟可以受到责任感、抱负以及物质收益的足够刺激。然而,社会主义经理主要缺乏的仍然是企业失败后承担风险责任的物质基础。他不拿自己的资本冒险,这就使他像哈耶克很早以前强调的那样<sup>⑥</sup>,极有可能在两方面犯错误,或者轻举妄动,或者过分谨慎。

这都是人们已经熟悉的材料;但是,难道实在无法使企业家职能更接近于终极所有者吗?在现代资本主义中,企业家身份和所有者身份之间的联系问题仍然是大有争议的,尽管那些支持所有权与控制沿着伯纳姆“经理革命”<sup>⑦</sup>的路线相互分离的呼声,在接近本世纪末期时变弱了。这并不是说所谓的“经理人员公司”,也就是经理人员而不是所有者执行企业家职能的企业不存在了,而是说在我们看来,这些企业远不具有代表性了。为了正确地确定资本主义大型股份公司中所有者身份和企业家身份之间的关系,必须区别开两方面的人,一方面是大量的分散股东,可能也有一些机构投资者,另一方面是大宗资本的所有者,他们控制着公司,或至少能够通过接管行动要求控制。前者没有执行企业家的职能;他们表现得更像只对股息和资本收益感兴趣的食利者,借助于在市场上获得和处置股票,传递他们对公司的企业家和管理人员的评价。后者(控制着或几乎控制着企业的所有者)则通过董事会作出的直接战略决策,通过监督管理行动,通过人事政策,成为企业家职能的主要的或潜在的承担者。在这里,人们很难断言存在着所有者身份和企业家身份的分离;获得控制股权的目的主要在于给所有者提供一个展示其企业家才能(和运气)的机会。



会。不用说,在公司资本主义的世界里,所有者身份和企业家身份的联系通常是通过大量的中介环节发生的,但是一般说来,个人风险因素通常还是可以追根溯源到所有者的身上,对损失责任承担的程度和对公司的控制程度成正比。

在国家是上面使用的意义上的最终所有者的情况下,它还能具有类似的作用吗?这是很难说的。让我们假定,在市场社会主义中,政府依据其纯粹的财务目标,把监督经理活动的任务委托给了一个部(如财政部,因为在市场社会主义中是没有掌握产业部门的部的地位的),或委托给一个专门设立的企业董事会(或多个董事会)。这种财政机关或企业董事会的成员都是国家所有者的代表;他们行使对经理人员的控制(显然包括人事问题),自行作出或由经理人员主动作出战略决策以及评估有关风险。简言之,从权力方面看(但不是从根植于他们自身物质利害的责任方面看),他们的地位极为接近私人企业中有控制权的所有者。从责任不是来自于自己的物质利害这一方面来看,他们仍然和受雇经理人员一样,作为代理人接受上级机关的指令,完成既定任务(不论规定得是否很宽泛),由同一机关根据这些任务决定的衡量标准进行评价,受到某种动力机制的刺激。难点在于,除常规因素外,市场环境中的最重要决策还包括一些不可预测的冒险的因素,而且,超出代理人真实处理能力的通常正是这些因素。当然,即使建立更高级别的行政机关,也没有任何东西发生变化:在具有匿名性质的国家组织结构中,是找不到用自己的名义行动且不能将风险责任转移给他人的委托人(principal,委托代理人的人)的。正是这一点才首先使人极难,或近乎不可能,在国有制框架内找到企业家职能的位置。在第1章我们提到的马克思的设想

中,由于“准委托人”会充分恰当地考虑共用品并愿意承担风险责任,社会主义社会里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区别将会消失。不言而喻,“现实的社会主义”的实践表明它大大偏离了这一设想。但在这里我们试图说明的是,即使社会主义存在适当的动力。如果不把损失责任同个人利益挂钩的话,企业家身份的问题可能仍然得不到解决。完全的市场条件类似于纸牌游戏(请原谅我们的比喻),不拿自己的赌注冒险几乎没法玩。看来划分企业家的行为和纯粹经理人员的行为界限的,与其说是个人能力、献身、动力、创新爱好,还不如说是强制委托人在不确定的现实世界中对风险和责任进行权衡的条件。因此,甚至在前面讨论的分离要求已经满足时(这本身就是一个苛求!),看来也很难期望国有企业能成为和私人(个人的或集体的)企业一样的市场上的牌手。这特别适用于与新的冒险投资有强烈联系的资本市场。

论证的假说性质要求限制这些结论的肯定程度。如果坚持认为,国有企业是唯一的参与者时就不可能存在横向的金融中介,因而不可能存在任何形式的资本市场,那可能是一种夸张之辞。但是,在这种条件下,建立的资本市场的实际好处可能远远达不到预期水平,如果考虑到股票市场及其资产评估功能,情况就更是如此了。另一方面,不稳定性的后果可能很严重。

国有企业部门的重组能改变这些结论中的任何一点吗?由于这个问题在所有努力扩大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范围的“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中都引起了极大的关注,所以值得简要地考察一番。<sup>10</sup>

匈牙利的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国家控股公司,把它设想

成一个纯粹的金融机构,在持有全部或大部分股份资产的基础上对企业进行控制。与财政部直接拥有企业的体制相比,这一机构可能有一些优点:首先,它可能在企业部门和政治行政权威机关之间设立一个隔离地带,有助于从制度方面进行所要求的分离;其次,它有利于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开展竞争和进行资本流动;第三,它为传统国有企业转变成不是由国家独家持股的股份公司提供了可能性。然而,前面指出的问题好像一个也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更不用说消失了。在国家仍然是唯一的所有者时,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关系实质一点都没有改变:企业经理人员对控股公司的董事们负责,这些董事依次又对某一国家机关负责,并承担同样的风险责任。在分散持股的情况下,真实变化的规模依赖于进入的自由程度:如果只有国有单位被允许购买股票,也许在决策过程中就可能出现直接利益的较大的多样化,但在其他方面,由于每一个持股者最终都仍然是国家的代理人,情况就会同过去一样。假定机构投资者(养老基金、工会和其他的自愿参加的组织)真正独立于国家之外,它们的进入就会在两方面产生受人欢迎的外部控制因素和对追求更优绩效的压力,其一存在于董事会会议室,特别是其二,通过“用脚投票”,即投资于公司股票或从公司股票中撤回投资资本。不过,如果国家能保证持有大部分股份或采取别的有效的全面控制形式使国家所有权得到体现,那么,上述外部因素就仍然是附属性的。假如允许私人投资者成为少数股票的持有者,在这方面也没有什么帮助:私人投资者在追求财务收益时对市场变动可能比较敏感,但同时,由于股份分散,他们对董事决策如果有什么影响的话,其影响也不会太有效。因此,我们认为,国家控制下的股份公司形式

对解决企业家制度问题不可能有太大贡献。

接着要研究的形式是自治<sup>\*</sup>企业。这一直是南斯拉夫市场社会主义的主流思想,而且,它在包括苏联在内的“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所有比较激进的经济改革方案中实际上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出现了。这使匈牙利在80年代出现了不同于原来新经济机制的显著特征。波兰改革的“三自”(自负盈亏、自筹资金、自治)口号也充分说明了人们对自治与经济向市场推进之间的关系的认识。不过,第8章描述的南斯拉夫经历表明,即使不受X效率因素支配,自治和企业家行为之间的联系也不能被看成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自治能否产生企业家制度的条件这一问题看来关键还是依赖于所有权归属于何处。南斯拉夫理论把所有权归属于“社会”,这在实践中使产权发生混乱,并且经常被国家行政机关所接管。<sup>⑩</sup>匈牙利和波兰的改革家们在谈到自治的国有企业时,明确规定了国家的所有者地位;不把产权分配给劳动集体的成员,并且只有在这些成员仍然在企业里工作的时候,其损益才与企业的绩效相联系。如果国有制在实际上发生作用,自治企业面临的问题看来就会同传统企业毫无二致。

不过,就像波兰团结工会运动1981年提出“自治共和国”这一口号时自己的纲领性文件中特别明显地透露的,自治思想之所以在激进的改革者中广泛传播,源于这些改革者的以下信念:自治可能成为一种终止企业对国家从属关系的工具。这种从属关系的终止主要反映在自治企业能对自己的经理人员有选择权上。进一步的逻辑结论是,以这种方式运用自治思

---

\* 或译为自主经营。——译者注

想可能会导向企业的完全独立。但首先,如同前面考察过的,这种独立会使国有制概念没什么意义了;其次,这将要求重新界定工人的集体所有权。如果在资本中没有个人股本,集体本身实际上就成了权利的持有者了;除非可以假定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完全和持久的同一,否则,人们在南斯拉夫实践中所熟知的反积累倾向就可能作为一个合理的行为原则出现。如果在资本中有个人股本,自治企业就会变成或开始变成合作企业或合伙企业。没有必要去一一设想可能存在的形形色色的过渡形式或中间形式;不管怎样,假如这种情况发生,方向是清楚的,那就是企业在国有制范围以外实现机构化。

在国有制基础上建立有利于企业家制度的条件会遇到大量的困难,毫无疑问,承认了这一点,就给各种把国有资本以契约形式转让给个人(家庭)或个人(家庭)自己组织起来的合伙企业的设想的繁衍提供了基础。在80年代,开始时小心翼翼而且严格划定了范围的想法发展成了接近于把土地和资本长期租赁给私人的思想,发展速度的确惊人。戈尔巴乔夫在1988年3月宣布,“集体农场和国有农场应该在不久的将来大体上变成由财务独立的承包小组组成的合作联合体”,并认为“租赁合同”是最恰当的形式,<sup>19</sup>这显然受到了中国农业“生产责任制”初期成功的推动。戈尔巴乔夫的这一声明和其他“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类似声明,伴随着法律规定和(程度不同的)实际措施,似乎表明这一思想不仅适用于被看作非主体的活动领域(如个人劳务),而且开始被看成是克服生产资源的国有制和企业家制度之间冲突的更一般手段。简单地说:国家退回到被动的财产受益人和某种食利者的地位,把自己的其他所有权都让渡给可以对风险负责的私人(个人或集团)

租赁者,换回来的则是承包费用和不动产的保有者对规定的正常条件如维持资产价值的认可。

在租赁期限足够长、租赁者对体制的合法稳定具有充分信心时,把特定种类的资本(和土地)租赁给私人就为经理人员的主动性和企业家身份开辟了天地。但其范围仍然受到资本专用性(*the specificity of the capital*)的制约:租赁了国有餐馆就不允许租赁者转向信息技术;在向一种具体产品的生产和(或)市场销售提供特许权的条件下,情况就更是这样。在探索以企业家方式利用国有资产的方法时,之所以也产生一种涵义更广泛并肯定更大胆的思想,即匈牙利经济学家蒂博尔·里斯卡提出的企业家社会主义,<sup>14</sup>其原因就在于此。在企业家社会主义中,总的原则是将国有资产拍卖给出价最高的人使用,这些使用者自己也反过来容易被接管,除非他们准备好赶上更高的出价。把这种思想和普通的租赁区别开来的,除其一般性规定外,主要在于它的清楚的价值取向:不针对任何一个具体活动领域进行分配,企业在竞争性的不断评估过程中可以完全自由地改变资产的实物形式。同时,对失败的责任和对成功的报酬也都明确无疑地归属于个人或其合伙组织。这里没有必要研究它的技术细节问题;这些问题远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证实,尤其是在大型企业方面。<sup>15</sup>不过,这一思想的出现本身还是有意义的,它指明了解决国有制和企业家身份之间冲突的尝试的方向和激进主义的设想。

总而言之,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 80 年代后期开始的激进的经济改革之后,人们广泛讨论了改造国有企业部门的可能性;我们对这一可能性的简短考察表明,国有企业的行为更符合有效市场机制要求的可能性越大,国有企业离开传统

意义上的国有制就越远。另外,在上述时期,改革者们已经日益认识到,要使国有企业更像真正的企业,就需要在国内存在非国有的环境。对于消除国有企业经常的自满行为和它们对软衡量标准的依赖来说,甚至对于产生那种在传统体制下很大程度上不存在、但在市场条件下却不可或缺的经理人员新的管理技能来说,来自私人企业和合作企业的平等竞争都被看成是至关重要的,这在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机会都很多的领域,尤其如此。如果放在一起考虑,那么,这两点就无情地引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究竟为什么要坚持国有制?如果通过巨大的但一点也不能肯定会成功的努力使国有企业模仿私人企业的行为,如果设计出令人手足无措的复杂计划,从而使个人像企业家那样行动,而不用变成所有者,那么,这又有什么样的实际好处呢?对市场社会主义的初始批评已经批驳了与此类似的思想的有效性,认为这是人为的和无效的。<sup>19</sup>我们对这一问题能有一个不同的分析吗?

在市场社会主义中,也许能提出几个理由说明要求国有制存在。其一是国家能得到自己所需要的岁入,从而能够履行自己的政治与行政职能,提供社会保险、人力和物质基础设施,等等——一句话,能够维持非企业部门。不过,本书所定义的市场社会主义只允许国家以税收和资本收费的形式从国有企业得到收入。剩余利润,特别是对企业家成功的报酬,则属于企业本身,这在里斯卡的“企业家社会主义”中也许有所不同,在那里,作为连续喊价使价值增加的结果,在企业家的收益中可能会出现某些国家参与的成份。可是,总的来看,好像没有理由说明国家为什么不能用同对非国有部门相类似的方式征收岁入。就岁入量来说,这可能取决于相对效益和逃避支

付的可能性。第一个因素很难指望有利于国有企业,第二个因素可能稍微好点,但决不会好到足以改变整个平衡的地步。

要考虑的第二点是,在反周期措施不超出通常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范围时,对于宏观经济干预,特别是对于像第9章所说的“长期充分就业计划”这样的宏观经济干预,国有企业可能具有什么样的作用。私人企业可能会出于类似于卡莱茨基在其著名论文“充分就业的政治方面”中所提到的理由<sup>⑤</sup>(讨厌政府的投资和消费支出,愿意对劳动大军中的失业者挥舞“纪律效应”大棒),成为这种干预的障碍吗?如果确有这种情况,就可以认为国有企业为长期的宏观经济政策建立了一个更有利的环境。但是,很难担保社会主义政府下的私人企业会作出充分就业承诺,以达到“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企业占据的特殊位置”,<sup>⑥</sup>所以,这一类比是非常牵强附会的。国家和私人企业与可能的国家干预方法分别具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如第9章提出的,国家长期干预的主要工具可能是征收资产费用,从而影响国民收入在利润和工资之间的宏观分配的适当调整。也许可以证明,在国家作为社会的代表拥有资产时,征收资产费用、把收入转化为基础设施投资与全体社会成员红利的源泉,在理论上和政治上都是正当的。经济意义相同的另一种选择方式(对私人资产征收一种财产税)却缺乏这种正当理由;而且,还可认为它侵蚀了私人产权并因此会遇到公有制下不曾有的政治抵制。这一理由也许值得给予一定的注意,但是,它肯定要与包括私人企业可能比国有企业更容易对间接干预方法做出反应在内的其他因素进行权衡比较。于是,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私人部门拥有的抵制资本收费的政治影响力有多大——这与上面提到的问题类似,但特别与“现实的社



会主义”向市场社会主义的过渡过程有关。

在市场社会主义下坚持国有制的第三个可能的理由,同收入和财富的规模分布有关。据认为,把企业掌握在公众手中,就能使收入和财富的差异比在私人经济中要小,并且不会弱化刺激。这一论点倒很重要,但同样也很难判定是对还是错。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运动过程中成为常识的是,人们认识到,为了提高效率,特别是为了促进企业家精神,就需要容许收入和财富差距扩大。没有一个人知道据认为能够使刺激与公平保持平衡的“最优”幅度何在。人们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中很难找到可靠的线索,这些国家的经验所提供的是一幅关于财富和收入关系的变动不居的图画,它与其说是同企业家素质的差异有关,还不如说是同文化差异、对具有再分配性质的税收的不同容忍程度等等有关。如果我们能够把瑞典这样的国家归入具有很强的、比一些“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都要强的平均主义分配倾向的一类资本主义国家,那它也丝毫没有显示出这与生产资料的公共所有制有什么联系。尽管如此,与整个资本主义相比,含有国有企业的市场社会主义还是努力把对经理人员和企业家的刺激与更大程度上减少收入和财富的差别结合起来。如果考虑到有可能消除,至少是限制那些代代相传并与经济活动无关的纯粹所有权所产生的过于庞大的食利者式的收入和资本收益,这一点就特别突出。不过,在这一点上必须记住两个要求:其一,市场社会主义必须把来自财产和企业家行为的收入与从“按劳分配”得来的收入一并合法化;其二,如果没有相当规模的非国有部门与国有企业进行平等竞争,市场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就几乎是行不通的,因此,国有制不能是决定分配的唯一

因素。

结果,尽管完全的市场机制的纯粹逻辑把非国有企业(私人企业和合作企业)看成是市场社会主义企业部门中的更自然的成分,我们还是不应该认为国有企业会不可避免地消踪匿迹。除以上指出的各点以外,应当记住,我们这里讨论的主题不是在一张白纸上对抽象的替代方案进行选择,而是看“现实的社会主义”演化的方向何在。这一演化过程是从国有企业占据优势的位置逐步展开的,这种生活现实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发生改变。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市场社会主义的唯一现实情形看来是一种混合经济,其中,不同形式的国有企业逐渐在平等的基础上与私人企业和合作企业进行竞争。这意味着,国有企业能否适应以及怎样以最少的损失适应包括资本市场在内的真正的市场制度这一问题,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从长远的前景看,市场社会主义将必须使所有制结构的发展在不断变动的环境中受到社会经济适应性的公正检验。换句话说,市场社会主义可能并不要求放弃公有制,但肯定要求放弃任何形式的所有制教条主义。经济体制并没有最终的答案(open-ended)。

## 注 释

- ① Brus, *Socialist Ownership*.
- ② Vaclav Holešovsky, *Economic Systems: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International Student Edition, McGraw-Hill Kogakusha, Tokyo, 1977), ch. 3, 41.
- ③ 我们意识到,《资本论》第3卷中有时被引证说明马克思认为所有

权是控制的决定因素的一些段落,是很模糊的,但是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坚持认为我们的建议正确地反映了马克思理论的总的脉络。

- ④ (eds), Erik G. Furubotn and Svetozar Pejović, *The Economics of Property Rights* (Ballinger, Cambridge, Mass., 1974). See also the quotation from Milton Friedman's article in Holešovský, *Economic Systems*, 55.
- ⑤ V. V. Novozhilov, 'Problems of Cost—Benefit Analysis in Optimal Planning' in *Mathematical Studies in Economics & Statistics in the USSR & Eastern Europe: A Journal of Translations* V, (2—4), (1968—9), ch. 2, 36—37.
- ⑥ Leszek Bałcerowicz 恰当地强调了国家层次上的公共所有制的这一方面。见 Leszek Bałcerowicz, 'Remarks on the Concept of Ownership', *Oeconomica Polona,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Committee of the Polish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of the Polish Economic Society*, no. 1(1987)。
- ⑦ Maurice Garner 强烈地提出了这一论点。见 Maurice Garner, 'Has Public Enterprise Failed?', Templeton College, The Oxford Centre for Management Studies, December 1987, unpublished paper.
- ⑧ Abram Bergson, 'Managerial Risks and Rewards in Public Enterprise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 (3), (September 1987).
- ⑨ Friedrich A. Hayek, 'Sozialistische Wirtschaftsrechnung I: Wiedereinführung des Wettbewerbs' ('Socialist Economic Calculus I: The Reintroduction of Competition'), in *Individualismus und wirtschaftliche Ordnung (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 (Erlenbach, Zurich, 1952). G. Warren Nutter 极其强调地重申了这一点,见 G. Warren Nutter, 'Markets Without Prop-

erty: A Grand Illusion', in Furobotn and Peiovič, *The Economics of Property Rights*. 波兰社会学家 Jadwiga Staniszkis 在其 80 年代初期发表的一些文章里, 在其著作 *The Ontology of Soci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thcoming) 中也极其强调地重申了这一观点。Helmut Leipold 从比较的角度广泛讨论了这一问题, 见 Helmut Leipold, *Wirtschafts-und Gesellschaftssysteme im Vergleich (Economic and Social Systems in Comparison)*, 5th edn (Gustav Fischer, Stuttgart, 1988)。

- ⑩ 我们在这里考虑到伯纳姆本人的观点(见 James Burnham, *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first published 1944), 也考虑到了小伯利和米恩斯的开创性著作《现代公司和私人财产》(1932)及加尔布雷思的《新工业国》(1968)这两本著作中的思想。
- ⑪ 这明显是匈牙利 80 年代初的情形。特别参见 T. Sarkozy, 'Problems of Social Ownership and of Proprietary Organization', 和 M. Tardos, 'Development Program for Economic Control and Organization in Hungary', 分别刊登在 *Acta Oeconomica* 29 and 28 (1982)。据我们所知, 波兰文献中对这一问题进行最广泛分析的是 Marek Dabrowski, 'Podmiot przedsiębiorczości w różnych wariantach reform gospodarczych' ('The Subject of Entrepreneurship in Different Variants of Economic Reforms'), *Ekonomista*, 3 - 4 (1988)。
- ⑫ Harold Lydall, *Yugoslavia in Crisi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把这一点看成是南斯拉夫或社会主义陷入危机的根本原因之一(见第 5 章)。
- ⑬ M. S. Gorbachev, 'Speech to the 4th All-Union Congress of the Kolkhoz members', *Pravda* 24 March 1988.
- ⑭ 蒂伯尔·里斯卡的著作并不为西方所熟知, 就是在匈牙利国内, 一直出版的也只是他的相当次要的或初级的著作。他的明显是主要

阐述“企业家社会主义”的著作 *Econostat* 是以油印本的形式发行的。据我们所了解,最全面地介绍了里斯卡思想的文章是 J. Bársony 的 ‘Tibor Liska’s Concept of Socialist Entrepreneurship’ (载 *Acta Oeconomica* 28(3-4)(1982), 422-55)。科尔内也在这同一期上评价了里斯卡的思想。Istvan Siklaky 在 1988 年 3 月匈牙利的吉厄(Győr)召开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可选择模式”会议上也介绍了里斯卡的思想。

- ⑮ 实践中,匈牙利一直在仔细考虑只在中小企业中实施里斯卡的思想。关于这一事实,可见 J. Bársony 和 I. Siklaky, ‘Some Reflections on Socialist Entrepreneurship’, *Acta Oeconomica* 34(1-2), 51-64。
- ⑯ 在这方面最明显的一直莫过于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在争论兰格与迪金森“准市场”理论的逻辑一贯性时,米塞斯强烈地批评了这一模拟方案:“他们打算废除生产资料的私人控制,打算废除市场交换,废除市场价格和竞争。但在同时,他们却想以这样的方式组织社会主义乌托邦,这种方式就是,人们依然能够行动,就像这些东西仍然存在一样。他们期望人们就像孩子们玩打仗、玩开火车和上学一样来做市场博弈。他们并不理解这些孩子气的游戏和他们所极力模仿的真物件具有怎样的不同”; *Human Action: A Treatise on Economics* (William Hodge, London, 1949), 706-7。我们的注意力就放到米塞斯与哈耶克及 G. Temkin 的 *On Economic Reforms in Socialist Countries* 一文所说的这一内容及类似的其他内容上。
- ⑰ Michal Kalecki, ‘Political Aspects of Full Employment’, *Political Quarterly* XIV(4)(1953), 322-31。
- ⑱ Charles E. Lindblom, *Politics and Markets: The World’s Political-Economic Systems* (Basic Books, New York, 1977), ch 13。

这本薄书和我们过去的某些著作不同，它没有打算考察一种据认为应在“现实的社会主义”的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标准经济体制模式。做出这一保留的原因之一在于我们过去建立这种模式的经历。正如前文几次提到的，这种模式最终证明极少获得成功。共产主义国家中改革辩论的一些参加者对详细说明经济体制的最终模式的努力是否有益表示怀疑，我们也有相同的看法。

本书意在研究“现实的社会主义”的实际演变过程，研究这一演变为什么会出现日益增强的指向严格意义上的市场社会主义的趋势，以及在实现这一趋势的过程中会涉及到什么样的问题。第9章和第10章谈到的市场社会主义的可以预期的特征不是处方式的，而且，我们试图不对那些旨在为使经济从属于市场协调而创造有利条件的各种改革建议的可行性做出判断。在我们自己划定的范围所排除的问题里，也略去了这样的问题，即，是不是应该把市场社会主义看成是“现实的社会主义”勇敢地面对经济挑战的唯一途径，或者，是不是存在使直接集中计划成为可行

的另一种选择,譬如(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沿着民主德国的道路。我们认为市场取向的趋势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应该集中说明它的全部的涵义。

这些涵义并不限于特定的问题或制度。我们的讨论清楚地表明,对于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支配了大半个世界的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对比的长时期论战,市场社会主义的前景给我们引入了一个新的维度。如果社会主义的经济特征(在最一般的意义上)必须包括公有制占统治地位、集中计划、按劳分配,那么,严格意义上的市场社会主义显然在不只一个方面违背了这种信仰的每一个支柱,同时,只有具有相当水平的诡辩术,才能镇静自若地宣称自己仍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另一种方式。

在东欧,一句幸灾乐祸的俏皮话把社会主义说成是“通向资本主义的痛苦道路”。我们认为,把市场社会主义简单地看成是这一道路上(或如许多人所说的,这一滑坡中)的一个阶段可能是过分了。“现实的社会主义”的演变就在这方面补充了第2章所讨论的反向规律:在先进的资本主义未能出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预期倾向的同时,“现实的社会主义”越是成熟,就越要被迫从资本主义的军械库里借装备。向市场社会主义求助本身就意味着,实际上一点也不应该再把社会主义设想成一种被限定住的制度,社会主义已经超出了它过去设计的制度框架,因此,应该理所当然地用新的制度基础完全替代这一框架。这种替代即使不能立刻进行,也要在一个稍长的期间完成。

像在已被揭示的趋势中可以看到的那样,严格意义上的市场社会主义并不意味着放弃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价值——

机会平等、对充分就业的重大关心、社会保障,等等。通过把部分经济放在市场协调之外,通过保持包括我们所说的长期计划在内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实质地位,本世纪末期提出的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继续保持着这样的信仰,即,存在着社会的总体利益,这一利益不能仅仅归结为个人私利的总和。在这一方面,它仍然面临着来自极端自由主义观点的批评。我们认为,这种批评是否会最终被证明是正确的——就像米塞斯或哈耶克式的对正统社会主义的攻击最终发生的情况一样,目前要作出判断还为时过早。严格意义上的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令人心动之处(正是由于这一点,我们不能抑制自己对它的支持之情)是它的明显的开放性质,这就使它能够充分灵活地根据实际生活所确认的迫切需要而发生变动。



## 译校后记

光阴荏苒，斗转星移。由于版权转让颇费周折，本书中文译本脱稿5年之后才得以问世。原著出版于1989年，当时正值国际风云变幻，东欧、前苏联体制崩溃，国际上一些人极力散布“历史已告终结”、“社会主义已经死亡”的观点。而布鲁斯和拉斯基两位学者则以严肃的态度探索可行的社会主义改革模式，分析了自马克思提出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以来列宁、斯大林的集中计划经济、南斯拉夫的“社会所有制”、匈牙利改革等社会主义实践的一系列理论和实际问题。在这种分析中，作者提出了不少很有见地的观点。例如，在国有企业改革问题上，作者提出，市场社会主义要求作为所有者的国家同作为权威机关、管理机构及非企业部门的管理者的国家分离开来，并分析了实行这种政企分离的可行性。作者还特别指出，市场社会主义并不要求放弃公有制，但肯定要求放弃任何形式的所有制教条主义。目前，我国的改革正处于攻坚阶段，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确定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完整地论述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的基本经济制度。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这为我国国有经济改革进一步清除了思想障碍。显然，在党的十五大精神指引下，在开拓新世纪伟业的过程中，我们应当广泛阅读、比较和借鉴各国学者的著作，从中汲取有用的成果。在这方面，我们肯定能从本书得到助益。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无保留地接受本书的所有观点。应当说，本书的有些观点是值得商榷的。而且，由于作者所处的环境不同，他们的有些想法并不适用于我国。这些都是阅读该书时需要加以注意的。

最后，我们感谢作者的大力支持，他们从一开始就写了中文版序言。在中文版问世之际，我们期待着同行对译文的指正。

**吴敬琏**

**银温泉**

1997年10月1日